

#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0期 2019年12月

## 研究論文

- 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如何可能：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
- 「完全黨報」：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個話語事件

## 研究誌要

- 歐盟版權改革與數位單一市場初探

## 現場報告

- 「全球傳播」學會年會的現場觀察
- 學術研討會之必要？藉科學社群與社會網路再理解我的研討會經歷

## 書評書介

- 新聞（匯流）的科技與宗教觀：論兩本近作，以政策作結

#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19年12月 第十期

##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新竹)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 編輯委員會

主編	馮建三	政治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
	林麗雲	台灣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羅世宏	中正大學(執行編輯)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 目次

編輯室報告：.....i

## 一般論文

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如何可能：

    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王賀白/1

「完全黨報」：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個話語事件.....周光明/43

## 研究誌要

歐盟版權改革與數位單一市場初探.....李筱雯/75

## 歷史與現場

實踐「參與典範」：

    「全球傳播」學會年會的現場觀察.....黃從嚴/89

學術研討會之必要？

    藉科學社群與社會網路再理解我的研討會經歷.....張時健/103

## 書評書介

新聞(匯流)的科技觀與宗教觀：論兩本近作，以政策作結.....馮建三/121

##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期  
2019 年 12 月

## 編輯室報告： 回歸學術初心，重建精神家園

本期是《傳播、文化與政治》第 10 期，也算是本刊創刊以來的小小里程碑。今（2019）年初，本刊很榮幸與《新聞學研究》、《中華傳播學刊》與《傳播研究與實踐》並列，同獲國家圖書館「知識影響力獎：臺灣出版之中文期刊（5 年影響係數）最高」。

當時，本刊編委會曾發出一篇名為〈回歸學術的初心〉的公開謝辭，一方面敬謝國圖的肯定，同時也自我惕勵，要為學術初心的回歸，持續地做出努力。

在這篇謝辭中，我們曾回顧「學術期刊」此一出版形式在 17 世紀巴黎和倫敦的歷史性興起，意味的是學者之間的交流形式，從非正式管道走向正式，從私下口頭討論與書信往來，走向具有正式審查機制與公開刊登日期，並且發展出相應一套制度性安排：（投稿）作者、評審／同儕審查、編輯委員會、期刊編輯人員…等。然而，本世紀初以來，原初用以敦促知識精進與交流的平台，橫遭扭曲，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學術績效往往等於期刊論文的發表數量；其具體表現之二，就是國際化與殖民化的界線模糊，遂有抬舉甚至獨尊英文著作之勢。

本刊回歸學術的初心，高舉默頓的「發現的優先權」，自我期許能夠刊登更多擲地有聲的論述。德不孤必有鄰，這也是《經濟學人》之見解：該刊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克曼（J. Heckman）與馬坦（S. Moktan）檢討期刊與論文品質的看法，進而鼓勵學者在「開放近用」的期刊先行出版，以便得到同儕的即時評價，即使這對學者個人的考評與升等或無立即效用。

這樣的初心，剛好和本期首篇研究論文所討論的公共知識份子薩依德（Edward Said）遙相呼應。正如作者王賀白教授點出，薩依德提出「奧爾巴赫問題」（詳見內文），並在〈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中以達爾文終生

關注的蚯蚓為例指出，蚯蚓雖微不足道卻實在重要：「…儘管一個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總是有可能……，而且感覺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計畫中有類似的投入和工作」（Said, 2004a, p. 140）。德不孤必有鄰，涓滴努力不會白費，因為遠方不只有詩，亦有知音和同志，就像沙特對聶魯達之間的欣賞和推崇。

明知自我侷限但不懈於努力倡議和著述，這種「蚯蚓精神」至為可貴：像蚯蚓般做「日拱一卒」的努力，不期速成。此誠然是知識份子應該具備的公共角色和自我意識，於焉安頓身心，從而找到屬於知識份子的精神家園；這家園，既是臨時的，也是最終的。

王賀白教授在這篇論文中進一步探問，「在全球化與排外主義的抗衡下，民主批評、甚至是美學的人文主義是否可能？」他也試圖透過本文說明，在融合真善美的信念下，薩依德試圖描繪的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文主義前景。

本期第二篇研究論文是周光明教授撰寫的〈「完全黨報」：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個話語事件〉。作者指出，「完全黨報」這個 1940 年代發生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的「話語事件」，是理解中共「完全黨性」的關鍵概念，也沉澱為中共黨報觀的基本內核，並且一直影響至今。而在文末關於「群眾辦報」與「延安經驗」的延伸討論中，我們也可讀到作者對相關問題的深刻思考。

本期收錄的第三篇論文是李筱雯博士關於歐盟版權改革與數位單一市場的分析，探討集生產，廣告與流通於一身的社群網路平台，如何襲奪原屬於內容創作者的大部分利潤，而且在此一背景下，歐盟如何展開版權改革，設立數位單一市場，以期保障版權擁有者的權利。

接下來，有兩篇論文都與學術會議有關：第一篇是黃從嚴的〈實踐「參與典範」：「全球傳播」學會年會的現場觀察〉，第二篇是張時健教授撰寫的〈學術研討會之必要？藉科學社群與社會網路分析的再理解〉。兩篇論文皆分享第一手的親身觀察、經驗與反思。學術生涯的各式各樣學術會議何其多？其間有何旨趣和關懷的差異？以及，最根本的問題：學術會議是為了什麼？如何回歸學術會議的初心？

最後，本期書評論文是由馮建三教授撰寫的〈新聞（匯流）的科技觀與宗教觀：論兩本近作，以政策作結〉。在這篇書評論文中，他分別評介兩

本重要的新著 —— 一是林照真的《新聞，在轉捩點上：數位時代的新聞轉型與聚合》（台北：聯經，2017），一是何日生的《建構式新聞》（台北：五南，2017）—— 提供深刻解讀與點評之外，也進一步提供他對新聞傳媒政策的見解。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19年12月27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期  
2019 年 12 月

# 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如何可能： 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

王賀白\*

## 本文引用格式

王賀白 (2019)。〈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如何可能：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傳播、文化與政治》，10:1-42。

---

投稿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11 月 30 日。

\* 作者王賀白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e-mail:w1103@mail.cgu.edu.tw。本文受到行政院科技部【民主與批判的人文主義如何可能—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106-2410-H-182-011-)專題研究案之獎勵資助，敬致謝忱。並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讓本文第五章的論述更加完備。

## 《摘要》

本文將薩依德的學識遺產放到一個更大的哲學背景中。在認識論上，薩依德闡述自我認識必須由自我批評構成，並且認知到總體知識總是虛幻的永恆批判觀點；而在倫理學上，透過後殖民論述檢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的侷限，並提出一種空間地理學的民主人文主義；最後則回到語文與音樂的美學。過去西方正典論強調的必讀經典文本，如今已漸失說服力，因為這世上還有其他可學習的文化傳統。另外他與巴倫波因集合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年輕音樂家合組西東詩篇管絃樂團，嘗試用音樂扮演兩邊的溝通橋樑。如今，在全球化與排外主義的抗衡下，民主批評、甚至是美學的人文主義是否可能？本文嘗試說明，在薩依德融合真善美的信念下，試圖描繪出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文主義前景。

**關鍵詞：**人文主義、民主、批判、後殖民主義、美學

## 壹、源自奧爾巴赫問題

薩依德 (E. Said) 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書中第四章，收入他為奧爾巴赫 (E. Auerbach)《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的真實再現》英譯本五十周年紀念版所寫的導論，並稱該書可以理解為「最高層次上的人文主義實踐之範例」。薩依德記述奧爾巴赫在該書接近結尾的總結，並稱這份自我理解的證詞感人至深：

他 (奧爾巴赫) 之所以有信心聽從這些沒有特定意圖的動機，首先是意識到沒有一個人可能把整個現代生活綜合起來，其次，有一種永恆的「緣自生活本身的生活秩序及其解釋；它們自行從個人中生發出來，它們是在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中，並且，以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在他們的言語和行為中，有待於辨別的東西。因為在我們內心總是進行著一個表達和解釋過程，它的主題就是我們自己」(Said, 2004a, p. 116)。

不過，薩依德在為我們陳述該書在西方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之際，本文認為，薩依德的導論最後，留下讓人印象深刻的「奧爾巴赫問題」。這個問題是：如果，一位自我反省的人文主義者，意識到「沒有一個人可能把整個現代生活綜合起來」，恰如本分地給自己劃定權能界限，有別於那盛氣凌人的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 的唯我獨尊《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筆者按，書名應譯成中性的「西方經典」) 中心主義；但是，當面對真實權力運作的社會體制，不管是西方大學系統裡繼續的東方等區域研究，或是薩依德晚年才明確意識到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運作邏輯；如此，個人的經驗有限對比於結構的永續無限；難道，奧爾巴赫從意識流作家的現代性碎片中看到歐洲的衰落，<sup>1</sup>而我們將會從安德森 (P. Anderson) 的「新自由主義<sup>2</sup>大獲全勝」(Said, 2004a, p. 126) 中看到全世界的衰落。

---

<sup>1</sup>喬伊斯 (J. Joyce) 與吳爾芙 (V. Woolf) 等意識流作家，曾努力嘗試從這些碎片中重新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

而薩依德應也意識到奧爾巴赫問題，書末第五章〈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以達爾文（C. Darwin）終其一生對蚯蚓的關注為例，指出蚯蚓雖微不足道但卻實在而重要，嘗試回應此一有限個體對於外在大世界的可能積極作為：「必須要有這樣的設想，儘管一個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總是有可能不僅洞察近在手頭的鬥爭或緊張或問題的各個因素，使它們能夠得到辯證的闡釋，而且感覺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計畫中有類似的投入和工作」（Said, 2004a, p. 140）。就像沙特（J. Sartre）婉拒 1964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卻也積極推薦智利作家聶魯達（P. Neruda）的作品，間接使其 1971 年獲此殊榮，並開啟世人對拉丁美洲文學與現實政治關連的理解，讓拉丁美洲自此漸漸擺脫孤獨，不再繼續百年孤寂。

回顧薩依德一生<sup>3</sup>，即使生命最後他依然關注著，如何鼓舞大家為所應為。薩依德的夫人瑪麗安（M. Said），2007 年 5 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辦的兩天紀念薩依德研討會上，提到即使在 2003 年 3 月英美聯軍可能入侵伊拉克的緊張氛圍裡，薩依德依然照原定計畫在開羅與貝魯特演講，她難以想像在那樣可怕的情境下，他還能演說，終於問他理由，而薩依德也只回答了人文主義，<sup>4</sup>並說這是唯一希望之所在（M. Said, 2008, p. x）。

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第三章〈回到語文學〉裡，薩依德曾詳述這人文主義的基礎信念是，它只能開始於個人特殊性，而必須對毫無明確論述就立即跳躍到集體自我進行嚴格批判；同時在全球化市場經濟統治下，持續

---

<sup>2</sup> 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中首度關注新自由主義議題。關於新自由主義，主要參考哈維（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

<sup>3</sup> 薩依德把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任教初期，描繪成道林·格雷時期。在王爾德（O. Wilde）《道林·格雷的畫像》裡，主人翁道林·格雷是位美少年，為讓自己保持青春貌美，他出賣靈魂、耽於享樂並自我放縱。1994 年接受阿里（T. Ali）的訪談時，薩依德提及這一段從置身事外到覺醒奮鬥的心路歷程。就如道林·格雷的畫像，薩依德的內心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從事英美文學的人，忙於日常工作與教學，只想當一個普通人；另一個則是無處安身，一直到 1967 年後重新復活。薩依德發現幾位備受敬重的文化名人，如柏林（I. Berlin）與尼布爾（R. Niebuhr）等人都是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親以色列甚至為文攻擊阿拉伯人；另一方面，當時雖有反越戰行動，但當薩依德提及中東議題時，卻被冷落一旁。於是道林·格雷時期至此結束，薩依德在來到美國約 15 年後，他第一次與阿拉伯人接觸，並在 1970 年成為巴勒斯坦運動的發言人。1974 年阿拉法特（Y. Arafat）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也正是由薩依德負責將其發言稿翻譯成英文（Ali, 2006, p. 71-73, 78）。

<sup>4</sup>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序言中，即稱自己是「人文學家」（humanist，與人文主義者的原文相同）。不過在當時，他指的是人文學科是他的專業領域，所以他是人文學家（Said, 1979, p. 9）。而薩依德從人文學家職稱，到充分意識到自己是人文主義者，雖然都是 humanist，但這之中的變化歷程，幾乎是他後半生的寫照。

去注視那些被排除在多數媒體視線之外的人們 (Said, 2004a, p. 80-82)。最後，在語文學的細讀接受與抵抗過程中，達到理解人文主義的正道。

本文以人文主義為題，嘗試將薩依德的學識遺產放到一個更大的哲學背景中。在認識論上，薩依德相信自我認識乃由自我批評構成，並且認知到學習他者的傳統文化至為重要。而在倫理學上，經歷 1960、1970 年代多元文化洗禮後，薩依德認為一種更為民主開放、解放融合的人文主義是可企及的。另在美學方面，過去與歐洲中心主義、帝國主義相關的傳統人文主義，其強調經典文本的神聖性，如今已漸失說服力，因為在這世上，還有其它可學習的文化傳統。薩依德同意阿多諾 (T. Adorno) 所言，在美學與非美學之間有一種難以協調的基本特質：語文不僅是被動接受的載體，同時也是充滿活力的對抗呈現，傑出的文學作品最終都會抵抗被完全地理解；而當代音樂也絕不能跟生產它的社會妥協，在緊張與世難諧的互動中，音樂才能面對周遭的暴虐擔當無言的見證。

## 貳、總體總是虛幻的批判觀點

關於批評 (criticism) 與批判 (critique)，薩依德並沒有明確區分，甚至時常交換使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書名使用批評，但內文又不時在關鍵解釋時說著「人文主義就是批判」(Said, 2004a, p. 22)。

在《世界、文本與批評家》序言〈世俗批評〉裡，薩依德對批評有一段清楚的說明，從個人意識、敏銳覺察、產生距離以至達到批評：「一方面，個人思維既表達也覺察自己所在的整個集體、背景、處境。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有這種覺察（一種處世的自我定位，對優勢文化敏銳地回應），個人意識並不理所當然且輕易地成為文化養大的孩子，而是文化之中的一個歷史性、社會性的作用者。也因為有這種覺察，本來只有順從與歸屬的地方加上條件和區別，所以產生距離，這距離我們可以稱之為批評」(Said, 1991, p. 15)。因此，批評是對自己與他者的一種自我覺察過程。正如為《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寫序的比爾格雷米 (A. Bilgrami) 為薩依德聲言的：除非我們

以自我批評來補充自我認識，實際上，除非我們認識到，自我認識乃是由自我批評構成，人文主義才會在我們的視野裡清晰可見。

而批判是德語系哲學傳統的辭彙。哲學家康德 (I. Kant) 的批判，並不是對於各種書籍或體系的批判，而是對「獨立經驗之上，追求知識理性能力的一種批判」(Kant, 1929, p. 9)。而薩依德曾自稱是阿多諾唯一忠實的追隨者 (單德興譯, 2005, 頁 627)，因此，後期的薩依德即時常將批判與批評互用，這與阿多諾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有關。而該學派的批判理論主要是源自馬克思 (K. Marx) 的批判觀點，他們認為這個世界不是多數人主導的世界，而是資本的世界，因此，批判則是要在理論上揭露當代社會的祕密，對這個充滿壓迫與不公的社會展開全面批判。至此，薩依德的批判觀點，從康德矛盾體系的純粹理性批判走向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批判。

從批評轉向批判，從原本英美比較文學轉到後來對德語系奧爾巴赫《摹仿論》的極力推薦，我們看到薩依德人文主義的轉變歷程。在對奧爾巴赫《摹仿論》的導論裡，薩依德特別提及托瑪斯·曼 (T. Mann) 的《浮士德博士》。

## 一、《浮士德博士》的總體嘗試

《浮士德博士》出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並且是曼本人企圖理解這場現代德國災難的文學探索。但由於奧爾巴赫《摹仿論》完成於大戰期間的伊斯坦堡，於是薩依德嘗試在奧爾巴赫《摹仿論》的導論最後，以奧爾巴赫的思路，對照《摹仿論》與《浮士德博士》的異同：

這部小說的組織實際上由三條線索組成。除了雷維庫恩的故事和宅特布隆姆試圖對付它的努力（後者也包括宅特布隆姆自己的故事，他的生活和他作為一個學院派的人文主義者和教師的職業生涯）之外，也經常暗示戰爭的進程，結束於 1945 年德國最終失敗。那段歷史在《摹仿論》裡沒有涉及，當然也沒有戲劇衝突和人物之類的東西，而它們激發了曼的這部巨大小說。不過，《摹仿論》暗示了德國文學無法面對現代現實的失敗，而奧爾巴赫在他的書裡努力表現歐洲（憑藉

風格分析而認識到的歐洲)原本可能經歷的另一段歷史,由此看來,《摹仿論》也是想要從現代性的碎片中打撈感覺和意義的一種嘗試。在土耳其流亡時,奧爾巴赫從這種現代性的碎片中看到了歐洲的衰落,尤其是德國的衰落(Said, 2004a, p. 114-115)。

與《浮士德博士》相比,薩依德認為《摹仿論》意識到「沒有一個人可能把整個現代生活綜合起來」,於是奧爾巴赫堅決地放棄一種直線式的敘述風格,也明確拒絕一種嚴格的計畫,沒有體系、也沒有捷徑。但如此在許多人認為是悲劇性的缺陷,但在薩依德看來,這正是《摹仿論》成功的關鍵所在:「無論哪位作者,從自己的時代和自己的工作所形成的有限觀點來做,都只能如此。除非這位偉大的學者能夠始終用學識、奉獻與道德目的來支撐他的視野,否則不可能有更科學的方法與更少主觀的目光」(Said, 2004a, p. 117)。

薩依德在論述最後留了但書「除非這位偉大的學者能夠始終用學識、奉獻與道德目的來支撐他的視野」,但他並沒有言明曼的《浮士德博士》有否達到這樣的但書。不過,有意味的是奧爾巴赫在《摹仿論》的最終章〈棕色長筒襪〉裡,提及曼的其它兩部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與《魔山》,並與吳爾芙、普魯斯特(M. Proust)與喬伊斯等現代作家做對比。奧爾巴赫認為曼主要還是維持自己的基調,也就是始終以講述者、評論者或客觀描述者的口氣與讀者說話,故事情節主要依照時間順序前行至結局。接著奧爾巴赫說著:「可是現在,敘述的重點改變了;……他們放棄了在講述人物故事時一定要全面介紹外部事件、要按順序描寫重大外部命運轉折的寫作手法」(吳鱗綏、周新建、高艷婷譯,2014,頁644-645)。

事實上,在《摹仿論》之後出版的《浮士德博士》,寫作模式依舊是時間式的綜觀全覽,而且主題更大,希望找出德國古典音樂與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聯繫。而曼是否如薩依德所言「用學識、奉獻與道德目的來支撐他的視野」,曼找到了阿多諾當他的重要顧問。

《浮士德博士》第十五章藉由敘述者宅特布隆姆提及「音樂在德國民間享有的敬重猶如文學之於法國」(彭淮棟譯,2015,頁151),更由於巴哈(J. Bach)、貝多芬(L. Beethoven)與布拉姆斯(J. Brahms)等號稱德國三B音

樂家成就，讓現實政治分崩離析的德國，得以以音樂團結其民族主義。加上叔本華（A. Schopenhauer）、華格納（R. Wagner）與尼采（F. Nietzsche）對音樂的論述與創造，影響曼至為深遠。於是曼將《浮士德博士》主角雷維庫恩設定為尼采，書中雷維庫恩刻意使自己染上梅毒，為求得到超人般成就「十二音列技法」而與魔鬼訂約；然後創作〈啟示錄變相〉清唱劇（該書第三十四章），對應威瑪共和的起落；收尾階段的第四十六章〈浮士德博士悲歌〉則是悲歎二戰最終德國的劫難。甚至〈浮士德博士悲歌〉最後，曼並沒有接受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的建議，依舊堅持在這部無盡悲歌的最終昇華為超越無望的希望，在合唱消失後獨留一把大提琴，拉出裊裊餘響的高音 g：那將是，對絕望的超越——不是對這部作品的背叛，而是奇蹟，超越信念的奇蹟。聽那結尾請和我一起諦聽：一組樂器、一組樂器相繼退場，作品聲音漸渺漸去之際，獨留一把大提琴的高音 g，「最後的一語，裊裊的餘響，以極弱的延長音徐徐冥然而逝。接著了無一物。寂靜與暗夜。但那縷在寂靜中迴盪，已經不在而靈魂猶自存想諦聽的聲音、沈哀之聲，已不再是哀音，深意已變，化為暗夜裡一盞燈」（彭淮棟譯，2015，頁 569）。

事實上，對於曼《浮士德博士》這樣的總體嘗試，薩依德延續著阿多諾「否定辯證法」觀點予以保留，並且繼續推崇奧爾巴赫在《摹仿論》中所強調的西方文學的再現，應是「沒有體系、沒有捷徑」的多元人文主義，也就是不可能有任何單一個人、民族或文化可以獨自綜合詮釋龐大總體的現代生活。曼即使努力地尋求阿多諾協助，希望找出二戰德國悲劇與音樂的關連，此一直線總體的巨大嘗試，依舊讓人覺得說服力極為薄弱。

## 二、任何定見的總體總是虛幻

阿多諾正是在美國洛杉磯與霍克海默（M. Horkheimer）共同寫作《啟蒙的辯證》時，與曼相遇。1943 年當阿多諾將未完成的《新音樂的哲學》第一部份論荀白克（A. Schoenberg）以及 1937 年寫就的〈貝多芬晚期風格〉，交給曼詳讀後，開啟了曼在《浮士德博士》中，關於音樂部份高度倚賴阿多諾之始，有論者甚至主張，阿多諾應與曼並列此作的共同作者。

阿多諾是一位罕見精通音樂的哲學家，同時又是精通哲學的音樂家。在其《新音樂的哲學》所呈現的核心主題之一是：真正承續貝多芬晚期風格<sup>5</sup>作品精神的，是第二維也納學派的荀白克無調性音樂。

《浮士德博士》書中第八章寫雷維庫恩音樂老師克雷契馬開講貝多芬，其中的〈為什麼貝多芬沒有為他的鋼琴奏鳴曲作品 111，寫第三樂章〉，阿多諾認為晚期全聾的貝多芬，正是以這一首第 32 號鋼琴奏鳴曲的只有二個樂章，其第二樂章最後的「升 C」正式向奏鳴曲式告別，因此他當然不可能繼續寫第三樂章。<sup>6</sup>

強調個人主體性的呈示、發展與再現的奏鳴曲形式，原本是資產階級人文價值的表徵，然而當這樣的社會內在發展，不是走向更多個人自由與個性表現（亦即平等與博愛），而是走向有消滅個人與表現之虞的極權形式時，貝多芬晚年作品便向奏鳴曲式告別，重新回望巴哈對位賦格。阿多諾認為這是貝多芬對他周遭剛興起資產階級世界的疏離與拒斥。在揮別與回望之間，阿多諾認為荀白克所建立的十二音列技法才是走出無盡迴旋的出路，對調性的徹底否定擺脫，才是真正音樂的最終命運。阿多諾在〈荀白克與進步〉的最後〈對社會的態度〉文字裡，對這樣的新音樂如是說：「它否棄了和諧的謊言，面對正在走向大災大難的現實，這種和諧是不能持續下去的。……新音樂自己為此做出了犧牲。它把這個世界的全部黑暗和罪孽都背在自己身上。……它是真正的海上傳信的浮瓶」（曹俊峰譯，2017，頁 238-241）。阿多諾同時觀察到：廣大聽眾與新音樂隔絕、避而遠之，殊不知，讓他們無所適從的不和諧，其最深刻的源流，正是來自這些聽眾的真實處境（曹俊峰譯，2017，頁 119）。

---

<sup>5</sup> 薩依德引述阿多諾的論述，認為貝多芬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最後階段），包括最後五首鋼琴奏鳴曲、第九號交響曲、莊嚴彌撒曲、最後六首弦樂四重奏與最後十七首鋼琴小品等，構成近代文化史的一個事件（Said, 2006, p. 7-8）。

<sup>6</sup> 曼清楚記述這個部份，完全是那天阿多諾在他家中邊彈邊解說，然後由他以文字記錄下來，《浮士德博士》第八章這一段〈為什麼貝多芬沒有為他的鋼琴奏鳴曲作品 111，寫第三樂章〉的以文字描述音樂，堪稱經典。1945 年 12 月底的書信裡，曼向阿多諾表示，他的指揮家好友華特（B. Walter）高度稱讚「從未有如此好的貝多芬論」（Adorno & Mann, 2006, p. 13）。

然而，曼將十二音列技法詮釋為雷維庫恩「浮士德交易」的突破，等同災難的納粹德國是有問題的。事實上，希特勒（A. Hitler）不僅排斥苟白克的音樂，而且他只是利用華格納與貝多芬的音樂，1942 年甚至為了自己生日，要求當時指揮家福特萬格勒（W. Furtwangler）演奏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我們甚至還可以推想，當時到底有多少德國人是真正理解尼采哲學。於是，這龐大總體的「音樂取向」詮釋嘗試，不僅樞密顧問有異見，就連苟白克也要求《浮士德博士》書末補記與澄清。<sup>7</sup>

應該準確說，是力量讓音樂必須服務於它。福特萬格勒選擇留在國內，盡其所能保護樂團與音樂家，其屈身納粹之下並非為虎作倀，而是更為艱難的人道主義實踐。2001 年在匈牙利導演斯拉波（I. Szabo）的影片【一個指揮家的抉擇】中，片尾的紀錄片讓我們看到：當福特萬格勒指揮結束，以右手與台下納粹軍官握手後，隨即左手轉換手帕給右手，然後右手搓揉的細微動作特寫，終於讓人理解福特萬格勒的內心世界。音樂在面對力量的必須屈服與婉轉曲折，實令人心碎與尊敬。

對照福特萬格勒以音樂對納粹力量的隱晦抗議，然後再反觀曼在《浮士德博士》將音樂與納粹力量聯結，並在最後以大提琴高音 g 反轉希望，化為暗夜裡一盞燈。我們也許可以如薩依德所言，曼已經嘗試努力「用學識、奉獻與道德目的來支撐他的視野」，做了流亡在外可以為之所為的最大可能。但我們也應更能體會何以奧爾巴赫在《摹仿論》最後所言「這些快速的變化使人們產生了更大的迷茫，因為作為一個整體，這些變化的全貌是無法看到的」，以致今天看來奧爾巴赫解說法西斯的源起比起曼的「德國音樂論」更有說服力：

人們試圖靠攏某一宗派，用一個萬能方子去解決所有的問題，靠巨大的內部力量促成團體的形成，排斥一切不順從和不適應的人。這

---

<sup>7</sup> 從 1951 年開始，這書末加印以下〈作者識〉：「向讀者告知此事，似非多餘：本書第二十二章所述作曲方法，即而十二音或音列技法，實是當代作曲家兼理論家阿諾德·苟白克的智慧財產，我根據某種想像的脈絡，將之移植於一位出於虛構的音樂家，亦即這部小說的悲劇主角。大致而言，小說中有關音樂理論的部分，頗多細節功在苟白克的《和聲理論》」（彭淮棟譯，2015，頁 591）。

種做法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當法西斯在許多歐洲文化古國擴充蔓延並吸收小宗派勢力時，在很多人那裡幾乎都不需要動用什麼外部力量（吳鱗綬、周新建、高艷婷譯，2014，頁 648-649）。

變化的總體全貌是無法看到的，以致於當面對困難時，提出一個自認為可以看清並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方子」(a single formula)，便虛幻地真實出現。希特勒最為極端殘酷，透過集中營的真相，讓人驚駭人性可以走到如此可怕境地。不過，我們也想起在 2003 年 10 月猶太裔指揮家巴倫波因（D. Barenboim）記述著薩依德在「西東詩篇管絃樂團」工作坊裡提及的「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惡魔」（Barenboim & Said, 2004, p. x）。如果曼的總體嘗試，不走向如阿多諾後來在《否定的辯證法》強調的不斷自我否定反省，那麼最終昇華的「暗夜裡一盞燈」，一段時日後，也很有可能成為另一個萬能方子。

### 三、知識分子的永恆臨時家園

在《世界·文本·批評家》的序言〈世俗批評〉裡，薩依德是如此結尾的：「從事批評和維持批判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Said, 1991, p. 30）。換言之，從對周遭世界的歸屬順從到距離覺醒，是知識分子的重要指標。

事實上，在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裡，其著作標題通常有著「批判」兩字，例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哥達綱領批判》與《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另外，《反杜林論》、《哲學的貧困》與《德意志意識形態》究其根本則分別是：杜林（E. Dühring）哲學批判、蒲魯東（P. Proudhon）哲學批判與對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

而早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裡，他就清楚呈現固定存有（being）與運動流變（becoming）的古希臘思想之間的差別。在論文裡，馬克思以伊壁鳩魯（Epicurus）「原子偏

離直線運動」論點反駁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的機械決定論，打破了命運的束縛，從而企圖從自然的角度闡明個人的自由意志與個體獨立性：盧克萊修（Lucretius）說得對，如果原子不是經常發生偏斜，就不會有原子的衝擊，原子的碰撞，因而世界永遠也不會創造出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1995，頁 36）。因此，像雅典學園般的知識家園是不存在的，知識分子的家園是永恆臨時的。

在《新音樂的哲學》裡，阿多諾即以「否定辯證法」陳述無調性音樂否定的否定特質。1966 年出版的《否定的辯證法》，不僅是其過去思想的集大成，同時也是馬克思博士論文核心思想的再論述。在這本不分段落的著作裡，我們看到阿多諾反傳統、反體系、反同一性與最終的不斷的否定。阿多諾唯心的思想論述同時也準確說明了唯物的真實世界。在此，阿多諾最終與黑格爾分道揚鑣：不是如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然後走向肯定既存體制；因為阿多諾認為「否定之否定並不會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證明這種否定不是充分的否定」，「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失之時都是否定的」（張峰譯，1993，頁 157）。阿多諾的思想走向徹底的虛無主義，從而幾乎完全否定任何有限個體的行動可能。然而，知識上不斷否定的虛無主義，難道必然導向否定個體行動的任何積極意義可能嗎？我們看到作為阿多諾追隨者的薩依德，其〈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的知識分子新論裡，雖然再次肯定前者的不斷否定，但卻也嘗試彰顯知識分子公共角色的可能。

以此而論，曼在《浮士德博士》終局裡的「暗夜一盞燈」雖是一隅之見，但應屬曼個人的積極公共角色自許。問題較大的，反而是阿多諾提供的音樂知識，讓曼據以延伸的德國音樂災難論。如果，曼的知識見解變成傳統、體系與鐵板一塊的同一性，而沒有繼續不斷的否定，那麼自然就會變成被批判的對象。事實上，法西斯源自義大利墨索里尼（B. Mussolini），西班牙的佛朗哥（F. Franco）政權也是，但不會有人將這兩個國家的走向與其國家的音樂連結。

因此在認識論上，自認已經掌握整體、全體，或是如指揮家般統管樂團全局，其實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可能。而如果依舊執意此一通觀全局的詮釋，

即使像曼《浮士德博士》這樣費盡心思的以雷維庫恩為原型解釋德國的第二次災難，也僅僅只是一隅之見。要將一隅當成總體，當然虛幻。

但就像前述提及的「奧爾巴哈問題」一樣，總不能就此無所作為。明知有限但仍實在地提出主張、著述，然後自省地知道這實在的有限，繼續像蚯蚓般有限地努力。誠如薩依德在〈作家與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的最後臨時家園話語：

因此我的結論是這麼樣的一個想法：那就是，知識份子的臨時家園是一種緊迫的、抵抗的、毫不妥協的藝術領域（如阿多諾所言）——唉！他既不能由此退卻，也不能從中尋求解決方案。但是，只有在那種動盪不安的流亡地帶，一個人才能第一次真正領悟那無法把握的東西之艱難，然後，無論如何，繼續努力（Said, 2004a, p. 144）。

## 參、後殖民論述的民主意含

當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原本聯合國劃給巴勒斯坦的許多土地，被以色列軍事占領後，1969 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 Meir）竟說：「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於是，薩依德自許接下這個荒謬的挑戰，決定一分鐘一分鐘、一個字一個字、一英寸一英寸去解救，清楚地說出巴勒斯坦人被剝奪的歷史（Said, 2003, p. ix）。

這個荒謬其實也正照見了政治人性最黑暗的部份。一個經歷流離失所、可怕集中營苦難的猶太民族，其所建立的以色列，今天卻正步步蠶食聯合國分治計畫中畫給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僅剩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希伯來大學的第一任校長馬格內斯（J. Magnes）很早就意識到，如果把以色列侵略性的屯墾政策一意孤行下去而罔顧阿拉伯人的感受，雙方的衝突勢所難免，於是他說：「讓我們用更道德和更深刻的方式思考阿拉伯人問題。讓我們以他們的存在而不是他們的不存在思考他們」（Said, 2003, p. 7-8）。另外，在 1979 年薩依德所寫的《巴勒斯坦問題》著作裡，他就以巴勒斯坦人身分第一次公開表示：我們巴勒斯坦人必須與以色列的猶太人生活在一起、和平共存。因

此薩依德並不能認同像伊拉克、葉門等阿拉伯國家，在 1948 年將國內的猶太人趕回以色列；當 1956 年埃及同樣將國內的猶太人趕走時，薩依德感歎說「沒有什麼比這更愚蠢又缺乏遠見了」（單德興譯，2005，頁 304）。

在巴勒斯坦人切身痛苦的反思之上，薩依德 1978 年出版《東方主義》，深刻檢視西方世界在帝國殖民過程中的作為與其文化霸權。而在續篇《文化與帝國主義》裡，薩依德發現不管是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傳統，西方殖民者在面對被殖民者的態度上幾乎是如出一轍。正如《東方主義》一開始，他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的話語：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再現與詮釋。<sup>8</sup>

## 一、社會主義傳統的盡頭與出路

許多人將法農（F.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比喻為，反殖民主義的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然而在薩依德《東方主義》的論述裡，馬克思關於被殖民世界的觀點與執行帝國政策行政官員的看法並無太大差別。薩依德困惑的話語是：「在東方主義的觀點籠罩之下，人類的同情心消失到哪裡去了？」然後薩依德自問自答地回應：「這個學術檢查體系，趕走馬克思的同情心，換上對亞洲人的新定義：這些人並未受苦，他們是東方人，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Said, 1979, p. 155）。

發表於 1853 年關於分析英國如何統治印度的文章，馬克思明確地表達在此之後社會主義傳統的關鍵訊息。<sup>9</sup>為此，即使 1917 年後的蘇聯或是西歐透過選舉產生的左派政府，對於被殖民世界的苦難並無法真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而這造成，在未來勞動力市場更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裡進退失據。1991 年的蘇聯崩解其實早有脈絡可循。

---

<sup>8</sup> 馬克思在這裡是感嘆法國農民無法清楚自己的階級利益，錯誤地支持路易拿破崙(L. Napoleon)，使之當選法國第二共和總統結果的評語。

<sup>9</sup> 馬克思評論英國必須統治印度的理由，同樣適用英國對大清王朝發動鴉片戰爭一樣，同時也對所有西方殖民主義者提供了合理藉口：「英國必須在印度完成雙重革命，一是摧毀，另一是再生。消除亞洲傳統的社會，並為亞洲的西方社會奠定其物質基礎」（Said, 1979, p. 154）。

最早觀察到此一左派困境的是法國思想家韋依 (S. Weil)。1936 年 2 月的西班牙與同年 6 月的法國，左派都以人民陣線之名，經過選舉取得執政權。而在將近一年的法國社會黨總理布魯姆 (L. Blum) 執政後，是韋依對單一國家理想主義的終結。在 1937 年 11 月〈工人的境遇〉的文章裡，韋依列舉其調查報告指出：不同國家的工人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與不平等，而那些工人狀況得到改善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會處於劣勢。據此，韋依認為當務之急是達成一個國際協定，讓一個國家取得的社會進步也能在其他國家引起相應的變革，否則，即使在某些國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將很難在世界範圍內維繫下去 (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 592)。財政困難是布魯姆下台的主因，當他想推行國有化與社會福利政策時，他沒有辦法阻止法國資本家將錢匯出法國，外逃的資金將近 600 億法郎<sup>10</sup>。韋依的此份調查報告，對比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國際資金任意移動的當代世界，實有著先見之明。

此外，薩依德在〈論惹內〉的文章裡特別推崇惹內 (J. Genet) 在 1970 與 1980 年代敢站在巴勒斯坦這邊說話，是最危險的政治選擇 (Said, 2006, p. 85)。在阿爾及利亞對抗法國的過程中，身為法國人的惹內與沙特非常有勇氣地選擇站在阿爾及利亞那邊。但惹內告訴薩依德，沙特還是懦弱了些：由於擔心被指責為反猶主義，沙特在以巴衝突中還是選擇支持以色列 (Said, 2006, p. 77-78)。

事實上，在法農對抗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戰鬥中，生前最後寫下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非常期待沙特幫他寫序，沙特也回應了法農的要求，寫下 1961 年著名的序言。然而在這篇序言裡，沙特是為法農所說的暴力辯護：「人們讀一讀法農是有益的；法農充分指出這種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荒謬的風

---

<sup>10</sup> 歷史似乎時常週期似地重演。1981 年法國社會黨密特朗 (F. Mitterrand) 當選總統後，一開始執行其選民負託的重要產業國有化時，法國資金就開始嚴重外流。據統計，1981 年外流資金約 500 億法郎，1982 年逃漏稅約達 900 億法郎，幾乎等於法國當年的財政赤字。大資本家的反對和抵制，進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財政危機，使國有化改革帶來嚴重的後果。後來密特朗為了希望阻擋資金外流而調高法國利率，但這些大資本家根本不領情，結果反而加重經濟蕭條。之後當民眾把不滿情緒反應在國會議員補選後，密特朗只好做政策調整。以上例子告訴我們：在國際資本跳脫民族國家的束縛之後 (特別是有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為其背書時)，任何嘗試進行偏向勞工政策的政黨，其所可能面對的窘境。

暴，也不是野蠻天性的死灰復燃，甚至也不是一種怨恨的結果：這是一個人如何再創造自己」(Fanon, 1967, p. 18)。然而法農在書中卻是對為何產生暴力進行分析：「被殖民者決定實現這個計畫，把它變成動力，隨時準備使用暴力。被殖民者從其誕生起就清楚這個變得狹小的、佈滿禁令的世界，對他來說，只能通過絕對的暴力來進行訴訟」(Fanon, 1967, p. 29)。也因此，法農在聽完沙特為他寫的序後未作任何評論，他保持異常的沈默，最後他對友人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清楚表述自己的觀點。

從以上馬克思與沙特的例子裡，我們最終發現：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地代表別人發言；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在認識論上，他者即使再如何地好意、替別人設想，也都會產生倫理學上的主體越位。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他者，他者必須由他們自己來再現與詮釋。然由於多數受壓迫者大都沒機會受到應有教育，因此不能說、不敢說、甚至不知該如何訴說自己命運。絕大多數不幸的人，被極少數金字塔頂端權貴越位發言，因此弱勢階級的文化遠未形塑，甚至還日益被削弱。<sup>11</sup>在過去是歐美帝國主義的強勢殖民者文化，而今則是有購買力者的消費文化，普羅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仍遠遠落後，因此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會特別標示英國文化研究者威廉斯 (R. Williams) 的重要。1989 年，薩依德作為威廉斯紀念講座的第一位被邀請者，他選擇既批判又傳承威廉斯的道路。

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中，以文化代替文學，希望不斷拓展文化的定義，直到文化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成為同義 (Williams, 1993a, p. 256)。另外，在《綿長革命》的文化分析中，威廉斯說明了文化的三種形式，特別是第三種的社會定義 (Williams, 1992, p. 41-42)，可說部份奠定了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然而正如薩依德所指出的，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裡完全

---

<sup>11</sup> 早在 1927 年班雅明 (W. Benjamin) 遊歷莫斯科後，就感受到當時俄國的文化落後狀態，造成當時新政權面臨嚴酷考驗，他說：「俄國普羅階級在革命成功後的狀況是多麼不同於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狀況。當時布爾喬亞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文化鬥爭，那時教育早就被第三等級思想滲透，思想爭奪戰先於政治變遷。然而今天俄國情況卻完全不同，文盲成千上萬，普遍教育的基礎還有待建設，而這正是當前俄國最重要的全國性任務」(Benjamin, 1978, p. 118)。

不處理帝國經驗，這經驗的暫時被擱置，反應了威廉斯個人「情感結構」上的侷限。而威廉斯認為英國文學主要就是有關英國的理念，其實是間接支持與鞏固英帝國的殖民運作（Said, 1994, p. 14）。而這樣的侷限在《鄉村與城市》裡，由於威廉斯將英國城鄉分析漸次擴展到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在書的最後第 24〈新大都會〉（1993b），終於才有了比較詳盡的說明。

薩依德在解析了康拉德（J. Conrad）《黑暗之心》的非洲內陸與《諾斯托洛摩》的南美洲背景之後，他同時告訴我們奧斯汀（J. Austen）《曼斯斐爾公園》背後隱藏了加勒比海殖民經濟支撐、威爾第（G. Verdi）歌劇《阿依達》的創作背景是埃及蘇彝士運河開通。另外，還有吉卜齡（R. Kipling）《金姆》的印度與卡謬（A. Camus）《異鄉人》的阿爾及利亞等等，薩依德告訴我們：在帝國殖民的同時，也將全世界最偏遠的角落聯結在一起（Said, 1994, p. 6）。

威廉斯的文化研究重心確實在英國，對於歐洲之外的其他世界，並無主體性的研究關照。即使多所保留，但薩依德依然明言，我們應好好遵循威廉斯所開啟的道路，將其國家英國，擺到世界的更大範圍地圖上（Said, 1994, p. 83）。而這確實是社會主義傳統的盡頭與可能出路。

## 二、自由主義傳統的侷限與蛻變

薩依德在 1993 年接受訪談時，稱許羅素（B. Russell）與杭士基（N. Chomsky）的作為，並對比批評哈伯馬斯（J. Habermas）關於公共領域與現代性論述，是缺乏道德核心的空話（單德興譯，2005，頁 305）。<sup>12</sup>

有意味的是，在薩依德過世後，針對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哈伯馬斯發表《分裂的西方》一書認為：美國公然違反國際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已使自己的規範權威頹圮於廢墟之中。哈伯馬斯並將美國如此走向單邊主義霸權的原因，歸結為美國承襲的是穆勒（J. S. Mill）的自由民族主義，而不是現在歐洲希望的康德世界公民主義（Habermas, 2006, p. 30）。

---

<sup>12</sup>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薩依德記述著哈伯馬斯在 1986 年英國《新左評論》接受訪談時，對於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抗爭沒什麼好說，並清楚陳述這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侷限事實（Said, 1994, p. 278）。

哈伯馬斯回顧過去國際法的制定過程，並期許未來的國際法可以取得大家的認可，特別是強權國家的遵守。他指出，傳統的自由民族主義國際法是由相同地位的國際法主體，也就是具有相同權力的主權國家所協定，而各個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權力，並不會因其疆域、人口或政經實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獲得此權力平等的同時也付出相對代價，那就是，各國必須承認戰爭是解決紛爭的機制。因此在這個民族國家時代，許多所謂的自由與和平是透過軍事脅迫所達成的。但如此現實權力世界，對康德來說並不是理想狀況，在其 1784 年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與 1795 年的〈論永久和平〉的兩篇文章中，康德即希望：各民族國家不應像在自然狀態中以戰爭解決紛爭，而是應該透過啟蒙，使每個人成為世界公民，從而促成世界的永久和平 (Kant, 1970)。因此，如何從自由民族主義轉化為世界公民主義，是許多如哈伯馬斯等歐陸知識分子認為的當前要務。

另一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羅爾斯 (J. Rawls)。<sup>13</sup>羅爾斯不只參加 1967 年在華盛頓的反越戰會議，1969 年在哈佛大學的春季學期裡，他還開設了一門戰爭問題課程。羅爾斯認為造成這場不義之戰的癥結在於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允許有錢人和大公司（尤其是軍火工業）通過其捐助政黨和政治組織去掌控政治競選。在總結反省 1960 年代之書的《一種正義論》，其 36 小節〈政治正義與憲法〉，羅爾斯如此論述：

從歷史上看，憲制政府的主要缺陷之一是，未能確保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資產和財富的不平等遠超出了政治平等所能包容的程度，而這些不平等在法律體系內卻受到普遍的寬容 (Rawls, 1999a, p. 198-199)。

---

<sup>13</sup> 1995 年羅爾斯回應哈伯馬斯關於《政治自由主義》的評論時，羅爾斯認為他們之間最大的差異是，哈伯馬斯是全面性的學說觀點，而他則是一種政治的正義架構。而最後，羅爾斯與哈伯馬斯也彼此明言，他們之間的不同看法是屬於家族之間的爭論 (Rawls, 1996, p. 434)。不過，或許是羅爾斯與杭士基一樣，一直勇於面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理想與現實，並不斷地成長尋求出路，讓薩依德對羅爾斯的作為抱持期待而未有批判。

另一方面，由於 1960 年代造成美國社會的普遍政治化，美國人民更加積極表達他們對政府政策的不滿。這種情況，對於許多自許權貴菁英來說，這是無知民眾過度參與的民主危機，而這危機如不有效遏止將會在全世界蔓延。因此權貴們亟思，如何讓這些無知民眾重新回到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在這樣的集體認知下，以美國大資本家洛克斐勒 (D. Rockefeller) 為首，在 1970 年代發起「三邊委員會」，由哈佛大學學者杭廷頓 (S. Huntington) 主導，召集美國、歐洲與日本三邊的保守派菁英，學習 1916 年美國總統威爾遜 (W. Wilson) 的「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 細膩宣傳手法 (希特勒的宣傳機構即是以這個委員會的運作為學習榜樣)，嘗試化解這一波民主危機。三邊委員會後來研擬出新的具體作法是：增加企業遊說力量與成立眾多右翼智庫，以此讓國會議員與國會法案依循其所設定的議題方向走。果然隔年 1976 年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巴克利訴瓦利奧」(Buckley v. Valeo) 的判決中，即展現了企業遊說實力。美國最高法院最後裁定這個判決違憲，理由是立法機關設定政治獻金上限，會削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羅爾斯對「巴克利訴瓦利奧」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深感不滿，認為最高法院把言論自由的一個邊際性權利，賦予了過於核心的地位，而如此，則等於把「民主看成是一種不同的經濟階級和利益團體間受控制的競爭，其結果則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每一方運用其金融資源和手段 (顯然是很不平等的)，讓人們了解其欲求的那種能力和意願。……而若無對於維護背景正義的公共認知，公民們便會傾向於變得忿忿不平、玩世不恭和麻木不仁」(Rawls, 1996, p. 361, 363)。結果自此之後，美國的民主政治選舉成了政治獻金多寡的擂台賽，愈來愈多美國選民感受到，民主與共和兩黨主要都受到大企業獻金影響，一般升斗小民對政策法案根本無緣置喙，忿忿不平之後的結果是投票率日益下降。以致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投票率逐年降低到六成以下，而中間的期中國會選舉竟然低到四成以下。1996 年的總統大選投票率甚至低於五成。

14

---

<sup>14</sup> 美國權貴們終於達到他們設定的目標，超過一半以上的美國人民對公共事物無從關心起，無知民眾果然重新回到對政治的漠不關心。

另外，在 1995 年羅爾斯回應哈伯馬斯關於其《政治自由主義》的論述裡，他困惑並大哉問「為什麼政治自由主義沒有更早一些建立起來：若政治生活中的理性多元事實是既定的，則提出自由主義的理念似乎就是一種很自然的方式。難道是這一學說具有各種為以前的著作家們可能會在我所沒有看到的地方發現的深刻缺失，而這一點導致他們放棄了這一學說」(Rawls, 1996, p. 374)？事實上，羅爾斯的此一謙遜的困惑，正是任何一位歐洲中心主義者在今天全球化後殖民時代終究必須正視的問題。政治自由主義沒有更早建立起來，正是不願面對後殖民新興國家可以獨立自主的事實。

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提及即使是具有高度反省能力的前美國總統卡特 (J. Carter) 也還是相當突兀地指出，西方社會對於整個去殖民化的過程，有一種相互毀滅的感覺。這種感覺引起西方人士重新思考去殖民化的整個過程是否必要：難道不是我們給予他們進步和現代化的嗎？難道不是我們曾經提供給他們秩序和某種穩定性，而那是他們始終無法自求的嗎？相信他們有能力獨立難道不是一種嚴重誤置的信任嗎 (Said, 1994, p. 22)？羅爾斯的困惑與卡特的感覺，在在提醒我們，任何文明的強勢者是多麼容易陷入主體越位的陷阱中。

1999 年完成的《萬民法》，是晚年羅爾斯嘗試跨出美國與歐洲，思考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如何和平共處的迫切課題。書中羅爾斯甚至想像一個理想化的伊斯蘭正派民族卡贊尼斯坦 (Kazanistan)<sup>15</sup>，這個非自由主義的民族如何與西方自由主義民族共同背書萬民法。事實上，羅爾斯是第一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家，真正將非西方民族國家當作可以平起平坐的主體，然後思考如何平等互動 (哈伯馬斯的康德世界公民主義，依舊只有西方國家有主體性)。不過，羅爾斯若對世界歷史有更多認識的話，他是完全不須想像一個卡贊尼斯坦。正如薩依德曾經表示的：「我們每個大學裡的幾乎每一

---

<sup>15</sup> 羅爾斯描述卡贊尼斯坦的法律制度並非政教分離，伊斯蘭教獲得特殊優待，只有穆斯林可以獲取具有上層的政治權威地位，並影響政府的主要決策與政策，除了沒有權利取得上層政治或司法職務外，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無須恐懼或失去大多數的公民權 (Rawls, 1999b, p. 75-76)。

項中世紀研究計畫都照例忽略了中世紀文化的高峰之一，也就是 1492 年之前的穆斯林安達魯西亞」( Said, 2004a, p. 54)。

### 三、後殖民地地理學的民主人文主義

後殖民地地理學是指，過去人們思考問題主要僅在一國之內，然在經歷五百多年的西方殖民過程後，如今人們必須從全球化國際角度思考，才能掌握問題核心。前面羅爾斯從《一種正義論》、《政治自由主義》以至《萬民法》的蛻變，正是後殖民地地理學必須獲得正視的時刻。

薩依德的空間思考，來自葛蘭西 (A. Gramsci) 的啟發。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主要就是呈現在空間領域的爭奪上。正如薩依德所說的，盧卡奇 (G. Lukacs) 是屬於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 (G. Hegel) 傳統，其《歷史與階級意識》思考模式，是由時間與歷史來架構的；而葛蘭西的觀點則是維科 (G. Vico)、克羅齊 (B. Croce) 的空間地理學轉向 (Said, 1994, p. 49)。葛蘭西發現，即使在一國之內，理解南北義大利的分歧至關重要，他稱許戈貝帝 (P. Gobetti) 不只洞悉義大利的南北差距，同時提出必須聯合北方無產階級與南方農民的第一個知識分子。薩依德後來還引述布爾迪厄 (P. Bourdieu) 關於空間思考的重要：一個人只有對社會空間結構和物理空間結構之間的關係進行嚴格分析，才能脫離實體論者關於空間思想的錯誤 (Said, 2004a, p. 83)。

這種不同地理空間的思考，轉換到國際後，展現的問題核心可能就不是先前馬克思同情心的如何被遮蔽，而是直接揭露一位捍衛言論自由的穆勒，如何也是一位將被殖民者當成非人的帝國主義代言人。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薩依德兩度引用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關於英國與西印度群島的經濟往來，穆勒如何堅持，那只是上對下的城鄉交流而非平等之間的國際貿易互動 (Said, 1994, p. 90)。

當代將後殖民地地理學發揚光大的是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哈維。哈維發現只要有利可圖，資本的空間選擇絕對不會排斥社會主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如今可以所向披靡，除英國柴契爾夫人 (M. Thatcher) 與美國雷根 (R. Reagan) 的主導之外，沒有 1978 年中國鄧

小平的朝向市場化政策是不可能達成的 (Harvey, 2005, p.1)。事實上，正是鄧小平 1978 年後讓幾億中國勞工加入世界勞動市場，才讓跨國企業可以跨越國界為所欲為的關鍵。而在 2016 年《世界的邏輯》〈引言〉裡，哈維再次跨國詮釋，2008 年美國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是中國大規模城鎮化和固定資產投資拯救了世界經濟。在 2008 年之後，中國透過人民幣的債務融資，消費了全球 60% 的銅與半數以上的鐵礦和水泥。然而 2012 年開始的房價下跌使得中國債務急劇升高（不過，中國只要啟動自己的印鈔機，即可像美國一樣脫困），以及獲利資本的大量積累無處消化，使得中國現正進行的兩大新計畫，讓哈維深感憂心：一個是在國際間推動的一帶一路計畫，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另一個則是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冀協同計畫，在總面積與美國肯塔基州相似的共約 1.3 億人城市群裡，進行交通和通信建設，讓資本有帶有路繼續擴展。

哈維理解資本希望繼續積累再生產的特性，但他對中國資本即將強烈改變世界地貌，表達高度疑慮。他自問：究竟是否應該繼續這樣的路徑，還是應該從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無限度資金積累的動機。同時他也自我回應：中國這種城鎮化的方式並不可取，無論是出於社會、環境、美學、人文還是政治角度。在這種吞噬一切的發展面前，想要保持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反而會造成人性與環境最深層次的疏離（周大昕譯，2017，頁 xvi-xxi）。

哈維對人性與環境的疏離憂慮，加上資本會朝向無止境的複合成長，這三項危機正是他在 2014 年《資本社會的 17 個矛盾》<sup>16</sup>中，最後三個會成為危險的矛盾。在該書結語〈幸福但有爭議的未來：革命人文（人道）主義的希望〉裡，哈維轉述了法農關於民族主義的困境論述：「如果我們不解釋、豐富和深化民族主義，如果民族主義不迅速轉化為一種社會和政治意識，不轉化為人文（人道）主義，它將走入死胡同」（Fanon, 1967, p. 165）。

誠如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書中所說「假如我所以如此經常引用法農，乃是因為我相信他比任何其他更戲劇性地、決定性地表現了從民族

---

<sup>16</sup> 原文書名是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若直譯應是《17 個矛盾與資本主義的終結》。

主義獨立的藩籬到解放理論領域的巨大文化轉移」(Said, 1994, p. 268)。法農認知到阿爾及利亞在未來脫離法國後，將會產生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路線與民族如何真正解放路線的區分，而前者則會在破除殖民壓制同時，自動建立起另一個剝削系統。因此，薩依德說「法農是反帝國主義的主要理論家中第一個了解到，正統民族主義會追隨帝國主義所開闢路徑而行的人，當帝國主義公然將權威轉讓給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時，它真的已擴充其霸權」(Said, 1994, p. 273)。薩依德為此感嘆阿拉法特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因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而選擇支持伊拉克海珊(S. Hussein)，讓他進退失據，從而使他後來必須與以色列、美國簽下奧斯陸和平協議，以重新取得巴勒斯坦主導權。而《文化與帝國主義》上述法農論述，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寫下。奧斯陸和平協議此一被薩依德痛斥為巴勒斯坦人的「凡爾賽條約」，不只讓他與阿拉法特正式決裂，同時深切體會法農早先所認知的，被殖民者如何從獨立自主民族主義走向人文開放的民主主義的艱難。事實上，不只海珊、阿拉法特如此，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至今日中國領導階層也難以跳脫此一艱難窠臼，被壓迫者太容易以正統民族主義追隨過去帝國主義相同路徑而行，而這正是法農所不樂見的預見。

毛澤東試驗的文化大革命解放路線，沒有人文主義，更不要說民主人文主義；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四個現代化正統民族主義路線，依舊排除了魏京生要求的民主現代化。在經歷胡耀邦、趙紫陽之後，江澤民、胡錦濤以至今日習近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前竟走向「最資本」的新自由主義道路。胡耀邦階段是最有可能漸次實現民主人文主義的，但為何幕後影武者鄧小平會最終否決？<sup>17</sup>相信這不只是魏京生、王丹與劉曉波心中永遠的痛，也是哈維當前的擔憂。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運動，即使 2010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無法改變之前鄧小平否決的路向。一直到 2017 年 7 月 13 日過世，近七年劉曉波都不願選擇放逐離開中國，從軟禁至過世他都平和應對。<sup>18</sup>是否他後來也感受到

---

<sup>17</sup> 胡耀邦對圖博(西藏)的同情(直言中央補助的錢，難道都被扔到雅魯藏布江去了嗎?)與對當時方勵之鼓吹民主的寬容，應是他被迫下台的關鍵。

<sup>18</sup> 劉曉波一生有多次離開中國、長居外地機會，但他都沒有選擇離開，為此他說：「回

這個巨大轉型的困難，相信這不僅是中國問題，同時也是普世問題。<sup>19</sup>誠如法農所說，如何讓解放以其真確的本質，發展成超越民族意識的社會意識？民族主義意識太容易導向僵固教條的發展，當殖民者最後一個士兵離開後，被殖民者要能立即蛻變成具有真正社會意識轉型的解放國家是相當困難的。正如泰戈爾（R. Tagore）早於 1917 年《民族主義》中就提到，印度對此的回應不該是提供一個爭強好勝的民族主義，而是如何在此之上的創造性解答（Said, 1994, p. 215）。

或許如韋依觀察到的，泰戈爾的創造性解答可以是達成一個國際協定，讓一個國家取得的社會進步也能在其他國家引起相應的變革，否則，即使在某些國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將很難在世界範圍內維繫下去。因此今天民主人文主義，絕不可能單靠單一國家可以自我實現，透過後殖民地理學的資本跨國移動，讓我們更清楚這整個新自由主義讓「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遠比「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容易的多（趙汀陽、德布雷（R. Debray），2014，頁 112）。有意味的是，薩依德《文化與帝國主義》與哈維《資本社會的 17 個矛盾》共同引用法農在《全世界受苦的人》裡的一段話：「為此，首先必須歐洲人決定醒來，動動自己的腦子，並停止玩那不負責任的睡美人遊戲了」（Fanon, 1967, p. 84）。

如今應該不只是歐洲人，而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一起覺醒起來，才有可能改變現實。這是人文主義者何以主張，每一個人都要學會獨立自主之民主真義所在。<sup>20</sup>

---

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直至 2017 年病危時，劉曉波才表示希望出國治療。他身邊友人認為，他此舉是希望讓妻子劉霞能得到自由。

<sup>19</sup> 關於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內容，詳見陳奎德、夏明（編）《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不過，2003 年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劉曉波卻為文支持，並對西方設定的主要遊戲規則的看法是，它們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優勢，而是因為道義優勢（劉曉波，2006，頁 148-149）。不知劉曉波後來觀點是否有修正，否則他對當今世界的整體判斷會有問題。希望這樣的批評，不是對他的苛求。

<sup>20</sup> 2016 年 11 月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D. Trump），其隔年的穆斯林國家禁令、興築美墨邊境圍牆、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承認以色列的定都耶路撒冷政策中，我們發現國際社會產生普遍的危機意識與應對。克萊恩（N. Klein）在《不能光說 No》中認為，川普上台並非一般的政黨輪替，而是徹底解構行政國

## 肆、回到語文與音樂的美學

1969年薩依德翻譯奧爾巴赫於1951年就寫的〈語文學與世界文學〉，其中奧爾巴赫認為世界文學的概念在實現的同時也毀壞了。當體悟到巨大總體不可能全然理解之際，於是便轉趨專門研究。然而將自身限制在某一專門領域，是不足以成為一位優秀的專家，於是奧爾巴赫自問「一個人如何能有一種既學術又綜合的世界文學語文學呢」(E. Said & M. Said, 1969, p. 9)？奧爾巴赫的自答是，語文學的家園已不再是單一國家而是整個地球，而語文學者繼承最珍貴的傳統仍是自己的民族文化與語言；但只有這個學者先脫離自己的傳統，然後再超越它，這一傳統才具有真正的活力。此外，比起語言文字，音樂更能直接觸動人心，如巴倫波因所說，音樂揭露宇宙中人類一體的實相；或如薩依德所說，當音樂響起時，所有世俗的國家、階級或身份都會被拋諸腦後。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書中薩依德陳述兩種思考模式：一為直線規約，一為對位遊牧，他並推崇第二種思考模式，是理解人類歷史的較好角度(Said, 1994, p. xxv)。前述奧爾巴赫的先脫離傳統、然後再超越的語文學，正是薩依德所推崇的對位遊牧思考模式。不過，可惜的是即使今天已進入世界文學語文學時代，但由於幾百年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優越心態，所以就像維科在其《新科學》中所說的「由於人類心智的不確定性，每當它陷入無知的境地時，人就會把自己當成萬物的尺度。」(Vico, 1999, p. 75)許多美國人文主義者承續的西方正典論思考模式卻是直線規約的。

### 一、獨白而非對話的西方正典論

薩依德很早就認為，西方人文學科與我們的傳統、最偉大的著作等號應該取消，因為還有其他傳統的人文學科。這個由白種人男性獨白，不願與其

---

的企業吞併，之前公司還需要笑臉演員雷根與牛仔小布希(G. Bush II)偽裝，而川普代表的是「他們連裝都懶得再裝了」(朱崇旻譯，2017，頁27)。

他族群、性別對話的人文傳統，也就是西方正典論的論述，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危機、1960 年代多元文化洗禮（如法農所說「希臘羅馬雕像正在殖民地破碎」），以及哥倫布（C. Columbus）到達美洲 500 週年的 1992 年省思後，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停留原地。

### （一）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

薩依德對艾略特的評論，有可能是本文認為唯一需要斟酌的。正如阿多諾在哲學與音樂上拒絕被理解一樣，艾略特是文學上的另一個阿多諾，等待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寫作的原意。艾略特是一個深受歐陸基督教文化影響的道地美國人，但他卻對英美經驗實證論徹底排斥。艾略特不滿英美社會的集體驕傲自負，認為那是一整套拋棄倫理學的經濟學，其不道德的自由主義競爭機制將會導致戰爭。有人覺察到艾略特是文學上的布爾什維克：他對傳統的重視與強調，是表面上的保守反動掩飾他本質上的基進。

1922 年來自大西洋兩岸的喬伊斯《尤利西斯》與艾略特《荒原》先後出版，共同指向西方文明主導地位的結束。艾略特眼見黑暗並無止盡，於是回歸過去傳統，自許為孤獨的精神貴族。薩依德依據 1934 年艾略特在維吉尼亞大學的演講，批評此一精神貴族式的人文主義：

這些著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幅荒蕪、無聊的全景圖。除了用一道道牆壁把文學、藝術世界隔離開來之外，這一正統學說強調文學的形式性（也許處於高度現代主義的誤讀過度影響下），並且強調設想中的那些極其純粹的作品所提供的精神性和救贖性的改善。文學和人文主義所尊崇的是近乎神聖的、田園牧歌般的過去，既不是創造歷史、也不是改變歷史的過程（Said, 2004a, p. 17）。

我們設想，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讓艾略特做出返回精神性和救贖性的改善，要把自己從事的創作與現實世界隔離開來。1918 年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極度苛刻，讓艾略特非常不滿。《荒原》的悲觀絕望間接預示著，這樣的荒原土

壤上有可能培育出宣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萬能方子」的狂人出現。在無法挽回現實的情境下，1929年〈關於人文主義重新考慮後的意見〉中艾略特試圖釐清這樣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只對極少數的個人有效。這些個人是文化使他們團結在一起，而不是由於他們贊成一個共同的綱領或宣言。這樣一群『精神貴族』沒有使那些『世襲貴族』聯繫在一起的經濟紐帶」（李賦寧、王恩衷譯，2012，頁285-286）。

艾略特這樣的文化菁英論，再加上他反對各國文化混雜，讓薩依德覺得此路不通。但艾略特反對混雜的初衷是希望確保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樣性，他擔心混雜後將讓各種文化的差異性消失（如今天全球化都市的日趨一致性），因為一個國家既不能消極地接受外國文化，也不能將自己的文化強迫別國接受。也因此，艾略特只會推論出僅屬於西方自己的經典，與接下來兩個卜倫（Bloom）以西方正典獨尊截然不同。

## （二）艾倫·卜倫（Allan Bloom）的說教

前面提及 1960 年代強調文化的多元讓更多美國人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此之前，原本主流世界是白種人男性主導。而在這十年中，在為己存有而非為他存有的思潮帶動下，黑人起來要求平權，然後女性、性別認同等弱勢族群也起而要求平權。原本一元的社會價值觀，逐漸轉變為多元分呈景象。

艾倫·卜倫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正是對此一平權潮流所進行的反擊，正如為該書寫序的貝婁（S. Bellow）（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會屈尊紆貴地反諷說：讓我看看祖魯人的普魯斯特或非洲的托爾斯泰（L. Tolstoy）在哪裡。艾倫·卜倫認為人文主義大門一直向各種不守規矩的個人主義、聲名狼藉的時髦花樣和不受尊敬的知識敞開，結果造成真正的人文主義喪失名譽。於是，他開始進行一種簡化式說教，告訴大家什麼該讀、什麼不該讀，什麼有文化、什麼是沒文化。另一方面從 1920 年到 1970 年，美國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大學的數量卻增加了十倍。這迅速膨脹的大學教育體系，將過去獨立於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納入其中，結果是 1960 叛逆世代被體

制收編，美國大學大都成為左派思潮的大本營。也因為這樣，才會讓艾倫·卜倫認為大學本身就是個問題，走向了封閉的美國精神；因為在他看來，大部分大學迎合這個時代的放縱物質主義、大眾化潮流以及輕率多變、不道德的趨向。

事實上經歷 1960 年代之後，美國白種人男性在人口比例上逐漸下降。除了黑人有了具體平權、再加上日益增多的西語裔人（Hispanic），無怪乎艾倫·卜倫的話語會轉為一種心智上的倒退說教，無視於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而人口比例日益增加的黑人、西語裔人、亞洲人等，為什麼不能擁有等比例不同文化上的呈現呢？就薩依德的觀察，任何一個人文主義的重大成就，無不與那個階段的新事物，有著重要的關連。他以巴哈為例，巴哈作品之所以成為德國複調藝術的最高經典，正是它接受當時最新法國和義大利舞蹈風格影響之開端。

而不只美國，歐洲地區也朝著同樣的趨勢前進。今天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已經永久改變了英國、瑞典、法國、德國、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家（特別是大都市）的整體面貌，2016 年 5 月倫敦甚至選出來自巴基斯坦信奉穆斯林的移民後裔可汗（S. Khan）成為市長。自從西方世界向全世界要求商品自由流通、反對鎖國的保護主義後，不管在說理或道義上，當然也不能阻止人員的自由流通。然而排外的反移民問題，如今變成西方世界的重大關鍵政策，重新洗牌過去左派、右派之間的分野。目前城市的接受移民與鄉村的反對移民，成為西方多數國家的普遍難題。2016 年 11 月，標舉反移民大旗的鄉村美國選民，將充滿爭議的川普送進白宮。

### （三）哈洛·卜倫的憎恨

對比前面兩位的言說應對，來到哈洛·卜倫的《西方正典》就成了徹底的獨白。在《西方正典》中，哈洛·卜倫直接跳過古希臘荷馬，以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為正典核心，列舉了 26 位作家的作品作為整個西方正典的代表。哈洛·卜倫並以殊異性（strangeness）為其正典指標：「能為一部文學作品贏得正典地位的原創性其指標之一是一種殊異性，此殊異性若非教我

們無從完全吸融，便是化為天然既成之貌，使得我們感覺不到其特異之處」（高志仁譯，1998，頁7）。而究竟如何感覺到殊異，全由這位長期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哈洛·卜倫說了算。2000年出版的《如何讀，為什麼讀》是哈洛·卜倫正典獨白的續篇，他以自己閱讀經驗為中心，進一步為讀者導讀哪些作者的作品可列為經典。

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裡，罕見地對哈洛·卜倫個人進行嚴厲批評：「哈洛·卜倫對人文主義經典的看法顯示了心智的缺席而不是精神飽滿的存在：他幾乎總是拒絕在公開演講時回答問題，他拒絕捲入其它爭論，他只是簡單地斷言、肯定與吟誦。這是自我吹噓，不是人文主義，當然更不是開明的批評」（Said, 2004a, p. 27）。促使哈洛·卜倫如此不顧他人的自我設定獨白，正是19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500週年所引起的討論。如此討論讓原本白種人男性過去賴以維持的根本支柱為之動搖，他們痛恨這樣的討論。而將此一內心忿恨轉而向外之後，就成了哈洛·卜倫所稱的，那些想要摧毀西方正典的各種流派為憎恨學派。

事實上從1992年開始，哥倫布紀念日（10月第二週的星期一）的爭議日益升高。哥倫布日有著白人殖民主義的意涵，讓美洲原住民無法接受。美國將哥倫布日訂為國定假日已有80多年歷史，加州柏克萊地區率先於1992年使用「原住民日」取代，然後威斯康辛州、明尼蘇達州，以及華盛頓州的一些城市也跟著響應。而這一天到目前為止都仍是西班牙的國慶日。2015年5月當選巴塞隆納的女市長克勞（A. Colau）在那一天的社群網站上指出：「一個國家竟然會慶祝種族滅絕行徑，還動用80萬歐元進行閱兵，（我們）對此感到羞恥」。

西方正典論到了哈洛·卜倫這裡，我們或許更能理解班雅明所說的「沒有一份文明文獻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記錄」（Benjamin, 1968, p. 256），同時薩依德會說，是神學而非史學，才是這群正典人文主義的首席權威（Said, 2004a, p. 46）。薩依德甚至提醒大家，今天許多被封為聖徒的，常是昨日的異端反叛者。正典聖徒或是反叛異端如果不要只是成為無意義的形容詞，那麼回到他們言說語文的事實閱讀，是人文主義者所能努力的方向。

## 二、接受與抵抗的語文學

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第三章〈回到語文學〉，薩依德提到語文學就是對「語詞」(words)的熱愛，以及之後接受與抵抗的詮釋過程。薩依德特別提及那位思想最無所畏懼的尼采，總是標榜自己首先是一位語文學家。而在第四章對奧爾巴赫《摹仿論》語文學的推崇與導讀裡，薩依德正是要以奧爾巴赫對比前面正典論者令人驚駭的歧視缺陷。

奧爾巴赫提及世界的語文學問題是，在語文基礎擴大的過程中，需要將閱讀內容延伸到世界各地的文本<sup>21</sup>（目前台灣出版的書籍，已有多大比例是來自世界各國的翻譯書），因此更需要仔細體會「閱讀」(reading)的接受與抵抗、甚至是歸屬與超脫的過程。

另外，斯皮策(L. Spitzer)的觀點是：「人文學者相信人類心智研究人類心智的能力」(Spitzer, 1948, p. 24)。雖然斯皮策是來自歐陸的美國人文學者，但他這裡說的並非僅是歐洲人的心智或是西方經典，而是普遍的人類心智。斯皮策有一種深深自覺的反省，認為並沒有任何標準指南，一個人必須自己做出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他謙卑的開放心靈多麼不同於先前兩位卜倫的孤傲自大。在〈語言學與文學歷史〉接近同義反覆的細讀描述裡，斯皮策得出的是屬於自己個人的恍然大悟(Spitzer, 1948, p. 27)。斯皮策的細讀接受是一種美學人文主義的實踐表現。這個接受過程是通過反覆閱讀、奮力前行，抵達作者的內在整體、精神詞源。然而，如此美學的不可協調性在於，閱讀者認知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這種聯繫的建立是正確的，唯一能憑藉的只有人文主義者對「賦予人類心智研究人類心智能力」的內在信念。

不過，這種內在信念太容易由對話走向獨白，特別是西方文化面對全球化的其他文化時，西方經典會被等同於普世正典，美國價值等同普世價值。

---

<sup>21</sup> 薩依德認為今天許多西方人接觸了伊斯蘭傳統，但卻沒有詳細閱讀而立即產生偏見。他說明《可蘭經》的「可蘭」即是閱讀之意(Said, 2004a, p. 58)；在阿拉伯文裡法律學上的「闡釋」與已被汙名化的「聖戰」是源自同一詞源，而「聖戰」也非主要意指神聖的戰爭，而是為了真理進行精神上的努力(Said, 2004a, p. 68-69)。強調正統獨斷的伊斯蘭傳統，也只是這個文化傳統的發展之一，絕非全部。否則中世紀伊斯蘭民族統治下的西班牙，絕不會出現寬容的文化興盛時代。

目前國際唯一超級強權美國，其在國際上的作為就常自認為是正確而且準確無誤。在掌控幾位主導文化論述者的西方正典基調後，持異議的人文主義者，不是被刻意忽略要不就被潛規則告誡，回到自己的文本與本業，繼續把世界交給那些以控制這個世界為己任的決策者，然後重要的政策論述則讓智庫專家或新聞工作者來言說。而這些主導世界樣貌的重大政策主論述，如伊拉克海珊政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阿富汗庇護下的賓拉登（O. bin Laden）是國際恐怖活動的幕後主導等，完全不須也不可經過人文學者的細讀檢驗。於是美國過去如何資助海珊與賓拉登用以對抗伊朗與前蘇聯的歷史一概被抹去，以此合理與合法化美國之後對伊拉克與阿富汗採取的軍事行動。薩依德就是這樣描述今天美國人文學者的困境與挑戰。

因此透過《摹仿論》，薩依德陳述著，即使再卓越的作品最終都會抵抗完全地被理解，因為再怎麼細讀接受而產生的一種批判理解，也都絕不可能完善。薩依德繼續將此一語文學的抵抗拉升到更深刻的意含，他引述鮑里爾（R. Poirier）<sup>22</sup>的話說「只有當我們所說的東西是較為常見的，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們就變成對抗語言的慣例。」鮑里爾認為：賦予文學的特性是，它邀請讀者進入與言詞之間的對話關係，而這種關係之強烈緊張程度在別的任何地方都是難以想像的；正是在語言中可以發現這種原始能量的痕跡，人類憑藉著這種能量把自己創造成自然界獨一無二的物種，他引述愛默生（R. Emerson）的觀點然後繼續詮釋：

當愛默生在〈論審慎〉裡說，「我們因渴望和對抗而寫作，也由經驗而寫作」，他的意思是說，當我們渴望說出一些新的東西，手頭的材料卻表明，只有當我們所說的東西是較為常見的，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們就變成對抗語言的慣例，……事實上，要求我們順從的那些社會形式和文字形式，本身就是反抗早先的慣例中創造出來的。甚至在現在看來陳腐或死亡的言詞中，我們也能夠發現曾經鼓舞它們進行轉型的欲望。任何言詞，在其意義的變換甚至矛盾中，證明了早先的

---

<sup>22</sup> 薩依德將《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一書獻給鮑里爾，並稱他是要好的朋友、偉大的批評家與教師。

相反用法；而正是這一點，鼓勵我們再次開啟它們，使它們產生更進一步的變化或轉折、比喻（Poirier, 1987, p. 138）。

順著鮑里爾以上論述，我們看到美國人文學者在困境挑戰之餘，也看到他們積極奮鬥的出路。

正是必須瓦解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海珊政權以及保護賓拉登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成為常見被理解的主流論述，而這個論述又有嚴重選擇歷史失憶的語文學問題，因此我們就必須變成對抗主流論述的慣例，直到釐清海珊與賓拉登坐大，是不是就是美國自己的武器供應扶持。這是當代語文學隨時要應對的問題，也是美國知識分子的重大責任。因為美國是個民選的民主國家，美國知識分子對其公眾的發言，其影響透過民意變動可以改變政策決定者對外軍事行動的可能，並制止過去不當扶植提供武器的政策。也因此 2003 年 3 月在英美聯軍可能入侵伊拉克的緊張氛圍裡，薩依德會秉持這唯一希望說：「人文主義就是對習見的反抗，它反對任何形式的陳腔濫調和不經思索的語言」（Said, 2004a, p. 43）。

### 三、西東詩篇管絃樂團

加拿大鋼琴家顧爾德（G. Gould）在 1971 年致友人的書信中曾提及：「藝術在本質上是同現實世界相對立的一種體驗。在可能的最好的世界中，藝術將是多餘的」（魏柯玲、劉莉譯，1994，頁 245）。

歌德（J. Goethe）的《西東詩篇》是第一位歐洲人接觸非歐洲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後寫成的詩集。1999 年巴倫波因與薩依德以此著作為名，在德國威瑪集合以色列與阿拉伯年輕音樂家共組西東詩篇管絃樂團，以示致力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相互了解。據薩依德描述：19 世紀初一位參加西班牙戰役的日耳曼士兵帶回可蘭經給歌德，歌德看了十分震撼。他開始學阿拉伯文與唸波斯詩，並以認識他者為主題寫下《西東詩篇》。

然這個不被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歡迎的樂團計畫，一開始的工作坊課程是：白天由巴倫波因指導排練音樂，晚上由薩依德帶領討論音樂文化與政治

歷史；而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也應邀前來助陣。從這管絃樂團成形以至成熟的實例中，我們看到：比一般語言更為共通的世界語言——音樂，其在公共事務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薩依德認為，比起文學，音樂不需要明確表達思想，而同時可以在任何人之間產生非常親近的感覺。一開始前幾天，可以想像雙方對彼此的嚴重誤解與無知：以色列這邊難以想像阿拉伯人居然也會拉提琴與吹奏管樂；而對阿拉伯這邊則是，以色列只會對其進行軍事破壞，哪會有音樂生活。因此薩依德告訴我們，他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幕是：當一位吹雙簧管的埃及學生，依照巴倫波因指示，完美地奏出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第一樂章中的 A 大調旋律時，以色列樂手臉上驚訝的表情。巴倫波因也如此繼續描述：這位男孩後來和一位以色列大提琴手共用一個譜架，他們試著奏出同一個音符、一起做某些事，就這麼簡單。而既然他們一起譜出那個音符，就不能再以往常的方式看待對方，因為他們已經分享了共同的經驗（Barenboim & Said, 2004, p. 10）。

此一樂團在 1999 年成功地跨出第一步，在雙方緊張的第一次合作中，其成果發表的曲目，選擇貝多芬酒神禮讚的第七號交響曲，有效舒緩彼此緊繃的情緒。而 2003 年當薩依德過世後，在巴倫波因所寫的悼文中我們才得知，他與薩依德都把這樂團的發展，視為彼此畢生最重要的志業（Barenboim & Said, 2004, p. xi）。

巴倫波因 2002 年首度造訪約旦河西岸主要城市拉瑪拉，在巴勒斯坦國會議員巴爾古提（M. Barghouti）的解說中，看到以色列在這非法占領區裡所進行的破壞，嚴重危害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安全。接著巴倫波因在一個禮堂，為台下巴勒斯坦年輕學子彈奏貝多芬月光鋼琴奏鳴曲，巴倫波因感慨地告訴我們：一位小女孩很高興地告訴他，他是她有生以來，看到第一位猶太人來這裡，不是士兵或開著坦克來傷害我們，而是帶來美好的音樂。2004 年巴倫波因在以色列議會獲頒最高音樂沃爾夫（Wolf）獎項，在頒獎前一天晚上的音樂會，他同樣彈奏著月光奏鳴曲。

在頒獎典禮上，巴倫波因當著以色列總統與教育部長的面，自省地引述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並慨歎今天的局面。他說：1952 年，他們舉家從阿根廷遷居建國後的以色列，回想著獨立宣言裡致力國內所有各民族福祉的意含，

不因信仰、種族與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並希望與周圍國家維持和平友好關係。而今，他懷著極大的失望要問大家：一，難道對另一個國家人民的占領與統治，與我們的獨立宣言相符合嗎？二，我們是一個有著長遠苦難與被迫害歷史的民族，難道我們的獨立必須建立在其他國家的痛苦上，而對其他人的基本權利與受苦情形無動於衷嗎？最後是，難道以色列可以繼續沈溺在意識形態且不切實際的夢想裡，而不去尋求一個，建基在社會正義之上，實際可行的人道方案。在 DVD 影片中，<sup>23</sup>伴隨著月光奏鳴曲，巴倫波因繼續說著：我總是這麼認為，對於雙方衝突，不可能有軍事上的解決方案；為此我與已過世的摯友薩依德，集合我們與其他中東地區的年輕音樂家，致力於在音樂上的和解，因此，我將把獎金全數捐出給這些音樂團體。當演說結束，可明顯看到台上總統與教育部長李薇娜（L. Livnat）繃著臉沒有鼓掌，身為獎項主席的李薇娜後來上台表達，遺憾巴倫波因竟選擇在這樣的場合攻擊自己的國家；而巴倫波因隨即上台回應，他沒有攻擊國家，而是引述我們曾有的獨立宣言理想。2008 年巴倫波因獲得巴勒斯坦公民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同時擁有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公民證的第一人。

在西班牙支持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積極配合下，2005 年的約旦河西岸拉瑪拉「西東詩篇管絃樂團」音樂會，終於從構思付诸實現。根據英國衛報記者伊郡斯（C. Higgins）在隔天 8 月 22 日的報導表示：這是歷史性的一天，很少會看到一場音樂會竟是在軍隊與半自動步槍的保護下進行，然而團員們的氣氛卻是輕鬆愉悅。而音樂會舞台兩側，則貼著薩依德的巨幅肖像照。而當音樂會主要曲目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結束後，瑪麗安代表薩依德發表感言，隨即則是巴倫波因的致詞，他說：

在音樂中，其實已充分表達了我所想要表達的。不過，我還是想告訴大家，在台上的這些年輕音樂家可是懷抱著無比的信心與勇氣，在這裡完成演出的。1999 年我與薩依德共組這個樂團，其主要目的就

---

<sup>23</sup> 「西東詩篇管絃樂團」從 1999 年創團以至 2005 年拉瑪拉演出，影像部分主要參考華納古典系列，由史馬克尼（P. Smaczny）製作的 DVD，包括「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與「The Ramallah Concert」。其中的「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在 2010 年 10 月底的台北影展中，翻譯成「薩依德的和平狂想曲」。

是要讓大家彼此相互諒解與理解，這是人道的與團結的訊息，而非政治性的。而這將可帶來巴勒斯坦人與這地區所有人需要的自由（台下自發地響起熱烈的掌聲）。我一再重申的想法是：對於衝突，絕對不可能有任何軍事上的解決方案。而同樣的信念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這兩個民族的命運早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裡是兩個民族而不是一個，彼此幾乎在各方面重疊不可分；因此，我們的目標與職責之所在是，找出我們可以彼此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而這，不只是我個人的信念，同時也是我們所有團員的共同想法。最後，我們將演出安可曲——艾爾加（E. Elgar）謎主題變奏曲中的「獵人」。

2005 年之後，樂團仍繼續努力，2007 年原本希望能到迦薩走廊演出，但最後因以色列阻撓未能成行。2008 年該樂團被聯合國賦予聯合國和平大使任務，為此，巴倫波因在當年國際人權日前夕，直稱西東詩篇管絃樂團為「主權獨立共和國」，並告訴大家，其團員的相處模式足堪中東地區所有國家的楷模。另外，原本 2009 年樂團計畫在耶路撒冷舉辦「巴勒斯坦文化嘉年華」，但仍遭到以色列攔阻。

瑪麗安在伊斯坦堡舉辦的 2007 年紀念薩依德研討會上，特別提及學者華爾娜（M. Warner）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討論會上的談話，華爾娜認為「西東詩篇計畫就是薩依德的晚期風格」（M. Said, 2008, p. x）。另外，華爾娜也在 2010 年的《倫敦書評》上發表〈未竟之時〉（In the time of 'Not Yet'），提及該樂團至今仍未能在以色列與耶路撒冷演出，是有志者事未成。

## 伍、薩依德的真善美人文主義

本文的緣起與架構，來自對薩依德生前最後出版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閱讀。在該書的序言裡，薩依德特別提到「我一直想知道，人文主義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受到相當限制的、需要付出努力的領域，它如何與其他面向上的知識分子的擔當聯繫起來，……」（Said, 2004a, p. xvii）。本文即是以

此「付出努力」為出發點，嘗試將薩依德的人文主義信念賦予真善美此一更大的哲學脈絡中。

從 1963 年到 2003 年的四十年裡，薩依德一直都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比較文學的教師與學者。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書中，薩依德特別提及哥倫比亞大學的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筆者按，準確應譯為自由教育）中有一設立於 1937 年的基礎課程〈西方人文學科〉（Western Humanities），每周四小時為期一年，所有各學院學生都必修的嚴格課程。長期身為這門學科的教師，薩依德經歷了擺脫這門學科的限制、與知識分子的擔當聯繫起來的歷程。

1967 年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之後，薩依德開始了他「巴勒斯坦之音」公共知識分子角色。正如在他《論晚期風格》中所說開始（beginning）、延續（continuity）到晚期（lateness）的自我塑造過程般（Said, 2006, p. 4-9），薩依德將原本僅是在學院中人文學科學者，蛻變至一個更大脈絡的真善美人文主義者，從第一階段開始批評的真、第二階段延續民主的善以至第三階段晚期美學的美，清楚呈現在他著作等身的歷程裡。事實上，筆者在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章與第四章，正是嘗試詮釋這三階段的內容。

首先第一階段，關於認識論上對於真的批評，在本文第二章〈總體總是虛幻的批判觀點〉，主要提及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中以奧爾巴哈《摹仿論》沒有體系的論點對比曼《浮士德博士》總體嘗試的終究極限。事實上，支撐此一批判觀點，是從薩依德 1975 年出版的《開始：意圖與方法》裡強調，某種源初（origin）文化的不可能，真實的人類歷史，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世俗開始（beginnings）所構成；並且包括他在 1983 年《世界、文本與批評家》裡揭櫫的世俗批評，以及 2003 年《佛洛伊德與非歐裔》裡引述佛洛伊德（S. Freud）《摩西與一神教》的考證指出，被視為猶太教的奠基者摩西（Moses），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

接著第二階段，關於倫理學上的民主之善，在本文第三章〈後殖民論述的民主意含〉，主要提及不管是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當代民族國家，在一國之內的民主深化或是延伸到國際間國際互動上，任何國家民族主義的爭強好勝陷阱，特別是前面法農論述的剛擺脫殖民統治的新興國家如何轉化為人文

主義發展路徑，是今天全球化時代所有國家都必須一起面對的難題。而這不只是薩依德切身感受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如何而能和平共存，法國如何應對阿爾及利亞、英國如何應對她的眾多前殖民地新興國家，以及今天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美國該如何學習與其他國家平等共處，事實上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與《文化與帝國主義》著作要旨，正是試圖鋪陳出這解放、啟蒙與共享的邁向他者民主人文主義<sup>24</sup>。

民主之善的真正要義是，讓每個個體或民族的殊異性都能夠走向邁向他者普世性，正如薩依德引述賽沙爾（A. Césaire）的詩句「所有種族在勝利的集合點上都會有一席之地」（Said, 2003, p. xi）。而確實今天許多被封為聖者的，曾是昔日邁向他者的反叛者：悉達多太子將婆羅門教種性制度轉化為眾生皆平等的佛教，孔丘將王公貴族的教育特權轉化為有教無類的儒家，以及耶穌從猶太人的猶太教轉化為普世信仰的基督教。

最後來到第三階段，關於美學的探討，亦即在本文第四章〈回到語文與音樂的美學〉，主要提及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第三章〈回到語文學〉以及生命後期致力促成的西東詩篇管弦樂團，這是他融合前面真與善的美學實踐。本文認為，當一個人努力探索他在認識論上的批評之真、實踐他在倫理學方面相信的民主之善，那麼他就可以形塑他自己獨特的人文主義之美。薩依德一生人文主義的堅持，讓我們相信，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確實可能。

1991年與2003年的兩次波斯灣戰爭，時間對照著薩依德同時罹患白血病以及過世。<sup>25</sup>這讓我們想起因為反對美墨戰爭而寫下〈公民不服從〉的梭

---

<sup>24</sup> 事實上，民族主義絕非是能夠邁向他者的民主之善，民族主義只有在一個國家遭到外力欺凌時才有其存在正當性。而令人遺憾的是，如今多數國族主義的概念，是一個神聖、不會犯錯的國家。英國的諺語還會說，無論好或壞，都是我的國家；而今天絕大多數的國家則走的更遠，已經不承認自己的祖國，有可能是壞，也可能會犯錯，沒有國家正義與否的討論空間。而薩依德早在《巴勒斯坦問題》裡，就提出巴勒斯坦必須與以色列和平共存的論述。

<sup>25</sup> 據薩依德兒子瓦迪（Wadie）轉述，其父親生命清醒的最後一天，一直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因為他覺得自己為巴勒斯坦人民做得還不夠。所有親歷這一不尋常場面的人都愣住了：「如果薩依德為巴勒斯坦做得還不夠，那我們又做了什麼」（Said, 2004b, p. 302）？

羅 (H. Thoreau)，在 1861 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與友人說：「我為了國家，心也生病了，只要戰爭持續下去，我的病大概也無法痊癒」(孔繁雲譯，1999，頁 425)，隔年 45 歲早逝。梭羅與薩依德的小我聯繫大我生平，至今依舊令人難忘。

愛爾蘭搖滾團體 U2 在 2000 年的專輯名稱《難以忘懷》(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sup>26</sup>，那彷彿改寫薩依德時常轉述奧爾巴赫引用的十二世紀在薩克森的僧侶雨果 (Hugo of St. Victor) 美麗詩篇：

對一位實踐者的心靈來說，成就德性的開始，首先要學習一點一滴的、努力改變可見且變動的事物；在經歷如此鍛鍊過程之後，才能在最後將這些一起拋諸腦後 (to leave them behind altogether)。

一個人若覺其故鄉是甜蜜的，那他仍舊只是一個纖弱的初學者罷了；而當他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時，則可算是強者；但當他將整個世界視為異域他鄉，則應就是完人了。纖弱的靈魂只將他的愛固著在世界的某一個點上；強者則將他的愛擴充到全世界；但完人最終卻止熄了他所有的愛 (Said, 1994, p. 335)。

奧爾巴赫把僧侶雨果的努力實踐、甜蜜懷鄉、執著履行，以至此生無憾的過程，認為這「對於想要好好愛這世界的人而言，也是一條康莊大道」(E. Said & M. Said, 1969, p. 17) 薩依德在 2003 年雖然最終止息了他所有的愛，但他從纖弱的初學者巴勒斯坦出發，以至強者般將後殖民論述遍及到整個世界，他與威廉斯一樣，成為許多立志成為人文主義者的學習榜樣，即使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

<sup>26</sup> U2 在 2009 年推出的《消失的地平線》(No Line On The Horizon)，筆者認為該專輯是，非常隱微地述說著巴勒斯坦故事。其中第八首「White As Snow」的歌詞中出現「Who can forgive forgiveness where forgiveness is not」，間接暗喻巴勒斯坦人如今流離失所，但受難者卻被責難；而最後一首「Cedars Of Lebanon」(黎巴嫩雪松)，由於薩依德遺願是將其骨灰運回阿拉伯故土，灑於象徵和平與永恆的黎巴嫩雪松之間，因此這首歌應是獻給薩依德。

## 參考書目

- 王欽譯(2016)◦《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原書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王蘇生、盧起譯(2004)◦《西蒙娜·韋依》(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原書 Petrement, S. [1997]. *La vie de Simone Weil*. Paris, FR: Fayard.)
- 孔繁雲譯(1999)◦《湖濱散記》。台北：志文。
- 李賦寧、王恩衷譯(2012)◦《現代教育和古典文學：艾略特文集·論文》。上海：上海譯文。
- 朱生堅譯(2006)◦《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北京：新星。(原書 Said, E. [2004].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朱崇旻譯(2017)◦《不能光說 No》。台北：時報。(原書 Klein, N. [2017]. *No Is Not Enough.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 李展開譯(1989)◦《摩西與一神教》。北京：三聯書店。(原書 Freud, S. [1939]. *Moses and Monotheism*.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易鵬譯(2004)◦《佛洛伊德與非歐裔》。台北：行人。(原書 Said, E. [2003]. *Freud and Non-European*. London, UK: Verso.)
- 吳鱗綬、周新建、高艷婷譯(2014)◦《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北京：商務印書館。
- 萬冰譯(2005)◦《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譯林。(原書 Fanon, F.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許瑞宋譯(2016)◦《資本社會的 17 個矛盾》。台北：聯經。(原書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周大昕譯(2017)◦《世界的邏輯》。北京：中信。(原書 Harvey, D. [2016]. *The Ways of the Worl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高志仁譯(1998)◦《西方正典》。台北：立緒。(原書 Bloom, Harold. [1994].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NY: Riverhead Books.)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199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
- 陳奎德、夏明(編)(2010)◦《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香港：晨鐘。
- 單德興譯(2005)◦《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台北：麥田。(原

- 書 Said, E. [2002].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Said*.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 彭淮棟譯(2015)。《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台北：漫步。(原書 Mann, T. [2010]. *Doktor Faustus: das Leben des deutschen Tonsetzers Adrian Leverkühn, erzählt von einem Freunde*. Frankfurt am Main : S. Fischer. )
- 曹俊峰譯(2017)。《新音樂的哲學》(第五版)。北京：中央編譯。(原書 Adorno, T. [1975].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Frankfurt am Main : Suhrkamp. )
- 張峰譯(1993)。《否定的辯證法》。重慶：重慶。(原書 Adorno, T. [1984].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 趙汀陽、德布雷(2014)。《兩面之詞：關於革命問題的通信》。北京：中信。
- 劉曉波(2006)。《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台北：博大。
- 魏柯玲、劉莉譯(1994)。《顧爾德面面觀》。台北：世界文物。
- Adorno, T. & Mann, T. (2006). *Correspondence 1943-1955*( N. Walker,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 Adorno, T. (2002). *Essays on Music* (S. H. Gillespie, Trans.).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 Auerbach, E. (2003).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W. R. Trask, Tra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i, T. (2006).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Said*. Oxford, UK: Seagull Books.
- Barenboim, D. & Said, E. (2004).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Benjamin, W. (1968). *Illuminations*(H. Zohn, Tran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Benjamin, W. (1978). *Reflection: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E. Jephcott, Tran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 Fanon, F.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C. Farrington, Tran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Habermas, J. (2006). *The Divided West* (C. Cronin,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t, I. (1929).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 K. Smith, Trans.). London, UK: Macmillan.

- Kant, I. (1970). *Kant's Political Writing* (H. B. Nisbet,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irier, R. (1987). *The Renewal of Literature: Emerson Reflection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Rawls, J. (1996). *Political Liberalism*(2nd 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1999a). *A Theory of Justice: A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1999b). *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1985). *Beginnings: Intention & Metho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91).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London, UK: Vintage Books.
- Said, E. (1992).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1994).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2001).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2003). *Culture and Resistan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 Said, E. (2004a).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2004b).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aid, E. (2006).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Said, E. & Said, M., (Trans.). (1969). E. Auerbach. *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 Centennial Review*, 13(1), 1-17.
- Said, M. (2008). Preface: Edward and Istanbul. In M. G. Sokmen & B. Ertur(Eds.),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A Tribute to Edward W. Said* (p.viii-xi). New York, NY: Verso.
- Spitzer, L. (1948).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in Stylis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ico, G.. (1999). *New Science: Principles of the New Science Concerning the Common Nature of Nations*(D. Marsh, Tran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 Williams, R. (1992).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UK: The Hogarth Press.
- Williams, R. (1993a).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The Hogarth Press.
- Williams, R. (1993b).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UK: The Hogarth Press.

## **Is Aesthetic Humanism as Democracy and Criticism Possible: Edward Said's Humanism as an Example**

Herbert Wang\*

### **ABSTRACT**

The Edward Said intellectual legacy will be primarily political. But the last completed book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he wrote, allows us to situate this legacy in the larger philosophical setting of his humanism. The one discussion in my article is of an epistemological cast, Said believed that self-knowledge is unattainable without an equal degree of self-criticism. The other is an ethical argument, a more democratic form of humanism—one that aims to incorporate, emancipate, and enlighten—is attainable. Once-sacred literary canon that associated with Euro-centralism and even imperialism is now more likely to be ridiculed than revered. Therefore, Said proposed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and music as the supplement about aesthetics. Said contended that words are not merely passive reception figures but vital resistance ag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 was an aim of combining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comprehension between people from cultures that traditionally have been rivals. In this time of heighten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exclusiveness, is the critical, democratic even aesthetic humanism possible and still effective? This project tries to demonstrate his legacy that provides a persuasive case for humanistic education on our shared intellectual heritage.

**Keywords** : humanism, democracy, critique, post-colonialism, aesthetics

---

\* Herbert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w1103@mail.cgu.edu.tw

「完全黨報」：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個話語事件\*

周光明\*\*

本文引用格式

周光明(2019)。〈「完全黨報」：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個話語事件〉。《傳播、文化與政治》，10:43-74。

---

投稿日期：2019 年 4 月 2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媒體環境下中國媒體新聞傳播創新研究〉(16JJD860003)之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周光明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email: jczhougm@126.com。

## 《摘要》

自 1941 年起，毛澤東醞釀並發動了一場旨在全面改造黨的整風運動。由於博古被視為中共黨內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而延安《解放日報》勢必成為整風運動的重點。「完全黨報」是改造黨報過程中產生的一種話語，而改造黨報又是改造黨的一部分。改版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一個政治事件，「完全黨報」則是改版過程中的一個話語事件。改版是兩種黨報觀的博弈，最終毛澤東的黨報觀戰勝了博古的黨報觀。理解「完全黨報」的關鍵是理解「完全黨性」，黨報觀博弈的背後其實是黨性觀的交鋒。「完全黨報」的對立面是「不完全黨報」，後者又被毛澤東斥為「社報」。在黨內複雜鬥爭的大背景下，「社報」構成了一項嚴重的指責。隨著整風運動的結束，「完全黨報」也沉澱為中共黨報觀的基本內核。它雖不免帶有延安時代的烙印，卻又超越了延安經驗，一直影響至今。

**關鍵詞：**《解放日報》改版、完全黨報、社報、話語事件、黨性原則

## 壹、前言

一般認為，「完全黨報」是中共黨報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始見於 1942 年的延安文獻。多數學者會提到當年 9 月 15 日毛澤東寫給凱豐的一封信，在此信中毛說：「今日與博古談了半天，報館工作有進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 142）。此處「完全黨報」是以「完全的黨報」的形式出現的。毛把改版前與改版初的《解放日報》視為「不完全黨報」，並認為改版的最終目標是使其變成「完全的黨報」。毛的這一想法在此前半個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初顯端倪，8 月 29 日政治局對《解放日報》作出新的決定，其中有：「同意毛主席指出的《解放日報》自 4 月 1 日改版以來，有較大進步，但尚未做到完全成為中央的機關報。」（王敬主編，1998，頁 39）

9 月 5 日，陸定一在新華社編委會舉行的二十二次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的具體意見。博古在聽完陸定一傳達毛的批評後，承擔了全部責任，他在編委會上檢討說：「《解放日報》沒有成為一張『完全』的黨報，主要指的是我，責任完全在我。」（李志英，1994，頁 408-409）但就現已公開的官方文件來看，還不能斷定「完全黨報」概念即由毛澤東首創。因為，在 1942 年春天，壁報《春風》的記者曾採訪過博古，後者在回答「是否有使報紙根本改造的決心」的問題時說道：「使黨報成為完全的、戰鬥的黨報，這是黨的方針。」（王敬主編，1998，頁 75）這至少說明毛與博古曾共用了「完全黨報」概念。

在已有的研究文獻中，「完全黨報」常與「全黨辦報」、「群眾辦報」勾連一起，但似乎沒有後兩者重要。讓人稍感意外的是，目前中國大陸已出版的各種新聞傳播學辭書中，均未收錄「完全黨報」詞條。大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完全黨報」思想可為「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所概括，或者「完全黨報」即是「全黨辦報」和「群眾辦報」的統一。不過，仍有少數學者注意到，「完全黨報」這一表達的特殊性，稱其為「一個充滿模糊性的概念」（王春泉，2013），或稱之為「讓人無法揣摩的辭彙」（王潤澤，2009）。其實，單就漢語表達而言，「完全黨報」或「完全的黨報」也並不新奇。早在民國

初年，中國社會主義先驅江亢虎曾多次使用「完全政黨」一詞。<sup>1</sup>而稍早之前，孫中山就對江亢虎說過，他十分贊成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並自稱早已是一個「完全社會主義家」（孫中山，1981，頁 580）。有根據顯示，毛澤東可能受到過江亢虎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Snow, 1937／董樂山譯，2005）。

「完全黨報」這一表達的觀念層面，在本土自有淵源。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期間，在檢討宣傳工作時，曾提到「黨報不健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 7）。三年後，毛澤東幾乎照搬了這一檢討框架，指出紅四軍存在「宣傳隊不健全」等缺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 11）。此外，早期中共新聞宣傳中，還出現了「健全的黨報」（李卓然，1931；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1980，頁 145）、「完善的黨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a/八，頁 636）的說法。<sup>2</sup>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兩黨均「以俄為師」，在新聞宣傳理念上應該會有一些交集。1928 年，南京國民黨政府頒佈了三個黨報條例，<sup>3</sup>將黨報分為三種：黨報、半黨報、準黨報，此處的「黨報」不就是「完全黨報」嗎？

1942 年 9 月 15 日這一天，毛澤東非常忙碌。當天，他複電周恩來，致電陳毅，致電朱瑞，談的都是國共合作問題；又複電了張聞天，談調查研究問題；又同朱德、王稼祥一道發佈了關於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與八路軍留守兵團合併及幹部任命的命令；複信謝覺哉；其間還同博古談了半天話，談《解放日報》工作及各部門利用報紙推進工作的問題；並致信凱豐（逢先知編，2013，頁 403-405）。

在這封將近 400 字的信件中，毛澤東談了這樣幾件事：（一）簡要介紹了與博古談話的要點；（二）各部門（中央各部門、各根據地當局）利用報

---

<sup>1</sup> 江亢虎在 1912 年 4 月所寫的《中國社會黨重大問題》一文中，區別了「純粹社會黨」和「完全政黨」，其中 16 次提到「完全政黨」。參見汪佩偉編（2016，頁 130-133）。

<sup>2</sup> 當然，用「完全」而不再用「健全」、「完善」等詞彙，不排除受到延安當時用語習慣的影響，比如「完全小學」、「完全印刷廠」等。參見《陝甘寧邊區教育史》（1994）、《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出版史研究》（2012）。

<sup>3</sup> 1928 年 6 月，國民黨中央通過了《設置黨報條例》、《指導黨報條例》和《補助黨報條例》。這三個文件現藏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 722，卷號 40。

紙做工作的事；(三) 整風結束後，中央須設一個大的編譯部，並談到編譯部的構成與編譯著作名目；(四) 羅邁（李維漢）走後，中研院（延安中央研究院）將由凱豐直接指導；(五) 為《解放日報》第四版（綜合副刊版）約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 142）

從 9 月 15 日全天毛澤東的工作安排上看，《解放日報》的改版是很重要的一項工作，但這一重要性不應被誇大，在國際事務（比如蘇德戰爭）、國內事務（比如兩黨關係）之外，它屬於黨內事務中的一項。從毛澤東的語氣上看，《解放日報》的改版工作已不再具有迫切性。整風運動在順利地推進，改版至今已接近半年時間，一切盡在掌控之中。毛的口氣是輕鬆的，也是樂觀的，毛認為，《解放日報》有望不久之後成為「完全的黨報」。有些學者似乎認為〈本報創刊一千期〉（1944 年 2 月 16 日），標誌著「完全黨報」的完成。筆者從這篇重要文獻中，看不到這個意思，而且毛本人也從無這一宣示。

回到半年之前的改版事件。一些學者忙於論證《解放日報》改版的必要性，似乎認為即使沒有延安整風的壓力，改版也勢在必行；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改版是整風運動的一部分。那麼筆者的問題是，假若《解放日報》自創刊伊始即由陸定一或劉少奇而不是博古主持工作，那還會進行改版嗎？即使要改版，會不會也像 1941 年 9 月 16 日《解放日報》擴版那樣波瀾不興？

有學者認為，改版其實是博古的黨報觀與毛澤東的黨報觀之間的博弈。這是對的。那麼，這兩位中共領袖的黨報觀相同之處多一些還是相異之處多一些？為何毛澤東要提倡「完全黨報」？理解「完全黨報」的關鍵又是什麼？是否是「全黨辦報」或「群眾辦報」，抑或兩者之統一？

黨報（party newspaper）不就是政黨報紙、黨派報紙嗎？何來「完全」「不完全」之說？可見，「完全黨報」不是一個簡單的新聞宣傳觀念或黨報觀念，它似乎話中有話，意味深長。它是否可被視為一個特殊話語？或者它是否可被視為一個話語事件（discourse event）？最後，為什麼「完全黨報」在 1942 年 9 月 15 日之後的延安文獻中再未見到？很多學者強調「完全黨報」思想的中國特色（相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而言），那它是否還具有一些延安特色呢？

## 貳、整風—博古—改版

提到延安《解放日報》1942 年的改版，嚴格地說，應該先談 1941 年 9 月 16 日的擴版。1941 年 5 月 16 日《解放日報》創刊時只有四開兩個版，版面劃分為：國際欄、國內欄、邊區欄和文藝欄；報紙擴充為四個版（對開一大張）後，上述四欄隨之變為國際版（第一、二版）、國內版（第三版）、邊區版和副刊版，第三版以大後方的消息為主，也時常發表一些有關邊區的理論文章、調查報告和國內問題專論，並闢有「資料」專欄，介紹各國情況，以統計數字居多（王敬編，1998，頁 12、18、19）。不到五個月後，即在 1942 年 2 月，報社就開始醞釀大的動作——改版。

那麼，《解放日報》為何要改版呢？有人認為，它的版面編排很奇怪，國際新聞所占比重過大。其實，它的這種版面編排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已有研究表明，《解放日報》繼承了《新中華報》的辦報理念，這種辦報理念甚至可以追溯至《紅色中華》（熊國榮，2012）。也就是說，延安《解放日報》部分地沿襲了中共早期的黨報傳統。更何況，在《解放日報》創刊後的第二個月，納粹德國即閃擊蘇聯；當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這都是當時全世界關注的重大新聞，《解放日報》編輯部突出國際新聞，也自有道理（吳冷西，2001a）。另外，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操作上的考慮，當時《解放日報》的編輯們認為，編寫國際新聞較為容易，風險也小（王揖，1984）。

也有人認為，改版前的《解放日報》社論多，每天發表一篇，形式主義或教條主義比較嚴重。博古則認為，一般大報，尤其是黨報，都很重視言論板塊，國內的《大公報》、蘇聯的《真理報》、本黨的《新華日報》，都是每天發表一篇社論。胡喬木在十二年之後還重申了這一辦報理念，他說：「無產階級報紙歷來每天都有社論的，如果說這裡有例外，就是延安的解放日報。」（《胡喬木傳》編寫組編，2015，頁 133）胡將其稱為「例外」，顯然別有所指。

也有人認為，改版前的《解放日報》副刊出了大問題。這是指「文藝」欄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1942 年 3 月 9 日）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前兩部分（1942 年 3 月 13 日）。但是這次改版的動議來自於此前的中央會議

精神，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了《解放日報》存在的各種問題，並委託博古儘快擬出改革方案（逢先知編，2013，頁362-363）。

延安《解放日報》本是博古提議創辦的。1940年11月，博古由重慶調回延安後，就想辦一張「大報」和一家「強有力」（吳葆樸、李志英，2007，頁355）的通訊社。中央（毛澤東、張聞天）同意他的這一想法。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任命博古為即將在延安出版的日報的社長兼主筆（逢先知編，2013，頁288）。從1941年5月15日走馬上任（稍後還兼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博古即全力投入工作，兢兢業業。單就召開編輯部會議（或編委會會議）而言，從創刊號起至1942年2月，就有接近20次之多。他對《解放日報》存在的問題是充分瞭解的，比如，有關國內的社論、消息少了，文藝欄的長稿子多了，譯電科與編輯部的聯繫不夠密切，通訊員的工作較為薄弱等（王鳳超、岳頌東編，1984）。但總體來說，以上問題均屬於業務層面。

對於這樣一份《解放日報》，當時延安的大部分黨報從業者其實也是比較認可的（胡績偉，1999，頁261）。所以，當1942年1月26日博古傳達中共中央對《解放日報》的批評時，編輯部全體成員感到吃驚和不安，因為來自楊家嶺的批評是相當嚴厲的：「（《解放日報》編發的）新聞不能貫穿黨的政策、路線！」就是說，《解放日報》的辦報方針出了問題，這意味著編輯部在政治上犯了錯誤，因此要立即著手改版。當時整風運動正在強力推進中，《解放日報》不可避免地捲入了鬥爭的漩渦。稍後出任總編輯的陸定一明確指出：「解放日報的改版，是1942年黨的整風運動的一部分。」（陸定一，1981）的確，存世五年零十個月的《解放日報》大部分時間裡就一直伴隨著整風運動，並深深地受其左右。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報》為何要擴版？就是因為1941年九月會議作出了將原來的兩個版擴大為四個版的決定，以便有版面「增加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教育的內容」（逢先知編，2013，頁327）。而整風運動第一階段為高級幹部整風，社長博古更是首當其衝。

整頓三風，主要整主觀主義，而主觀主義有兩種形式，一是書本式的教條主義（江西時期毛稱之為「本本主義」），一是狹隘的經驗主義。王明、張聞天、博古被視為是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sup>4</sup>1941 年九月會議後，王明稱病不出，張聞天請求下派基層調研，博古於是成了黨內鬥爭的主要對象。<sup>5</sup>

改版前後的博古對自己的處境非常清楚，他除了不斷就自己所犯下的「路線錯誤」作出檢討外，對《解放日報》所面臨的壓力也看得很透。<sup>6</sup>他在受到批評時說過：「責任完全在我」（李志英，1994，頁 409）。這可不是用博古「嚴於律己」就可以解釋的。改版，不是單純的版面調整，而是「改造」。改版，是技術主義的，偏重於業務層面；改造，則是政治主義的，偏重於思想層面。博古所在的《解放日報》必定無小事，理論上講，無論博古當時在哪裡，哪裡就必定是整風運動的重點。

1942 年 3 月 11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今年中央要抓住黨校、黨報、中宣部這三個重要部門的工作。」（逢先知編，2013，頁 368）五天之後，中宣部就發出了《為改造黨報的通知》。由於博古是《解放日報》的負責人，這就使得《解放日報》註定要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目標，改版在所難免。

博古在回答《春風》記者採訪時，一語道破問題所在，他說：「問題是在要對於什麼是黨報有一致的、深刻的認識。」（王敬編，1998，頁 75）言

---

<sup>4</sup> 王明說他同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曾有過三次談話，其中在第一次談話時（1941 年 10 月），「毛澤東實質上回答了他為什麼把我、博古、洛甫、王稼祥、凱豐、楊尚昆、朱瑞作為『教條主義的主要代表』，把周恩來與彭德懷作為『經驗主義的主要代表』而猛烈加以攻擊的問題。」參見王明 著／徐小英等譯（2004，頁 62）。

<sup>5</sup> 1941 年九月會議後，毛澤東所寫的《九篇文章》（至今未全文公佈），初始稿題目為「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而到兩年後的另一個九月會議召開，將矛頭轉向王明時，才有「王明、博古路線」一說。直到 1944 年 3 月，確定博古為「黨內問題」時，對博古的批判才告一段落。參見何方（2005，頁 258-260）。

<sup>6</sup> 據筆者瞭解，此時的博古應該不會感到「茫然」。「毛澤東根據他的黨的傳媒文化想像，設計了這場媒介改造運動，並親自推動了這場運動。這樣一來，諸如在改版前後《解放日報》負責人博古的茫然就很好理解了！」參見王春泉（2011，頁 47-48）。

下之意，黨內存在著不同的黨報觀。事實上，在《解放日報》的整個改版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博古的黨報觀和毛澤東的黨報觀之間的博弈。

博古的黨報觀可概括為「大報模式」。大報重言論，社論每天都要發表一篇，博古認為這是「通例」。<sup>7</sup>不僅《大公報》、《真理報》是這樣，中共自己辦的《新華日報》也是這樣。直到 1942 年年底，社長博古還為「社論要不要每天發一篇」與總編輯陸定一大起爭執（陸定一，1981）。似乎所爭者甚小，但也由此可見博古的那份大報情結（obsession）。

大報重視國際新聞。博古認為，大報應該是一張「全國紙」，應該具有開闊的視野。而毛澤東則認為，「報紙必須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逢先知編，2013，頁 368）。這是一種「地方紙」的定位。在毛澤東看來，《解放日報》國際新聞篇幅太大，報紙出版地延安的消息只能在三、四版之間才可找到，簡直本末倒置。

兩種黨報觀的新聞價值觀也不一樣。大致說來，博古的黨報觀重視新聞的重要性原則（prominence），而毛澤東的黨報觀則重視新聞的接近性原則（proximity）。毛認為，「登消息的順序，本鄉的，本區的，本縣的，本省的，外國的，由近及遠，看得很有味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 30）毛這話雖是在江西時期說的，但改版後的《解放日報》不正是繼承了這一原則嗎？而對改版前的「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的做法，毛曾大加嘲笑，罵其為「黨八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 103）。

「群眾辦報」是毛澤東黨報觀中很有特色的內容，就連他的「群眾」概念也頗具內涵。<sup>8</sup>與之相對的是專家辦報、「記者辦報」。「群眾辦報」是說群眾應該參與辦報，但辦報主體主要還是編輯部那「少數人」。如果群眾都來自己辦的話，那一定是「手工業工作方式」（〈黨與黨報〉，1942 年 9 月 22 日）

<sup>7</sup>「社論最好每天有，沒有是例外。」博古在 1942 年 12 月 7 日編委會以上的講話。王鳳超、岳頌東（編）（1984）。〈延安〈解放日報〉大事記（1941.5.14-1947.3.27）〉，《新聞研究資料》，21：74-120。

<sup>8</sup>參見王潤澤、餘玉（2014）。《群眾：從「教育」，「反映」到「學習」的對象——黨報群眾性原則嬗變軌跡解讀》，《國際新聞界》，12：68-83。

的重現。而所謂的「記者辦報」，多少強調了專業分工和編輯部工作上的相對獨立性。

毛的黨報觀重視組織性，這個組織是個「巨大集體」，是一個擁有 57 萬軍隊、80 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大集體。<sup>9</sup>所以，辦報是個組織行為，如同開會。延安的會本來就多（陳學昭，1940，頁 203），而毛澤東發現，辦報是一種效率更高的開會方式。<sup>10</sup>「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推動其他部門工作的改造。我們今天來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利用報紙。」（逢先知編，2013，頁 372）從開會的角度去理解毛澤東的辦報，至關重要。在毛看來，辦報不僅相當於開會，還可以避免開更多的會。如果說，博古的黨報觀較偏向於大眾傳播，那毛澤東的黨報觀則較偏向於組織傳播。

在博古的黨報觀中，較為重視理論學習，文章寫得也較有條理，編排上還追求一點「雅致」（王鳳超、岳頌東編，1984）。當然可能會因此帶有一些程式化的東西，比如新概念多，歐化句子多（博古，1942 年 7 月 31 日；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2007，頁 470）。而在毛澤東的黨報觀中，較注重實際或「地方情形」。他強調要「深入群眾，不尚空談」（逢先知編，2013，頁 367），多接地氣，語言要生動活潑。但也不免有些粗俗，如「脫褲子」<sup>11</sup>（〈教條與褲子〉，1942 年 3 月 9 日）之類。

以上，筆者大略地談到了博古的黨報觀與毛澤東的黨報觀之分歧，然而，這一分歧卻不應被誇大，他們二人的黨報觀之相同點必定多於不同點。他們的黨報觀的相同點源於中共早期的辦報傳統，全黨辦報的觀念與實踐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sup>12</sup>1930 年，在李立三所寫的《黨報》一文中，基本上已

---

<sup>9</sup>這是 1942 年 6 月的數字，逢先知編（2013，頁 387）。

<sup>10</sup>「開會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報紙發出去就可以省得開許多會。我們可以把許多問題拿到報紙上討論，就等於開會、開訓練班了，許多指示信可以用新聞來代替，所以報紙可以當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毛澤東（1944 年 3 月 22 日）。〈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毛澤東文集》（1996）（第 3 卷，頁 112）。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11</sup>〈教條與褲子〉，《解放日報》，1942 年 3 月 9 日。高華稱其為「中國言論史之奇文」。稍後延安有張壁報乾脆就叫《脫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出版社，頁 316、331。

<sup>12</sup>參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

經闡釋了全黨辦報的思想，<sup>13</sup>只不過它的概念化發生在延安時期。延安時期的全黨辦報思想也可以說是博古與毛澤東共同作出的貢獻。毫無疑問，他們的黨報觀也都是以宣傳為本位的。

至於黨報的黨性原則、黨報的群眾路線（「群眾辦報」的另一個意思是為群眾辦報），自然都是兩位中共領袖認可並共用的。毛澤東說：「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189）相信博古對此也會深表贊同，但他或許會補充說：「少數人開門辦就行嘛」，那個關鍵的少數還是需要的。也就是說，兩人黨報觀很多時候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比如說，加強通訊員的工作，此是「群眾辦報」的題中之義，改版前的《解放日報》編輯部就曾多次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只不過博古黨報觀中的「群眾」的分量相對而言可能沒毛澤東黨報觀中的那麼重要。<sup>14</sup>

但是，由於政治的或鬥爭的需要，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博古的黨報觀與毛澤東的黨報觀的差異被放大了。隨著博古的進一步失勢，他的黨報觀後來被當作是「洋教條」的化身。而隨著毛澤東最高領袖地位的確立與加強，他也獲得了最終的話語權<sup>15</sup>，毛可以把改版前與改版初的《解放日報》稱為「不完全黨報」，因為那個「完全與否」的神秘「標準」已智珠在握（參見劉繼忠、梁運，2012）。

## 參、黨性—不完全黨性—黨性原則

---

館黨史研究室選編（1985，頁12-14）。

<sup>13</sup>「黨報是要整個黨的組織來辦的，單只靠分配辦黨報的少數同志來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黨報的意義！所以每個黨的組織以及每個黨員都有他對於黨報的嚴重的任務：第一讀黨報，第二發行黨報，第三替黨報做文章，特別是供給黨報以群眾鬥爭的實際情形和教訓。」李立三（1930）／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1980，頁126-127）。

<sup>14</sup>「職業記者」與「廣大的非職業的通訊員」，博古非常清楚地將兩者加以區別（博古，1944，頁488）。

<sup>15</sup>黨報觀也屬於廣義上的革命話語。「毛澤東經過與王明等的鬥爭，取得了對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逐漸形成了一種比較固定的思維和表達方式，經過整風運動，基本掃清了俄式話語對黨的影響，從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話語』的領導地位。」參見高華（2006）。

筆者認為，理解「不完全黨報」的關鍵是要理解「不完全黨性」。那我們就先從「黨性」概念談起。

「黨性」是一個近代新名詞。據研究，漢語中「+性」的構詞法受日本影響很大。<sup>16</sup>筆者發現，延安文獻簡直就是這一構詞法的高級語料庫，一份僅 500 餘字的檢討材料中，就出現 16 次的使用。<sup>17</sup>延安時代，「黨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辭彙，整風運動又使它迅速變為一個熱詞、燙詞<sup>18</sup>。目前在延安文獻中看到的最早用例見於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我們黨員的最高原則。每個黨員在思想意識中應該堅強地確立這個觀念。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劉少奇，1950，頁 91）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這是中共黨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份經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文件。此前的 3 月 26 日，政治局已專門開會討論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會議決定由王稼祥起草關於黨性問題的文件。（逢先知編，2013，頁 286）

需要說明的是，「黨性」並非中共政治話語中獨有的術語，中國國民黨人也談黨性問題。1930 年代初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國民黨具有一種有別於一般近代政黨（包括歐美與蘇俄）的特殊性，這一「特殊黨性」涵蓋：「黨的服役性」、「黨的革命性」、「黨的全民性」、「黨的平等自由性」（胡夢華，1932）。但這種黨性觀不承認階級性，也不主張階級鬥爭，因而與中共的黨性觀大異其趣。不過，雖然中共的黨性觀直接來自於蘇聯，但「黨性」這一中文表達的定型不排除受到過本土因素的諸多影響，比如，此前的「黨派性」、「黨化」、

---

<sup>16</sup>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較早的可參見實藤惠秀的研究。[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1983 年，頁 330

<sup>17</sup> 「劣根性、母性、黨內奴性、妥協性、破壞性、動搖性、自私性、虛榮性、衝動性、奴性、調和性、頑強性、軟弱性（2 次）、原則性（2 次）。」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提綱（部分），1943 年 11 月 15 日。參見高文謙（2003）。《晚年周恩來》，頁 79-80。香港：明鏡出版社。

<sup>18</sup> 此處參考了錢鋼語象分析法中的語溫等級標準。錢鋼（2015）。《語象詭譎——中國政情解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黨德」等辭彙的使用習慣。作為中國近代政黨黨性觀的共同表達，「黨性」已經不能為 *partisanship* 所概括了。

中共的黨性觀直接繼承了列寧或列寧主義的黨性觀，當然在後者所經歷的本土化（主要是延安化）改造中，也發生了一些變異（陳力丹，2016）。因為列寧黨性觀的最初文本產生於建黨過程中，而接受方正處於整黨過程中。大致說來，列寧側重於談黨與非黨的關係，而延安時期的中共則側重於黨內鬥爭。這樣一來，列寧的黨性觀（至少最初的文本）會帶著一種「有與無」的語境，而中共的黨性觀則帶著一種「多與少」的語境。前者主要指的是原則性，而後者主要指品質性，所以「黨性」會經常表現為諸如品質（的好壞）、覺悟（的高低）、修養（的深淺）、紀律（的強弱）等程度性的指標。

不過，在接受和消化列寧主義黨性觀之時，中共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比如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就有所不同。有學者認為，「劉少奇同志是從共產黨員的品德方面或者說是從思想意識方面來闡釋黨性問題。毛澤東同志則是從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方面來闡釋黨性問題。」（楊獻珍，2002，頁 77）。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成立的。毛澤東把主觀主義作風當作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認為「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逢先知編，2013，頁 315-316），這就是從思想方法上闡釋黨性的。但不管中共內部關於黨性有多少種認識，重要的是，毛澤東的觀點逐漸成為中共黨性觀的主流話語。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認為存在著兩種對立的學習態度，一種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另一種是馬列主義的態度。在列舉了主觀主義態度的各種毛病之後，他總結說：

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

論和實踐統一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毛澤東，1986，頁 476-477）。<sup>19</sup>

毛澤東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黨性觀，並創造了一個新說法——「黨性不完全」。毛很重視黨性問題，早在 1941 年 3 月 26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就說到：「黨性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並指出遵義會議之後黨內思想鬥爭少了，幹部政策失之過寬，因此要對中級以上幹部「實行檢查」。黨性問題直接與思想鬥爭掛鉤，<sup>20</sup>毛開始醞釀整風運動。黨性可分為完全的、不完全的（陸定一，1957 年 3 月 13 日；《陸定一文集》編輯組，1992，頁 557），不完全的則接近於或等於沒有。1942 年 3 月 11 日，毛更指出：「黨性是一種科學。」（逢先知編，2013，頁 367-368）「黨性學」、「黨性科學」，呼之欲出。當然，對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與純潔性的高度重視，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個顯著標誌。

以「不完全黨性」看黨，可以看到「不完全政黨」。所謂完全政黨在這裡有兩層含義，一是獨立自主的黨。幼年的中共經歷了一二十年時間終於成長為延安時期的「全國性的大黨」，但可惜它仍舊是共產國際之下的一個支部。直到 1943 年 5 月，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它才結束了自己的支部史，才算是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政黨。<sup>21</sup>二是高度一元化的黨，即「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1991，頁 602）。經過幾年整風運動對黨的不斷改造，「諸子百家」沒有了，「一國三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b，

---

<sup>19</sup> 據說此篇講話主要針對張聞天。原講話稿中，毛的用語少見的辛辣尖刻，顯示出他急於奪取中共首席理論家頭銜的好鬥姿態，參見何方（2005，頁 66-67）。。

<sup>20</sup> 「如果不能從思想上最後的驅逐主觀主義，則全黨將不能成其為真正的共產黨，黨員也將不能成其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喬木（1941 年 9 月 16 日）。〈為什麼要向主觀主義宣佈堅決無情的戰爭〉，《解放日報》，第 1 版。

<sup>21</sup> 只要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理論上講，莫斯科就有可能通過組織的手段，顛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從皖南事變（1941 年 1 月）起，毛就一直努力去掙脫共產國際的控制，毛很反感共產國際與中共那種父子黨的關係。所以，當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來，他「大大松了一口氣」。參見楊奎松（2005，頁 158）。

頁 604) 也沒有了, 到 1945 年「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指導思想寫入七大黨章, 從某種意義上講, 中國共產黨也由此獲得了新生。<sup>22</sup>

以「不完全的黨性」看黨報, 可以看到「不完全的黨報」。1942 年 2 月 11 日,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毛澤東指出: 報紙要以自己國家的事為中心, 這正是表現一種黨性。現在《解放日報》還沒有充分表現我們的黨性, 主要表現是報紙的最大篇幅都是轉載國內外資產階級通訊社的新聞, 散佈他們的影響, 而對我黨政策與群眾活動的傳播, 則非常之少, 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

他提議根本改變《解放日報》現在的辦報方針, 使它成為貫徹我黨政策與反映群眾活動的黨報 (逢先知編, 2013, 頁 362)。時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說:「解放日報一直是毛主席管的, 改版前也是他管的。」(胡喬木, 2014, 頁 95) 那為什麼到了 1942 年春天,《解放日報》會「突然」暴露這麼嚴重的問題, 以致需要立刻改弦易轍? 原來存在著一個發現問題的最佳時機, 一旦這一時機出現, 就會看到它「沒有充分表現我們的黨性」, 即《解放日報》只表現了一種「不完全的黨性」, 因而也就是一份「不完全的黨報」, 或只能算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報」。

這樣一來, 它的問題就不只是壓縮一下國際新聞版面就可以解決的。表面上看, 這似乎有點小題大做。改版後不再直接採用「國內外資產階級通訊社」的電訊稿<sup>23</sup>, 而改寫為本報綜合報導, 這對《解放日報》編輯部有何難哉? 國內一些報紙早就是這樣做了,<sup>24</sup>這跟有沒有黨性、黨性完不完全好像扯不上。但胡喬木解釋說, 導致《解放日報》改版的關鍵是未能體現「宣傳

---

<sup>22</sup> 1943 年 4 月 28 日, 毛設計了新黨旗,「長闊為三與二之比, 左角上有斧頭鐮刀, 無五角星」(逢先知編, 2013 年, 頁 436)。毛還曾一度想更換黨名, 雖說此舉主要出於公關 (包括外交) 上的考慮, 但也表達了他的那份對黨已成功轉型的自豪感。

<sup>23</sup> 毛將國際新聞版此前的做法斥為給外國通訊社充當「義務宣傳員」, 有學者認為這「有言過其實之嫌」。參見黃旦 (2008, 頁 256)。

<sup>24</sup> 「我國和外國通訊社報導的重要消息, 全都採用, 但經過重新編寫, 保留各通訊社消息各自的特點, 集中編成一條, 使讀者對重要新聞的全貌和不同報導一目了然。」張友漁回憶 1933 年前的北京《實報》的做法, 稱其為「精編主義」。張友漁 (1997, 頁 697)。

上要以我為主」的方針(胡喬木, 2014, 頁 95)。這點到了要害。「以我為主」, 就是以中國、以中共、以延安、以楊家嶺為主, 而不是以蘇聯(包括共產國際)、以國民黨、以大後方、以報社為主, 後者叫「以外為主」。真正的(中國的)馬列主義在哪里? 在延安, 在山溝溝裡, 在延安窯洞裡(逢先知編, 2013, 頁 248-249)。只要做到「以我為主」, 馬列著作就不會是教條。毛澤東採用的是「六經注我」的辦法。他極推崇史達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 他說:「這是我們全黨的『聖經』, 是『聖經』, 而不是教條, 是可以變化的」(逢先知編, 2013, 頁 414)。「是可以變化的」, 就是可以為我所用的。至於「洋教條」、馬教條之後, 是否會產生「土教條」、毛教條,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改版並不能使不完全黨報自動升級為完全黨報。除貫徹毛澤東的改版意圖, 以確保報紙正常出版外, 《解放日報》全體工作人員(尤其是黨員)還要參加整風運動, 學習 22 個整風文件, 沒完沒了地檢討自己, 並寫出深刻的反省筆記。<sup>25</sup>接受黨性教育的最終目標是成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 也就是要成為共產主義新人。1944 年六七月間訪問延安的《新民報》記者敏銳地觀察到——「共產黨員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人身, 加上百分之九十的黨性, 再加上百分之十的個性。他們不是了不起的英雄, 卻是結實的細胞。」(趙超構, 2013, 頁 85)記者的描述既準確又生動。<sup>26</sup>先是「黨人」, 後是記者, 這種記者是「新型記者」, 不是自命不凡的、幻想「無冕之王」的所謂「報館同人」, 而是腳踏實地, 時刻不忘向群眾學習的「工農兵記者」(黃旦, 2013)。

---

<sup>25</sup>「每個同志必須明白, 這次整頓三風, 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 把它反省一下。都要寫筆記, 首先首長要寫, 班長、小組長都要寫。」逢先知(編)(2013, 頁 375-376)。

<sup>26</sup>趙超構隨中外記者團訪問陝甘寧邊區, 歷時 43 天。當時正處於整風運動的最後階段, 他注意到了整風運動的正面意義, 認為整風「使得共產黨能夠以溫和的手段消滅了黨內的腐化危機, 而仍然能保有它的幹部…試想, 假如沒有整風, 說不定就得實行流血的清黨, 那又是何等的代價!」(頁 236)因為趙超構相對客觀的報導, 使他獲得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讚揚, 周恩來甚至將《延安一月》比作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

隨著 1942 年整風運動的全面鋪開，延安空氣中瀰漫著黨性的花粉，無人不受其感染。它無遠弗屆，又無孔不入，已不存在什麼「特殊地區」和「特殊部門」（逢先知編，2013，頁 357）了。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都要遵守與貫徹黨性原則。所謂黨性原則，就是「黨性第一」的原則。《解放日報》改版社論中，提到了黨報的四種品質：黨性、群眾性、戰鬥性、組織性。<sup>27</sup>以下筆者略加說明。

（一）「貫徹著堅強的黨性」。把「黨性」放在黨報應具備的四種品質的首位，這很好理解，這也是毛澤東反復強調的。（二）「密切地與群眾聯繫，…成為他們的反映者、喉舌」，即所謂的「群眾性」。這一項也是毛澤東極為重視的。在 1942 年 3 月 11 日，政治局會議討論博古提交的改版方案之後，毛澤東隨即致電周恩來說：「關於改進《解放日報》已有討論，使之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逢先知編，2013，頁 369）相當於毛將「黨性」與「群眾性」並提。（三）「洋溢著戰鬥性」。批判性或鬥爭性本是馬克思主義黨報的一項重要傳統，批判性既指向黨內思想鬥爭，又包含對敵之宣傳戰。惟「戰鬥性」一詞，更富於戰爭年代的語言風格，這種戰爭語言對此後的中共新聞宣傳影響至深。（四）「（黨報）應該是各種（群眾）運動底積極的提倡者組織者」，即「組織性」。組織是共產黨的強項<sup>28</sup>。這個組織指的是黨這個大集體，而不是報社那個小集體。只有當報紙不鬧「一字一句的獨立性」（王敬編，1998，頁 40）時，才能做到「集體的行動，整齊的步調」（〈在本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號召整頓三風要利用報紙〉，1942 年 4 月 2 日）。由這四種品質詮釋的黨報觀，主要反映的是毛澤東的黨報觀，但博古的黨報觀仍潛伏其中，比如，他強調黨報既是黨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既是機關報，又是公共論壇。<sup>29</sup>

<sup>27</sup> 「四性」的順序也有這樣排列的：黨性、群眾性、組織性、戰鬥性。釋義也有所不同。博古（1944）／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2007，頁 488）。

<sup>28</sup> 「共產黨的最大本領，在乎組織。黨員的最大義務，也就是服從組織。……共產黨之所謂組織，是比我們所說的組織有更大的約束性的。一般政治組織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個人一部分自由之讓與；共產黨所要求於黨員的，則是貢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自由。」趙超構（2013，頁 81）。

<sup>29</sup> 「使《解放日報》成為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同時也就是要使它成為是天下人的

在《致讀者》一文中，形式上看，這四性是並列的關係，當時有人看了覺得不妥（吳冷西，2001b）。當然，「黨性」毫無疑問是擺在首位的，這就是所謂的「四性一統」，<sup>30</sup>這是中共黨報理論中的四個重要概念，由此建構的新聞學體系，也可稱為「黨報新聞學」或「毛氏新聞學」——一種極簡新聞學。

## 肆、不完全黨報=社報

在《解放日報》改版前夕，毛澤東把他眼中的不完全黨報說成「社報」，這是一項相當嚴重的指責。不完全黨報即使不合格也還是黨報，而一旦被斥為「社報」，則否定了它的黨報性質，意味著它被打入另冊，形同「派報」。

在毛澤東已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未見他談過「社報」。關於「社報」的材料，目前主要是由胡喬木提供的。胡喬木說，改版前的《解放日報》未能在黨和群眾之間起到應有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因此，毛澤東提出了「尖銳批評」，毛稱當時的《解放日報》「不是黨報，而是社報」（胡喬木，2014，頁449）。1951年9月，胡喬木著文談黨報工作，引用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他說：「在延安，毛主席就問過解放日報：你們究竟是辦黨報，還是辦社報？既是黨報，就要由黨來辦，不是依靠少數人就可以辦好的。」（《胡喬木傳》編寫組編，2015，頁107）

「社報」一詞最早見於胡喬木 1945 年在重慶新華日報社所作的報告，在談到報紙的性質時，他說，經過 1942 年 4 月的改版，「解放日報由『社報』

---

報，成為一切願意消滅民族敵人、建立民族國家的人的共同的喉舌。我們的黨是代表人民的黨，我們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沒有別的利益；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報紙變成全國抗日人民和抗日黨派的共同的論壇，我們歡迎一切抗日人士和黨派利用我們的篇幅來宣導一切有利抗日團結的主張辦法，消滅一切阻害抗建大業的障礙。」博古（1942年4月1日）。〈致讀者〉，《解放日報》，第1版。

<sup>30</sup>也有人提「五性一統」，如「統一於黨性之下的真實性、戰鬥性、指導性、群眾性、黨性」（參見李良榮、沈莉（1995）。〈「五性一統」原則新探〉，《新聞大學》，4：9-11）；還有另外的版本，如「黨性、思想性、戰鬥性、人民性和真實性」（參見齊愛軍（2016）。〈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實踐範式」轉向——兼論對我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建構的影響〉，《青年記者》，34：58-62。）

變成了『黨報』，中國歷來的報都是『社報』，什麼都由社內解決。改版之後，就成了反映全黨活動的黨報了。」（《胡喬木傳》編寫組編，2015，頁17）「什麼都由社內解決」，是胡喬木對「社報」一詞的理解。「反映全黨活動」，是他對「黨報」一詞的理解。

胡喬木建構了（應該說是復述了毛的）「社報—黨報」的二元對立框架，他認為真正的黨報誕生於改版之後的《解放日報》。以他的標準看，重慶的《中央日報》不是黨報，1926年毛澤東主持的《政治週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機關報）也不是黨報，中國其他政黨所辦的機關報更不在話下。「黨報」一詞最早來自梁啟超，在《清議報》時期，「黨報」由「一黨之報」、「一黨報」變化而來的軌跡清晰可辨（梁啟超，1901年12月21日）。<sup>31</sup>但是，梁啟超發明的「黨報」一詞，胡喬木會讀成「社報」。由此可見，「社報」並不是一個規範的報刊術語，而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治話語，而且這套話語是封閉性的。

關於「社報」，還有來自吳冷西（2001b）的材料。吳冷西1941年9月從中宣部調入《解放日報》國際版工作，他也是少數經歷了《解放日報》改版全過程的清涼山報人之一。他回憶改版時說：

這是毛主席早在1941年9月即提出，1941年1月24日、2月11日和3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再三詳細講到要改變《解放日報》的辦報方針。這次整風慣稱「改版」，實際上是改變原來的辦報方針，要把《解放日報》從「社報」改變為「黨報」，從「不完全的」辦成為「完全的」黨中央機關報。……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解放日報》沒有充分表現應有的黨性，不是「黨報」而是「社報」，不代表黨中央，沒有貫徹黨的政策，很少反映黨的活動和中央的決定，不是以我為主，反而大量登載國際新聞，把大部分版面讓給外國通訊社，甚至不加改動地全文轉載外國通訊社的稿件，成了他們的義務宣傳員。……中央決定是2月21日作出的。報社的編委會關門討論了好些

---

<sup>31</sup>梁啟超（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期。

天，我們這些小編輯一無所知。直到 3 月 17 日，報社社長博古同志才召開編輯部大會，傳達毛主席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作了自我批評，並提出改進的辦法，發動大家討論。

這段材料來自於作者晚年所寫的回憶錄。<sup>32</sup>60 年前的事情，難免發生誤記。比如「1941 年 1 月 24 日、2 月 11 日和 3 月 11 日」，應該是 1942 年。「中央決定是 2 月 21 日作出的」，應該是 2 月 11 日。吳冷西回憶改版的方針：「要把《解放日報》從『社報』改變為『黨報』，從『不完全的』辦成為『完全的』黨中央機關報」。將「社報」與「不完全黨報」劃上等號，他的這一理解是不錯的，但這番話是來自於他當時看到的文件，還是他親耳聽到博古、餘光生等人說的？目前不大清楚。筆者認為，極有可能是作者轉述了胡喬木的話。因為在 2001 年之前，胡喬木的多部著作中都已談到了相關的內容（如前述）。而他本人當時還只是一個「小編輯」，尚無資格參與改版的具體策劃。

毛澤東應該是在 1942 年初的某次政治局會議上當面怒斥博古「究竟是黨報還是社報」的。胡喬木在轉述毛的講話時，用過「尖銳的批評」，可見當時批判的火藥味。他也用「就問過『解放日報』」這種表達，似乎當時場面還比較溫和，實際上這可能是身為秘書的胡喬木有意降低調門，把毛的原話粉飾了一番。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召開，或是在 1942 年 1 月 24 日，或是在 1942 年 2 月 11 日，筆者傾向於是 2 月 11 日。此中玄機，應該是師哲提供的一份意見書。

1942 年初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師哲對《解放日報》把主要力量和大量篇幅放在國際新聞，還發表了不少有關的社論，而對國內，特別是邊區的情況報導太少，很有看法，於是寫了一個報告給毛澤東，希

---

<sup>32</sup>《回憶錄》之五（廿載沉浮）（1966-1986 年）一書中的一個章節，根據 1976 年 9 月悼念毛澤東逝世時的發言提綱寫成。當時全書尚未完稿。參見吳冷西（2001a）。〈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記〉（上），《中華魂》，8：4-7。此文發表的第二年，作者就去世了。

望能在政治局會上提一下，以便提高黨報的品質。毛澤東早已覺察到《解放日報》的弱點和不足，於是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讓人將師哲的報告在會上念了一遍，這對博古震動很大。（李志英，1994，頁 402）

1942 年 2 月 1 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提出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2 月 8 日和 9 日，又在中央宣傳部幹部會議上兩次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sup>33</sup>毛澤東集中火力猛烈地抨擊了黨內的教條主義，他大罵教條為「狗屎不如」，又大罵教條主義者「比豬還蠢」（蔡天心、林樹青，1984，頁 36）。這一次，博古諾夫同志在劫難逃了。

師哲是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個秘書，他當然可以給《解放日報》提意見。事實上，當時就有一位叫周文的讀者（時任延安大眾讀物社社長）提了不少意見，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毛的復信記錄在案（逢先知主編，2013，頁 360）。師哲的意見更是受到青睞，毛澤東讓人在政治局會議上代他念了一遍。但問題是，師哲有什麼勇氣挑戰一位現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有什麼資格讓毛在「在政治局會上提一下」他的報告？而為何《毛澤東年譜》對師哲的這份「大字報」隻字不提？為何師哲在其回憶錄中也三緘其口？<sup>34</sup>師哲的「上書」可說是既越界又越權，實在有點蹊蹺。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師哲的意見書是在毛的授意下寫的。師哲不是一位普通的秘書，他當時擔任任弼時的政治秘書（他是 1940 年 3 月 23 日隨任弼時、周恩來等人一起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同時還兼任了毛澤東的俄文秘書。

可能就是在 1942 年 2 月 11 日的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借題發揮，當面斥責博古「究竟辦的是黨報，還是社報？！」博古當即意識到毛要拿他

---

<sup>33</sup>毛的講話時間與文章發表時間常有間隔，這是研究者需加注意的。比如，《改造我們的學習》講話時間為 1941 年 5 月 19 日，發表時間為 1942 年 3 月 27 日；《整頓黨的作風》，發表於 1942 年 4 月 24 日；《反對黨八股》，發表於 1942 年 6 月 8 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於 1943 年 10 月 19 日，遲到了將近一年半。參見黎辛：《親歷延安歲月》，陝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1-172 頁。

<sup>34</sup>《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199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我的一生——師哲自述》（2002），北京：人民出版社。

開刀，所以「震動很大」。不過，翻遍《博古文集》，筆者並沒有找到「社報」字樣。看來博古拒絕了這一指控。博古可以就報社工作不斷地作檢討，但他不會接受「社報」這一惡謔，而且很有可能在關起門來開的報社編輯部會議上，他都不會提及。這就導致日後胡喬木成為有關「社報」資訊唯一的權威發佈者。

究竟「社報」有多可怕呢？查當時中共中央關於黨員缺乏黨性觀念的負面清單，舉凡「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c，頁 443），在在都與「社報」相關。這就不是一般的缺乏黨性了，甚至可以說是毫無黨性的，所以，既然連「不完全黨報」都稱不上，就不能再稱其為「黨報」了。「社報」簡直就是一枚攜帶著超級負能量的話語炸彈。

不僅如此，「社報」實質上就是「派報」，而「派報」就離國民黨報紙不遠了。「社報」在字面上大致還保留了一層薄薄的中性外衣，就它的命名者毛澤東而言，多少還給博古留了一點情面。

1958 年，毛澤東在批判王明時，說 1938 年的武漢《新華日報》是「派報」：「他在那裡分裂黨，他自己實際上成立了中央。辦了一個報紙，叫『黨報』，叫《新華日報》，我說，叫『派報』比較妥當。……你看，中央在哪里？你是黨報，還是派報？我說是『派報』，宗派主義之報。」（周國全、郭德宏，2013，頁 516-517）稍早前，毛澤東還怒斥了《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罵他「書生辦報」、「死人辦報」時，也用過「派報」一詞（王若水，1989，頁 321）。

「派報」再往下滑一步，就成了國民黨報紙了。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前曾尖銳地批評博古：「我們在中國辦報，在根據地辦報，應該以宣傳我黨的政策，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根據地為主，這樣才能區別於國民黨的報紙。」（胡喬木，2014，頁 449）言下之意，改版之前的《解放日報》差不多就是國民黨的報紙，根本算不上共產黨的報紙。其實，此時解放日報社社長博古本人的政治生命，也是命懸一線，他的問題到底屬於黨內問題（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還是屬於黨外問題（所謂的敵我矛盾），尚在未定之中。（何方，2005，頁 258-260）

把共產黨的機關報辦成了國民黨的報紙，長江局的《新華日報》被認為是個惡劣的先例。在 1943 年九月會議期間，康生曾這樣批判王明：「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的言論，如說蔣介石是全面抗戰的，要時時、事事、處處幫助政府，這完全是投降主義思想。」（胡喬木，2014，頁 287）康生的觀點無疑反映了毛澤東的內心想法，在他們看來，武漢《新華日報》就是國民黨的「第五縱隊」。

把改版前的《解放日報》說成「社報」，把武漢時期的《新華日報》說成「派報」。同一張共產黨機關報只因其所含「黨性」之多少，就會在以下序列中上下浮動：完全黨報——社報（不完全黨報）——派報——國民黨報紙。這也是毛澤東的一種話語策略（discourse strategies），使用的是一套非常具有個性特徵的政治修辭（political rhetoric）。

毛澤東話語策略多樣，政治修辭豐富。當他批黨內的教條主義「言必稱希臘」時，「希臘」只是蘇聯、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一個代號，「希臘」是個假想敵；當他批文藝界的自由主義「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時，居然出現了一個活人與死人的較量，其實馬克思只是毛澤東的一個代名詞。當時的蘇聯特派記者孫平（中文名）領教過毛的這種話語技巧。<sup>35</sup>

從某種意義上講，辯證法也是一套政治修辭，毛更是其中的行家裡手。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毛與劉（少奇）、周（恩來）之間為此展開了一次中等烈度的話語較量，結果他輕鬆取勝，因為他掌握了那個神秘的話語「按鈕」。1958 年初，毛澤東曾提倡學習「海瑞精神」，那「嘉靖皇帝」是誰？這得由他說了算，他認為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處於第一線的中共領導（以劉、周為代表）。但當彭德懷仿效海瑞上書後，結果「嘉靖皇帝」龍顏大怒。毛事後解釋說，海瑞也有左派、右派之分，他喜歡的是左派海瑞。<sup>36</sup>而當毛輕而易舉取得一場又一場話語戰勝利之後，他的話語體系反而日益走向封閉。到他發動文化

---

<sup>35</sup>「要正確理解毛澤東的講話，必須充分瞭解他的政策，以及他的拐彎抹角、模稜兩可的術語。」[蘇]彼得·弗拉基米諾夫（著），呂文鏡等（譯）（2004）。《延安日記》，頁 453。北京：東方出版社。

<sup>36</sup>李銳（2001）。《廬山會議實錄》（第 3 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頁 338。

大革命之際，其他的中共領袖雖緊隨其後，仍大呼「跟不上」，他的話語實踐最終變成了一場左右互搏的自我戰爭。

## 伍、餘論：「群眾辦報」與延安經驗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怎麼樣呢？毛澤東認為它進步了，蕭軍也認為它進步了，但兩人的標準是不一樣的。蕭軍曾以一個文藝作家、一個黨外人士、一個《解放日報》讀者的身份，出席了 1942 年 3 月 31 日的改版座談會。他當場這樣講：「據博古同志說，黨報的黨性不強，我卻覺得有點過強了，強得已經成了孤立的火車頭，沒了列車。」（蕭軍，2013a，頁 433）在這裡，筆者又看到了不同的黨性觀和不同的黨報觀。<sup>37</sup>一年之後，蕭軍說：「上午把幾天報紙讀了一遍，解放日報是有了進步，它和實際生活有了聯繫。我去年在他們改組時給了一些意見，他們在部分地改正了，關於新聞的配備，社論等。但此後自己對這類事不要提起，免得有損於他們『尊嚴』的嫌疑。」（蕭軍，2013b，頁 65）又過了兩年，蕭軍在《日記》中寫道：「下午《解放日報》陳企霞來，他問為什麼近來人對報紙沒了意見？我說這有兩個原因：一，報紙進步了，消除了意見；二，人們對它冷淡無味了。據我估計後者理由更多些。」（蕭軍，2013b，頁 707）「冷淡無味」無疑是個差評。1944 年夏天，來訪的《新民報》記者看到了這張「每天只能印 7000 多份」、特別「雜誌化」的「宣傳紙」（趙超構，2013，頁 158-159）。

接著再看看李銳提供的材料。1941 年 9 月，李銳由中央青委調入解放日報社，先作國內部編輯，第二年調到評論部。1946 年 2 月，新任《冀熱遼日報》社長的李銳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中共各地出版的報紙，只能以「政治上強」而聊以自慰，技術上實在粗糙，需要改進。所以他希望在張家口辦一所高級「新聞專校」。信中還轉述了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話：「今

---

<sup>37</sup>報紙的公開報導有意掩蓋了這一分歧。「作家蕭軍熱烈的希望本報加以改革，他在指出本報許多缺點後，提出了許多具體改革的辦法。」《在本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號召整頓三風要利用報紙》（1942 年 4 月 2 日）。《解放日報》，第 1 版。

後各地的報社不應該是一個模子，然而，今天事實上還都是小『解放日報』。」（丁東策劃採錄，李南央整理編輯，2013，頁 184）看來對於延安的辦報模式或解放日報模式的弊病，中共文宣部門負責人是清楚的，實際上，最高領袖對此也很清楚。1957 年毛澤東就說過：「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很短，全國性辦報就沒有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頁 245）當然這話也只能由毛自己說出來。

延安辦報打上了深深的延安烙印。學者們常喜歡引用陸定一的一個說法：「安塞發生的事情，傳到延安，要經過毛驢子傳過來。」（陸定一，1981）安塞是清涼山西北方向的一個小縣城，距離延安不到 40 公里，但是交通不便，通訊手段落後。我們不用再去證明經濟落後與（農民）革命之間的必然聯繫，但落後、貧窮給動員性政黨提供了用武之地。所謂制定符合實際情況的各項政策（包括宣傳政策），就不可避免要遷就當地的落後條件。落後與貧窮意味著公共品（public goods）的匱乏，而想要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就必然需要超經濟的強制。另一方面，專業分工相對不夠發達，進一步的專業分工也會受到抑制。清涼山報人在正常出版報紙的同時，還要養雞養豬。有限的新聞紙用來刊載新聞、評論與文藝作品外，還要用來生產（用其邊角餘料）一種清涼山牌的香煙。這裡，至少從技術上講，「記者辦報」必然要讓位於「群眾辦報」。少數人關起門來辦報，也必然為全黨辦報所取代。換句話說，「群眾辦報」更適合於欠發達地區。有學者認為，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是一種很先進的辦報理念，因為是「全民參與式傳播」（趙月枝，2018）。這其實是一種很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評價。

「群眾辦報」是毛澤東新聞思想中最富特色的內容，但要理解「群眾辦報」，還要理解它背後的觀念因素，那就是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也是毛澤東在延安用來對付主觀主義的法寶。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都會祭出這一法寶，屢試不爽。不管我們怎樣評價毛澤東的群眾路線，但不應忘記其中的民粹主義（populism）內核，它天然地否定專家路線與科層制（bureaucracy）。有人認為，「群眾路線是針對農民社會的問題與缺陷而提出的」（Selden, 1995／魏曉明、馮崇義譯，2002，頁 259）。有道理，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從權力的觀點來看，群眾路線也是一種「擴大

授權」(陳永發, 1990, 頁 152)。總之,「群眾辦報」只是毛澤東群眾路線在新聞宣傳領域的實踐而已。

需要說明的是,農村辦報與城市辦報是不一樣的,對此博古後來也是清楚的。但《解放日報》是一張幹部報,<sup>38</sup>是「幹部的報紙」(趙超構, 2013, 頁 158)。與其他邊區報刊定位不同,在《解放日報》改版問題上,過分強調邊區文盲多,其實意義並不大。

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是一個重大事件,其意義遠超出一般新聞史或報刊史的範圍。改版,即改組、改造。不能從「改組」與「改造」的層面去理解改版事件的話,就難免隔靴搔癢。改造黨報,是改造黨的一部分,隨著整風運動的推進,新的中共誕生了,新的黨報也隨之誕生了。毛澤東成功地創造了中共的新傳統。(高華, 2015, 頁 304-311)

博古的黨報觀與毛澤東的黨報觀,表面上看,似乎差異很大,其實擁有共同的根基,因為他們師出同門。<sup>39</sup>毛澤東的黨報觀與博古的黨報觀,分屬於中共黨報觀的兩個流派,毛為主流派,博古為非主流派。毛的黨報觀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博古的黨報觀也並未喪失生命力。<sup>40</sup>博古雖然後來在政治上落敗了,但這不意味著他的黨報觀就已出局。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可視為博古黨報觀的回歸,可惜這次改版曇花一現。

在毛澤東的政治話語中,黨報與社報是絕然對立的,非此即彼,不存在「『黨報』之身、『社報』之魂的複合體」(王春泉, 2013)。「社報」是毛澤東的一項發明,它透射著黨內鬥爭的刀光劍影。「社報」的對立面「完全黨報」,是毛澤東的一種強有力的政治話語,「完全黨報」是毛澤東黨報觀的精

---

<sup>38</sup>博古認為改版之後的《解放日報》進步了,在「文字方面達到縣一級幹部能看懂」的程度。博古(1942年6月1日)。〈用社論精神檢查報紙工作〉,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2007),《秦邦憲(博古)文集》,頁4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sup>39</sup>「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與王明、博古等並無實質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澤東與王明、博古一樣,師承的都是列寧-史達林的新聞理論,只是毛澤東比王明、博古更加黨化,更加史達林主義化,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史達林。」高華(2015)。《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374-37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sup>40</sup>對博古來說,《解放日報》最好能成為一張「全國紙」;而對毛澤東來說,它成為一張真正的「全黨報」就好了。1942年4月1日的改版社論《致讀者》,也可視為毛的黨報觀與博古的黨報觀的一種混合體。

髓。1957年，毛澤東提倡「政治家辦報」，這是「完全黨報」的另一種表達。「完全黨報」也是中共黨報觀的基調，一直延續至今，「黨報姓黨」就是它的當代版。

必須指出的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是逐漸取得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他後來也承認，在1941年5月19日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時，應者寥寥。1941年九月會議的召開，反對教條主義才取得階段性成果。<sup>41</sup>1942年初整風運動全面鋪開不久，他就確立了話語霸權，「毛澤東思想」的出現為其完成之標誌。他取得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後，也就獲得了對黨性（完全與否）、黨報（完全與否）的評判權與決定權。極而言之，如果博古仍在臺上，而毛澤東僅為《解放日報》社長的話，博古也可以（如果他願意的話）指責毛所主持的《解放日報》有若干缺乏黨性的表現，為一「不完全的黨報」。

「完全黨報」不是一個簡單的黨報用語（term），而是一個複雜的話語。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整套的。它是在延安時期中共黨內思想交鋒和權力鬥爭<sup>42</sup>中產生的。它不只是一種闡釋，還是一種建構（construction）。或者說，它是在整風運動的大背景之下，在《解放日報》的改版過程中，生產出來的一套意義符號，其重要性不下於改版本身。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是改造，是「徹底的改造」（逢先知編，2013，頁368）。2月11日政治局會議上決定《解放日報》改版，委託博古「根據會議的意見，提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討論。在新方案實施前，先進行改良」（逢先知編，2013，頁362-363）。「改良」之後還要「徹底的改革」（博古，1942年4月1日）。毛澤東的目標本來就不是改版<sup>43</sup>，改版

<sup>41</sup>「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後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逢先知（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頁469）。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sup>42</sup>毛並不諱言「權力鬥爭」。1942年9月5日，陸定一傳達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的批評時說：「毛主席在會上指出，報紙不能有獨立性，過去有一段是那樣的。應當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辦報，自由主義在報社不能存在，這就牽連到工作制度與權力問題，為此必須規定某些條例。」王鳳超、岳頌東編寫：《延安〈解放日報〉大事記（1941.5.14-1947.3.27）》，《新聞研究資料》（總二十六輯），1984年7月。

<sup>43</sup>1942年3月31日改版座談會上，改版不是唯一的主題，還有整頓三風問題，以及「批評絕對平均觀念」。出席改版座談會的李銳回憶說，他對最後一項印象很深。

只是一個手段，他要以此改造黨報，進而改造黨。那麼「完全黨報」的目標實現了嗎？毛雖從未有過這一宣示，但如果一定要找到這一宣示的時間點，那麼只能說，從邏輯上講，「勝利的、團結的」中共七大的順利召開，相當於「完全黨報」大功告成。事實上，《解放日報》也從未正式宣佈它的改版已經結束。以「完全黨報」的標準來看，也許永遠都不會有結束的那一天。或如馬克思評價「真正的報刊」時所說——「如同生活本身一樣，報刊始終是在形成的過程中，在報刊上永遠也不會有終結的東西」（馬克思，1956，頁 187）。

## 參考書目

-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2015）。《胡喬木談新聞出版（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在本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號召整頓三風要利用報紙〉（1942 年 4 月 2 日）。《解放日報》，第 1 版。
- 〈教條與褲子〉（1942 年 3 月 9 日）。《解放日報》，第 1 版。
- 〈黨與黨報〉（1942 年 9 月 22 日）。《解放日報》，第 1 版。
- 丁東策劃採錄，李南央整理編輯（2013）。《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大文化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a）。《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b）。《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c）。《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2014）。《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1985）。《「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39 年 10 月 4 日）。〈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 
- 丁東策劃採錄，李南央整理編輯（2013，頁 106-107）。

- (1991), 頁 602-614。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1986), 頁 471-480。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明(著), 徐小英等譯(2004)。《中共 50 年》。北京：東方出版社。
- 王春泉(2011)。〈圖景想像、資源整合與黨報媒介「品牌輪盤」製作——延安〈解放日報〉改版與「毛澤東新聞學時代」的確立〉,《新聞與傳播評論》, 46-66+221。
- 王春泉(2013)。〈再論「完全的黨報」〉,《新聞與傳播評論》, 58-68。
- 王若水(1989)。《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王揖(1984)。〈走在世界輿論的前面——回憶國際新聞編輯工作〉,《新聞研究資料》, 1: 52-60。
- 王敬(編)(1998)。《延安〈解放日報〉史》。北京：新華出版社。
- 王鳳超、岳頌東(編)(1984)。〈延安〈解放日報〉大事記(1941.5.14-1947.3.27)〉,《新聞研究資料》, Z1: 74-120。
- 王潤澤(2009)。〈重塑黨報:〈解放日報〉改版深層動力之探析〉,《國際新聞界》, 4: 105-111。
- 何方(2005)。《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
- 吳冷西(2001a)。〈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記〉(上),《中華魂》, 8: 4-7。
- 吳冷西(2001b)。〈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記〉(中),《中華魂》, 9: 22-25。
- 吳葆樸、李志英(2007)。《秦邦憲(博古)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 李立三(1930)。〈黨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1980),《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下冊), 頁 126-127。北京：新華出版社。
- 李志英(1994)。《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 李卓然(1931年7月1日)。〈怎樣建立健全的黨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1980),《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下冊), 頁 145-147。北京：新華出版社。
- 汪佩偉(編)(2016)。《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江亢虎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周國全、郭德宏(2013)。《王明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 胡喬木(201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胡夢華(1932)。〈中國國民黨的黨性〉,《人民評論》, 21: 5-6, 23: 206-207。
- 胡績偉(1999)。《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孫中山(1911年12月30日)。〈與江亢虎的談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1981),《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頁 579-580。北京：中華書局。
- 逢先知(編)(201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共中央

文獻出版社。

馬克思 (1956)。〈「萊比錫總匯報」的查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 (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頁 186-188。北京：人民出版社。

高華 (2006)。〈在革命話語的高地上〉，《社會科學論壇》，8：39-48。

高華 (2015)。《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力丹 (2016)。〈黨性和人民性的提出、爭論和歸結——習近平重新並提「黨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與現實意義〉，《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71-88。

張友漁 (1997)。《張友漁文選》(上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陳永發 (1990)。《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學昭 (1940)。《延安訪問記》。香港：北極書店。

陸定一 (1957 年 3 月 13 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陸定一文集》編輯組(1992)，《陸定一文集》，頁 554-561。北京：人民出版社。

陸定一 (1981)。〈陸定一同志談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在解放日報史座談會上的講話摘要〉，《新聞研究資料》，3:1-8。

梁啟超 (1901 年 12 月 21 日)。〈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100。

博古 (1942 年 7 月 31 日)。〈反對黨八股，建設新文風〉，無錫市史志辦公室 (編) (2007)，《秦邦憲 (博古) 文集》，頁 470。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博古 (1942 年 4 月 1 日)。〈致讀者〉，《解放日報》，第 1 版。

博古 (1944)。〈黨報記者要注意些什麼問題〉，無錫市史志辦公室 (編) (2007)，《秦邦憲 (博古) 文集》，頁 488-48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黃旦 (2013)。〈「新型記者」：主體的改造與重塑——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之再考察〉，李金銓 (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楊奎松 (2005)。《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楊獻珍 (1956 年 7 月 14)。〈從堅持唯物主義、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來加強我們的黨性鍛煉〉，《楊獻珍文集 (II)》(2002)，頁 72-8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董樂山譯 (2005)。《西行漫記》，頁 132。北京：東方出版社。(原書 Snow, E. [1937]. *Red star over China*, London, UK: Victor Gollancz)

熊國榮 (2012)。〈版面安排及調整：從〈紅色中華〉到延安〈解放日報〉〉，《國際新聞界》，1:96-100。

- 趙月枝 (2018)。〈全球視野中的中共新聞理論與實踐〉，《新聞記者》，4:4-16。
- 趙超構 (2013)。《延安一月》。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 劉少奇 (1950)。〈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社 (編)，《整風文獻 (訂正本)》。北京：新華書店。
- 劉繼忠、梁運 (2012)。〈論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的政治邏輯〉，《新聞與傳播研究》，19:11-19。
- 劉憲曾、劉端棻 (主編) (1994)。《陝甘寧邊區教育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劉蘇華 (2012)。《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出版史研究 (1937-1949)》。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蔡天心、林樹青 (1984)。〈「實事求是」——回憶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溫濟澤等 (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頁 34-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蕭軍 (2013a)。《延安日記 (1940-1945) (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蕭軍 (2013b)。《延安日記 (1940-1945) (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魏曉明、馮崇義 (譯) (2002)。《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 Selden, M. [1995].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ed*. M. E. Sharpe, Inc.)

##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 Discourse Event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Guang-Ming Zhou\*

### ABSTRACT

From 1941, Mao Zedong brewed and launched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imed at comprehensively reform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Bogu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ogmatism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Yan-an Liberation Daily was bound to be the focus of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a discours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party newspaper, and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arty newspaper was part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arty. The newspaper reform was a political event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nd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a discourse event in the process. The newspaper reform w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Mao Zedong's party newspaper outlook and Bogu's. In the end, the former defeated the latter.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te Party Spirit”. The competition of the party newspaper outlooks was actually the confrontation of party spirit. The opposite of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was “In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nd the latter was scolded as “Group Newspaper” by Mao Zedo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party, the “Group Newspaper” constituted a serious accusation. With the end of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he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lso precipitated as the core of the CCP's newspaper outlook. Although it bears the brand of Yan-an, it has surpassed the experience of Yan-an and has been affecting so far.

**Keywords:**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discourse event, group newspaper  
liberation daily reform, party spirit principle

---

\* Guang-Ming Zhou is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email: jczhougm@126.com

## 歐盟版權改革與數位單一市場初探

李筱雯\*

### 本文引用格式

李筱雯（2019）。〈歐盟版權改革與數位單一市場初探〉，10:75-88。

---

投稿日期：2018 年 11 月 2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1 月 30 日。

\* 作者李筱雯中研院歐美所博士後研究員，e-mail: hsiaowentw@gmail.com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版權改革的論點，以及各方的疑慮與辯證。隨著社群網路平台的興起，原本受到版權法保護的媒體與文化產業，其原本的獲利與生產模式遭遇極大的挑戰。社群網路平台集生產，廣告與流通於一身，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潤，導致價值落差的問題產生，而為了保障創作者的公平報酬，並且檢討版權在數位時代所遭遇的難題，歐盟開始啟動版權改革，並設立數位單一市場，保障版權擁有者的權利。

**關鍵詞：** 公平報酬、版權改革、社群網路平台、價值落差、歐盟數位單一市場

發始於印刷與類比時代的智慧財產權觀念與版權法，在數位時代的今天，遭遇許多挑戰與困難，特別是版權法中的授權等相關權利，幾乎都變得窒礙難行。其中最重要的變革是社群網路平台（internet intermediaries）的特色，以及參與式數位文化的興起，使得固有的版權觀念顯得落伍又過時。例如，網際網路打破了疆界，讓各種作品可以暢行世界，參與式數位文化則將授權複製的觀念拋諸腦後。不過，當數位發行，直播串流，分享檔案，已經是愈來愈成熟的數位經濟模式，許多秉持這些觀念的社群媒體平台，也在數位時代取得非常大的經濟利益，這使得在舊時代遵循版權法獲利的團體，失去獲利空間，因此不斷地想方設法，端出各種說帖與遊說方案，必須改革版權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本文將初探各方對版權改革的說帖，包括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版權指令計畫書，部分研究者對版權法問題的批判與變革的想像，以及業界與遊說團體的說帖。關於數位版權的爭辯與改革還在持續進行中，各種研究案與利益團體的說帖多不可數，而即使歐盟通過了版權指令（Directives），將來到各國議會修訂版權法等相關法規，仍然很漫長，不過從初探中，可以先探現今數位版權爭辯的部分論點。

## 壹、數位版權法的論點與變革想像

根據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計畫書（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Proposal），目標要建立一個「現代化，更歐洲的版權法架構」，但因為業界的強力遊說，有時成為各方討價還價與妥協後的產物。在版權法與鄰接權（neighbouring rights）的改革上，主要有三個方向，建立新的版權法架構（framework），評估價值落差（value gap），以及要求公平報酬（fair remuneration），而這三大方向都與網際網路業者的利潤有關。傳統版權法的相關授權是指作品的再製、出租、編輯、演出等等（Smartt, 2014, p. 413），這些都受到版權法的保護，必須取得授權，以保障創作者的經濟利益。版權法保護的是表現的形式，並非保護想法，程序，操作方法或者是數學運算概念，具體而言，版權是在保護資訊最初始時，被展現出來的形式的作品（Oster, J., 2017, p. 371），而不是創作者的想法或點子，從十九世紀的印刷時代開始，版權法的規範歷經數次更迭，但最重要的基礎是創作人格權，意即版權等同於基本人權，當作品被創作出來時，創作者的權利就需受到保障。

版權保護的過程中，曾經歷過許多重要的宣傳活動，尤其是音樂工業（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p. 33-34），例如，反盜版活動從 1980 年代早期開始，當卡帶與家庭錄影帶開始流行時，複製變得非常容易，於是英國的留聲機工業就喊出「家庭錄影帶殺死音樂」（Home taping is killing music），更以駭人的骷髏頭示警。進入廿世紀的數位時代之後，美國電影協會對反盜版的宣傳，更以「犯罪」（It's a crime），來警告數位複製者，強調盜版就是小偷，將侵權與刑事犯連結一起。英國的電影工業對盜版的警告宣傳也不遺

餘力，最著名的就是把街頭販賣的盜版光碟與人蛇集團控制的非法偷渡客連結在一起，同時要求社會大眾，對購買盜版的行為視為恥辱，並唾棄購買盜版光碟者。然而，這些反盜版宣傳在科技益發精進的數位時代，所遭遇的挑戰也愈來愈大，尤其在網際網路時代的混合與再製，檔案分享，隨機點選，全球流通的數位網路平台等等，不但使得授權與收費變得益發困難與複雜，消費者也不再單純只是被動閱聽人，或受眾，而是變成主動閱聽人，主動搜尋，發表意見，甚至二次創作，這也使得集生產、發行、廣告、觀看等等於一身的網路平台快速取代其他媒體平台，成為贏者全拿的大贏家。同時，創作者與版權所有人也愈來愈難從傳統的經濟模式中受益，特別是音樂創作人與藝術表演者，對於數位收入該如何分配，以及如何保障在數位網路平台上的授權，成為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 一、價值落差

價值落差與社群網路平台有很大關係，所謂社群網路平台，簡言之就是用任何方法讓人人可以使用網路，接觸到他人產製的內容（Angelopoulos, 2016, p. 16）。因此這個平台必須是提供關於網路的服務，並且有由他者產製的內容，還必須公開地被其他第三方的人使用。而網路平台處於兩個他者之間，具有居間協調的天性，也使其很容易涉入必須負起連帶責任（accessory liability）的爭辯裡。大致而言，社群網路平台有三種（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p. 46-47），一是網路服務的提供者，讓使用者可以連結網路；二是網路搜尋引擎，協助使用者找到需要的內容；三是數量龐大的社交網路平台，提供大量的內容與功能，讓使用者點選。不同的網路平台跟版權，以及媒體使用者，創意工作者，有不同程度的關係。有些是所謂擁有合法的版權作品，並將報酬付給創意工作者或商業公司；有些是非法或未獲授權的網址，涉及侵權；有些則可以自由地讓公眾使用，沒有版權問題，例如維基百科。

而擁有大量使用者的社群網路平台，因為是居中協調的中間者，就順勢地變成訂定規則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去中心化的網路流通空間，已經成了巨無霸社交平台，是網路市場的霸主，無論在網路內或網路外，都快速累積並集中大量資本，成了最大贏家。在全球巨無霸網路平台上，最多人造訪的是谷歌（Google.com），臉書（Facebook.com），Youtube.com，雅虎（Yahoo.com）以及百度（Baidu.com），最後是提供公眾自由使用的維基百科，除了維基百科之外，其他皆是商業用途。過去，在 2001 歐盟版權指令（ECD）以及 1998 美國數位千禧版權法案（DMCA）的規定下，網路平台只不過是資訊流通的「通道」（mere conduits），不須對侵權負責，可以豁免責任，但是一旦被檢舉有侵權或違法之嫌，網路平台只要將其下架就好，稱為「警告並下架」途徑（notice and takedown approach）。不過這些顯然不夠，因為在法律灰色地帶上游走的這種商業模式，一方面是法律的不確定性，什麼樣的內容是侵權或不恰當，若要求網路平台監視或規範創作作品，有人擔心將危及言論自由

與創作自由，並且與網路的自由創作環境與發展背道而馳，二方面是社群網路平台收入的不透明，有些網路平台與音樂公司簽約，授權播放作品，但對於有大量使用者生產的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使用者二次創作的平台、廣告收入多少、該如何分配，完全不清楚，這也使得許多創作者，無法計算以及獲取應有的報酬，這也因此產生價值落差。

所謂的價值落差是指實質收入的差異，以受影響很大的音樂產業舉例，根據國際唱片業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IFPI）國際音樂版權的年度報告 2018（Global Music Report, 2019），2017 年的數位流播收入大幅增加 41.1%，一億七千六百萬使用者訂購付費網站，流播收益佔全球音樂產業 38.4%。於此同時，YouTube 平台的流播，佔整體視頻流播量的 55%，其他的付費平台佔 23%，免費的平台佔 22%。英國音樂產業聯盟 2017 年度報告（Measuring Music 2017 Report, 2017, pp. 14-15）同樣也指出，閱聽眾每週收聽音樂的平台，YouTube、Spotify、Apple music 以及 Amazon music 這些數位平台就佔了 87%，YouTube 是閱聽眾收聽音樂平台的第一名，但 CD 意外地回升到第二名，不過在消費市場上進展最快的是臉書（Facebook），甚至超越 iTunes，成為最普遍收聽音樂平台的第四名。因此，年度報告中表示（Measuring Music 2017 Report, 2017, p.10），雖然音樂人，包括譜曲、寫歌、寫詞等等創作人的附加價值毛額（GVA），也就是音樂產業所創造出來的商品服務價值，在 2016 年對英國經濟貢獻了 20 億英鎊，但是他們對經濟的貢獻並沒有反映在他們的收入上，只有小部分的人有很好的收入，在音樂產業裡的大部分工作者的收入都低於一般人的平均收入。

顯然地，價值落差是指數位網路平台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潤，出自於經濟的考量，必須要重新分配，但是到底誰該拿多少？到底怎麼分配才是公平？該怎麼規範，誰來規範？卻不能只從經濟層面來考量。

## 二、公平報酬

基於正義與平等的公平報酬（Aguilar, 2018），或是合理報酬，首先受到指責的是網路流播的音樂平台付費太低，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將自己的作品全數從音樂流播平台 Spotify 中下架，就是為了抗議付費太低，英國歌手愛黛兒（Adele）也拒絕發表新作品在直播串流平台。但到底什麼是「公平」（fairness）？根據 Aguilar（2018）對各個利害關係人與團體的訪談發現，公平的觀念是很破碎的，全視利害關係人的權力與影響力大小而定。在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的立法討論中，傾向新自由主義的思考方式，「公平」是指將規範降到最低，讓市場力量自由運作（Aguilar, 2018, p.162）。這樣的結果往往僅顧及大型唱片公司的利潤與公平報酬，任何關於市場的擴大與每個地理區域的收入增加，只有利於大型商業唱片公司及其商業夥伴或代理人，極少考慮到創意工作者，他們被壓縮到只能將創作當業餘

工作，削弱了為自己爭取利益的力量，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而所謂公民（citizens），在討論的過程中，被等同於為企業家，或生意人，但相反地，「表演者公平網路」（Fair Internet for Performers Campaign, FIPC）則主張將所有人，或所有網路使用者，都視為創意產業的勞動力。

以表演者公平網路（FIPC, 2016）的抗爭活動為例，他們認為網路平台剝削了他們的創意與收入，因此提出了「making available right」，意即讓表演者有絕對權利授權或禁止數位平台公開播放他們在現場表演時，被錄製的作品，或直播，或音樂與電影的下載。尤其這些商業機構在第一時間若未取得授權，未徵求表演者同意時，就不能播放。表演者團體顯然認為版權法改革對他們的保障不足，也並未採納表演者絕對的智慧財產權之觀點。然而，現今藝術創作與表演的創作，經常是跨領域的藝術展演形式，但法令對表演者的權利與收入卻缺乏保障，他們通常只領了一次收入，之後被反覆重播或放置在網路播放，都沒有任何版權收入。表演者公平網路聯盟宣稱代表超過五十萬人的音樂工作者，歌手，演員，舞者以及其他的表演工作者，他們呼籲應該將強制執行的報酬權（unwaivable remuneration right）納入歐洲版權法指令中，規定會員國必須訂定出明確的分潤比率，要求網路平台必須付費，無法再忍受被一次性買斷的剝削。

音樂經理人論壇（Music Managers Forum, MMF）則是認為數位平台可獲得最多 30% 的年收入（Cooke, 2016），其餘的 70% 應該付給音樂產業。音樂經理人代表的是藝術家、表演者或創意工作者的經理人（或經紀人），是藝術表演工作者職業生涯的合作夥伴，協助他們去挑選適合的商業合夥人，代表藝術家談合約，並且協助藝術表演工作者了解數位網路平台的新商業模式，開發更多的收入來源。其中許多音樂製作公司認為，現階段的直播收入被劃分為錄製權與出版權，而前者獲得的收入往往高於後者四到五倍之多，非常不公平，有任倡議應該均分。但許多人認為生產新的音樂，對許多音樂唱片公司，也就是音樂商標業者來說，都必須冒很大的風險，特別是產製新人的音樂作品，即便網路時代所冒的風險已大幅低於 CD 時代。不過，大部分的人都同意應該保障傳統藝術家的收入，應該要付給這類藝術工作者比較高的份額比率，因為其收入仍然偏低。但對藝術家及其經理人來說，更大的意見在於唱片公司應該具體地把數位收入的計算公開，應將直播串流的收入更透明化。目前數位音樂作品收入的分配為，數位網路平台業者 30%，唱片公司 46.4%，藝術家 11.6%，出版商 3.6%，歌曲創作者 8.4%。音樂人論壇因此呼籲唱片公司應該要釋出更高的網路流播收入比率給音樂人（藝術家與音樂經理人），要求讓表演者獲得公平的報酬，但這一切前提是必須將網路流播資訊透明化，藝術家才知道自己的報酬是否合理。

不過，從音樂人論壇的說帖「剖析數位錢幣」（Aguilar, 2018, p.171）中也可看出，唱片公司所提供的合約，其實也是一種剝削。在他們眼中所謂的公平，純粹是經濟考量，也就是當沒有經驗的創作者與唱片公司簽約時，毫無談判與討價還價能力，唯有等到成名後，才有辦法改變合約裡的條款。從這裡也可看出音樂產業裡的權利不平等，也就是贏者全拿的狀態。

### 三、架構改革

除了音樂產業與表演團體之外，數位文本的表現形式也迥異於印刷文本，在數位文本中會植入超連結 (hyperlink)、框架 (frame)、直接連結 (inline linking) 或深度連結 (deep linking) 等等 (Leistner, 2017)，這些如果都要取得創作者的同意才能連結，似乎有違公共傳播權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如果連結到的是非法或侵權內容是否該受罰？如此一來，會不會造成寒蟬效應？而且這些在實際執法上也有很大問題，更會影響網路資訊的自由傳播與創作環境。至於數位網路平台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Leistner, 2017, pp.140-141)，更是最複雜與棘手的問題，到底該顧及使用者的權利與利益，或者是如果平台已經盡力清除侵權影帶的話，社群網路平台該對什麼樣的問題負責？以及在平台將影帶移除時，應該有什麼步驟與程序，以確保使用者的權利與利益，其中的種種細節也付之闕如。

從 2004 年谷歌在納斯達克上市以來，包括其他的巨無霸社群網路平台，皆已經出現十餘年，過去在印刷時代以及類比時代建立的版權法，早就不適用或不敷使用，但由於版權法的改革攸關龐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在各方利益團體的角力下，遲遲未能對「版權」這個觀念與架構進行改革。雖然，數位版權與歐洲數位單一市場版權指令在大方向上已經確定，但還是會持續地檢討，因為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法律問題。

事實上，許多研究案由業界與遊說團體支持，為了取得研究經費，研究案經常會受限於資助對象的期待，這也造成改革方向爭辯數年，僵持不下的原因。例如，若想從谷歌公司申請研究經費，唯有研究方向是有助於該公司的觀點，這樣的成果與切入角度，自然迥異於音樂工業與藝術家團體，例如音樂人經理人論壇或音樂人工會，以及歐洲表演者組織協會。谷歌鉅資資助學術研究，為自己的利益辯護 (Scott & Hirst, 2018, March 16)，例如，抗議組織「問責中心」(Center for Accountability) 指出谷歌曾經提供九百萬歐元的基金給位於柏林的學術研究機構「漢波德網路與社會研究學會」(Humboldt Institute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發表在符合谷歌商業利益下的研究報告與論文，這筆資金相當於該學會四分之三的年度經費，不過，該學會主任強調只有主動收取谷歌一百五十萬歐元的研究經費，並且強調一切透明。在倫敦，谷歌也提供經費給「數位歐洲研究聯盟」(Research Alliance for a Digital Europe) 以及由國際創新組織成立的智庫「READIE」，生產數十篇關於數位主題的文章，部份文章明顯有利於谷歌在歐盟的遊說工作，而且此智庫舉辦的活動，讓谷歌執行長有機會接觸到歐盟的決策高層。此外，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自從接受谷歌資助後，立場開始轉變，發表數篇論文，批評歐盟委員會對谷歌的反壟斷調查。但該中心表示，谷歌只是付商業公司的會員費給該中心，一萬兩千歐元會員費，只佔全部會員收入的百分之一還不到，根本沒有能力影響研究主題。

不過經過十餘年的爭論後，2018 年九月歐洲議會表決支持計劃書，通過歐盟版權指令，揚言誓為歐洲的創作者向巨無霸的社群網路平台討回應有的報酬（EU Parliament News, 2018）。

## 貳、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計畫中的版權架構

歐盟法律分為主要法規與次級法規（Foster, 2016, pp.110-122），條約（Treaties）是主要法規，次級法規是條規（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s）、決定（Decision）、建議與意見（Recommendations, Opinions and Soft law）等等。歐盟的成立根基是基於條約，把所有的歐盟會員國綁定在一起，但是如果是條約裡面沒有提及的範圍或領域，歐盟委員會就不能在那個領域內提出任何法案計畫書。任何法案的計畫書都是由歐盟委員會先擬定，再交由歐洲議會，以及歐盟理事會，討論並完成立法。不同的法規有不同的效力，「條規」應用在歐盟內的全部會員國、機構與個人，法條非常詳細並清楚地規定，強制所有會員國一致執行，沒有差別。而「指令」則是訂立目標，在實踐上要求所有會員國都須達到指令的目標，但讓各會員國依照各自國內法的情況，在一定時間內，討論條文細節，完成立法。「決定」是特別綁定與強致執行的法案，對受文者有強制性，通常針對各別會員國或特殊情況的個人，例如，某一地區或國家的競爭法，對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協議是否與歐盟的競爭法規相違背，做出決定，而後再知會所有會員國注意。至於「建議與意見」，則是沒有任何約束力，但是當會員國的國內法庭在審案時，必須將建議與意見列入考慮。

2006 年底歐盟委員會公布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計畫書的版權規則，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布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的版權指令計畫書（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自 2017 年起陸續討論完成立法，2018 年 9 月 12 日歐洲議會正式通過版權法指令修正案。事實上在此之前，各方遊說團體已經討論與爭辯多年，各持己見。根據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計畫書的說帖，也就是版權指令，其目的旨在建立一個跨越國界的架構，讓使用者可以跨歐近用，排除疆界的障礙，並鬆綁數位內容在教育、研究與文化遺產上的運用，進而建立更健全，更現代化的版權架構。

在計畫書中（EU Laws, 2016），首先提及的是如何透過清楚與一致的授權標準，讓使用者（消費者）能夠比較容易跨越疆界限制取得所需資料。而研究者，特別是在非商業用途的資訊上，科學研究所需的數據採集、教育、以及文化遺產機構，例如圖書館、博物館、或檔案、電影與影像資料庫等等，也能支持這些文教機構，盡力保存文化遺產，摒除國界障礙，造福歐洲公民跨界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內容。

其次，因為網際網路已經變成散佈與使用有版權內容的主要交易場域，也是新型態商業模式的聚集處。因此，如何強化網際網路的角色，並保障版

權擁有者的權利與報酬，顯得遭遇許多困難。而這攸關創造力與創意產品的生產，極需一個新的版權架構，讓創作者獲得公平的報酬。同樣的困境也在平面出版品上，網路的傳播使得報章雜誌等平面印刷品被嚴重侵權，其他還有作者、表演者等等，如何在網路傳播的今天，加強其與社群網路平台業者的交涉籌碼，獲取公平報酬。這些都需要透過法律規定，讓交易、散佈與使用的資訊更透明化。計畫書中設計了更透明的測量準則，以及影響評估，期望版權擁有者與網路業者之間有比較平衡的契約關係。

根據歐盟條約 114 條，歐盟有權擬定測量的標準，以健全歐盟市場的內部運作。除了保障非商業用途資訊可以跨界近用外，最重要的是隨選視訊網路平台，不能再剝削創作者的心血，有更透明的歐洲市場授權機制，保障版權擁有者，並有管道與依循標準，解決爭議。不過，所謂的測量與影響評估也引發不同爭議，尤其在賦予平面印刷出版品專屬權利 (exclusive right)，與網路業者的授權談判上，會讓人立刻聯想起西班牙新聞業者的案例 (Rushe, 2014, December 11)，因為西班牙政府在 2014 年十月通過新的版權法，要求谷歌付版權費給新聞業者，即便只是新聞標題或摘要的連結，以至於谷歌乾脆關閉西班牙新聞網站，以示抗議，此舉反而使得西班牙新聞無法在國際間流通，損失更大。而且，新聞資訊的自由流通，關係到民主社會的發展，有學者也質疑，平面新聞業者的獨享專屬權利，將會阻礙資訊傳播，影響人民知的權利。最重要的是，數位媒體的發展取代平面印刷媒體，已經成為趨勢，時勢所趨，罪不在社群網路平台。換言之，平面媒體的收益與廣告大減，與國際網路業者關係不大，而是科技發展與社會變化使然。

因此，有學者們在 2017 年 2 月共同發表公開信 (CREATE, 2017)，認為版權法的改革中，這些規則與方針大多是普遍認知的標準常識，但其中卻有兩處明顯錯誤，一是第 11 條文，賦予平面印刷媒體專屬權利，意即唯有印刷媒體獨享能夠與網路平台談判的專屬權利而非作者，因為平面媒體已經有獨享的專屬權利，取得作者作品，若還賦予其談判的專屬權利，對作者不公。學者們認為這全是業者的強力遊說的後果，但卻無關創作者或寫作者的利益，甚至反而阻礙了作者與網路業者的談判權利。二是第 13 條文，要求提供使用者生產內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的網路平台，對使用者上傳涉及侵權的內容，也要負起法律責任，不再只是被動地收到通知後下架而已。學界質疑，此舉間接修改了歐盟法在電子商務上的原則與指令 (E-Commerce Directive)，將阻礙使用者在數位網路平台上的創新與創造力，此舉也是在強迫網路業者必須先取得版權擁有者的授權。同時，此舉也引發了一波公民抗爭，「拯救你的網路」(save your internet, 2018) 發起的抗議運動，拒絕網路平台變成審查機器，要求刪除第 13 條文。

另外，2017 年也有學者們的公開信特別針對第 13 條文提出他們的關切 (Stalla Bourdillon, Rosati, Turk, Angelopoulos, Kuczerawy, Peguera, & Husovec, 2017)，認為對於網路平台的使用者使用或上傳版權擁有者的作品，應該訂出更明確的比率與界限，而社群網路平台業者也應該提供足夠且透明的資訊給版權擁有者，對其版權被使用時，網路平台的測量是如何運作

與調配；若是有爭議產生時，網路平台應設有處理抱怨與補救的機制，以補償使用者的損失；而數位網路平台與版權擁有者應該透過資金管理的對話，像是訂定適當且比率明確的內容識別科技，亦有助於科技的發展與運用。

事實上，對於關切版權法修訂的遊說團體來說，眼前最在乎的就是要谷歌（Google and Youtube）與臉書吐出巨大的利潤，分給內容提供者，要求公平與合理的報酬。不過，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計畫的討論與修訂，因為歐盟裡的三個組織，議會、委員會以及理事會之間的複雜結構，使得決策與討論過程變得很複雜，也不夠透明化。歐洲議會於 2018 年九月通過支持藝術家與新聞記者必須獲得其應有報酬的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版權指令修正案時，德國的歐洲議會保守派議員莫斯（Axel Voss）就直言，「當美國龐大的社群網路平台賺翻天之際，我們的創意工作者卻正在餓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化他們的權利，促使社群網路平台負起責任。」但是，這樣的聲明也引起不同的爭議，第二次學者們的聯合公開信中（CREATe, 2018），指責版權指令正在退步，學者們再度針對第 3、11、13 條文提出關切，並表示由於版權指令計畫書受到大量相關利益團體遊說的影響，而且都是閉門協商，資訊完全不透明，這將會危及小規模的創意公司、獨立的創意工作者以及消費者的權利與利益。因此，他們呼籲應該透明化立法過程，讓社會大眾也能參與討論與意見回饋。公開信提出中提出三點批評：第 3 條文，文本與資料採集（text-data mining）的例外規定，只限於某些機構，將不利於刺激創新與研究；第 11 條文，新的出版權利，只利於出版商，無益於創新的品質新聞；而第 13 條文將使得使用者參與網路創作的利益受到嚴重影響。

最後，在版權改革方針中，主要包含三個角色，業界（industry）、社運團體（activist groups）與使用者（users），其中使用者應該被視為使用網路最重要的參與者，但是前兩者有很大的發聲量與遊說能力，使用者反而在這過程中被忽略了（Klein, Moss, & Edwards, 2017）。版權政策與公共利益有極大的關係，但一般大眾卻在改革過程中沒有任何參與感。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在修法討論過程中，沒有參與討論的機會，而遊說團體又過度集中焦點在社群網路平台業者谷歌的利潤與報酬上，以至於公平報酬與利潤分配成了最重要的角力，而使用者反而對版權改革將如何影響其日常生活的網路使用一無所知。

使用者在版權法的研究與討論過程中，被劃定在什麼樣的位置呢？使用者是法規與政策改革的核心，是產業急欲吸引的目標，也是創意作品的評判與擁護者（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p. 84-101），使用者的一切行為都會涉及到版權法，在歷年的使用者研究中，使用者的身份分別有：一般社會大眾、盜版者、夥伴與合法的消費者以及業餘創作者。最早關於版權法規的辯論，公共利益或公眾興趣一直是焦點，如果攸關公共利益，就不應受版權法規範，應該有例外，或者是應該讓大眾更易接觸或獲得這些作品；而盜版、剽竊或侵權，也一再地出現在版權法討論中，過去一直將侵權視為竊盜，是犯罪行為，但是使用者的侵權，與犯罪的竊盜是不同的，特別是網路上點對點（P2P, peer-to-peer）的分享行為。更何況盜版的行為，如今更被抗

爭團體－例如 The Priate Bay－轉化成是一種很酷的反抗者行為；至於把使用者視為消費者的研究，旨在想辦法教育大眾應該怎麼使用合法版權的作品，不要挑釁法律，也不要質疑創作作品與報酬之間的關係；而後，因為數位時代與社群網路平台的興起，讓使用者有更大的機會參與創作，過去無論是盜版者還是合法消費者，全都可能變成業餘創作者。但無論使用者的地位與見解如何分歧，使用者對於什麼是合法使用，什麼是侵權，並不清楚，例如，英國的傳播管理局(Ofcom)曾在2012年對網路上的侵權行為進行研究(Klein, Moss, & Edwards, 2016, p. 92)，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十二歲以上網路使用者，對於版權法的規定完全不知道，對於什麼是非法網路平台，也不清楚，用久了甚至覺得是合法的，因為合法與非法，看起來差異不大。

歸究其原因，一是使用者的困惑，也許是版權法規也令人困惑，因為版權法規的內容與條文，如果沒有一定的知識基礎，根本看不懂。另一原因是在版權的討論與爭辯的歷史中，使用者很少參與，通常使用者會被直接連結到消費者跟犯罪行為，或者是創意產業的財務收入受損等等此類爭辯中，版權法很少被當作政治或公共利益討論的議題，也很少在報紙或大眾媒體中做政策辯論。因此，該如何讓使用者每天日常在網路上的行為，與版權法之間不會有分裂，是下一步值得研究的目標。

## 參、結語

數位版權的改革並不會因為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版權指令的通過而塵埃落定，將來到了各會員國之後，仍將會有一番討論與角力。屆時，網路平台是否仍須監督與過濾上傳作品，變成審查機器，以及版權改革如何進入公共領域進行討論，讓使用者也有發表意見以及參與辯論的機會，讓法律規定與大眾日常的社會實踐能夠結合在一起，讓版權討論不只在於保護商業利益，不再強烈地把使用者侵犯版權作品當強盜罪犯，都有待觀察。

對台灣來說(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台灣十二歲以上的網路族高達一千七百多萬人，上網率達百分之八十二點三，這麼龐大的網路使用者，以及業餘創作者，台灣的著作權法與數位版權政策是否應有更多的公共討論與公眾參與，以利於網路的創作與資訊流通？另一方面，面對巨無霸網路平台與大型商業公司，夾在其中藝術家與業餘創作者，或者新聞記者，是否也同樣面臨被剝削的情形，該如何維護權利，保障其收入？該如何規範並要求社群網路平台的交易資訊透明化？甚至，對於跨國巨無霸網路平台上的廣告收入該如何課稅？課稅後的稅收如何運用？能否挹注於公共媒體平台協助新創人才培育與發展？都需要被關注、討論與進一步的調查。

## 參考資料

- 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107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取自 <https://www.ndc.gov.tw/cp.aspx?n=55c8164714dfd9e9>
- Aguilar, A. (2018). 'We want artists to be fully and fairly paid for their work' Discourses on Fairness in the neoliberal European copyright reform.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Law*, 9(2), p160-178.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jipitec.eu/issues/jipitec-9-2-2018/4731/JIPITEC\\_9\\_2\\_2018\\_160\\_Aguilar](https://www.jipitec.eu/issues/jipitec-9-2-2018/4731/JIPITEC_9_2_2018_160_Aguilar)
- Angelopoulos, C. (2016). *European intermediary liability in copyright: A tort-based analysis*. The Netherland: Wolters Kluwer.
- Cooke, C. (2016). Dissecting the digital dollar part two. UK: Music managers forum.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themmf.net/digitaldollar/>
- CREATe (2017). Copyright Reform: Open letter from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s.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create.ac.uk/policy-responses/eu-copyright-reform/>
- CREATe (2018). The Copyright Directive is failing.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create.ac.uk/wp-content/uploads/2018/04/OpenLetter\\_EU\\_Copyright\\_Research\\_Centres\\_26\\_04\\_2018.pdf](https://www.create.ac.uk/wp-content/uploads/2018/04/OpenLetter_EU_Copyright_Research_Centres_26_04_2018.pdf)
- EU Laws (2016).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proposal-directive-european-parliament-and-council-copyright-digital-single-market>
- EU Parliament News (2018). We want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reatives.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society/20180628STO06869/copyright-reform-we-want-to-protect-creatives-rights>
- Fair Internet for Performers (2016). Fair Internet for Performers Questions & Answers.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fair-internet.eu/wp-content/uploads/QA-2015-04-18-EN.pdf>
- Foster, N. (2016). *EU law*(5<sup>th</sup> Ed).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obal Music Report 2018 (2019) Global Music Report 2018 annual state of the

- industry.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ifpi.org/downloads/GMR2018.pdf>
- Klein, B., Moss, G., & Edwards, L. (2016). *Understanding copy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UK: SAGE.
- Klein, B., Moss, G., & Edwards, L. (2017). Living with copyright law: What is it, how does it work, how could it change?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create.ac.uk/publications/living-within-copyright-law-what-is-it-how-does-it-work-how-could-it-change-project-report/>
- Leistner M. (2017). Copyright law on the internet in need of reform: Hyperlinks, online platforms and aggregator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12(2), 136-149.
- Measuring Music 2017 Report (2017).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www.ukmusic.org/assets/general/Measuring\\_Music\\_2017\\_Final.pdf](https://www.ukmusic.org/assets/general/Measuring_Music_2017_Final.pdf)
- Oster, J. (2017).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la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she, D. (2014, December 11). Google News Spain to close in response to story links 'tax'. *The Guardian*.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dec/11/google-news-spain-to-close-in-response-to-tax-on-story-links>
- Scott, M., & Hirst, N. (2018, March 16). Google's Academic Links under Scrutiny. *The Guardian*.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oogle-campaign-for-accountability-lobbying-humboldt-ceps-astroturfing-oracle/>
- Save your internet (2018). the save your internet fight against Article 13 continues. Retrieved 2019, January 9, from <https://saveyourinternet.eu>
- Stalla Bourdillon, S., Rosati E., Turk, K., Angelopoulos, A., Kuczerawy, A., Peguera, M., & Husovec, M. (2017).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on copyright reform.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33(1), 3-13. [Viewed 9 Januar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7364916302394>
- Smartt, U. (2014). *Media & entertainment law* (2<sup>ed</sup>). New York, NY: Routledge.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U Copyright Reform for Digital Single Market**

Xiaowen Lee\*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ain arguments of copyright reform, commercial bias's and the debates from different groups.

Due to the growth of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the media and cultural sectors which were traditionally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s now face a big challenge in terms of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methods of production.

The Internet Intermediary combines tools for production, marketing, advertising, and delivery/distribution all under one platform. This type of model then takes the biggest percentage of the profit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market. This phenomena causes the problem of value gap. In order to redress this and protect the creators by providing a model for fair remuneration, the EU is reviewing the challenges facing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EU has started to pursue copyright reforms and aims to establish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that reflects the challenges facing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age thus protecting all stakeholder rights.

**Keywords:** copyright reform, fair remuneration,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Value Gap

---

\*Lee Xiaowen,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email: hsiaowentw@gmail.com

實踐「參與典範」：  
「全球傳播」學會年會的現場觀察

黃從嚴\*

本文引用格式

黃從嚴(2019)。〈實踐「參與典範」：「全球傳播」學會年會的現場觀察〉。  
《傳播、文化與政治》，10:89-102。

---

投稿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 作者黃從嚴系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e-mail:106463507@nccu.edu.tw

## 《摘要》

2019 年 5 月，全球傳播學會第 15 屆會議在希臘雅典舉辦。此文分享現場實錄與會後的粗淺體悟。同時，輔以全球傳播學會之相關歷史資料，希望能夠較為全面且客觀地向讀者呈現全球傳播學會及其年會的形貌。

本文認為，在日趨複雜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下，全球傳播學會及其年會努力打造東西方學界雙向交流、共商傳播與未來的平台，可以視為全球傳播學界去西方中心化和實踐「參與典範」的案例。在全球傳播的討論框架之下，與會者探討的是所有人面對的共同問題，而非某一區域的個別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考慮到全球現有的秩序與態勢，並加強全球的交流與合作。

文章還從「全球傳播」的知識旨趣出發，指出年會猶有改進的必要，並提出個人對於未來年會的一點期許。

**關鍵詞：**全球傳播學會、知識旨趣、參與典範、現場實錄

今（2019）年5月，全球傳播學會（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GCA）第15屆會議在希臘雅典舉辦，筆者前往發表論文。

臨行之前，台灣社會有關於掠奪性期刊與研討會之議論甚囂塵上，我所在的學院，也有師長對此十分關切，提醒學生充分了解「全球傳播學會」之訊息，避免誤蹈陷阱。這一段小插曲，多少說明了全球傳播學會在台灣聲名不顯。

起初，我對於此次會議也並未抱有太多期待。及至會議開幕，臨場觀感取代耳聞和想像，卻從中收穫頗多驚喜。簡言之，我以為本次會議有相當品質，體現在會議立意、議程設置、與會者之構成與現場氛圍等諸多方面，可稱之為「小規模而大格局」的精品會議。尤為重要的是，在日趨複雜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下，GCA及其年會努力打造東西方學界雙向交流、共商傳播與未來的平台，可以視為全球傳播學界去西方中心化和實踐「參與典範」的案列。

因此，聊以本文分享現場實錄與會後的粗淺體悟。同時，輔以全球傳播學會之相關歷史資料。這些資料的主要來源，一是學會創辦者Yahya R. Kamalipour教授向筆者所作的口述與郵件回覆，二是從官方網站和公開出版物。藉此，希望能夠較為全面且客觀地向讀者呈現全球傳播學會及其年會的形貌。

## 壹、淵流

全球傳播學會設址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創辦者及現任主席Yahya R. Kamalipour曾在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任教多年，現在是北卡羅來納州立農業技術大學（North Carolina Agricultural And Technical State University）新聞與大眾傳播系的教授。或許與其生於伊朗的生命經歷有關，Kamalipour很早就進入了「全球傳播」（glob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領域，專注探討在美國主導的世界傳媒格局下，中東地區的傳播狀況（Kamalipour, 1995, 1999；Kamalipour & Mowlana, 1994）。

據Kamalipour自述，全球傳播學會的創辦實為「滾雪球」之過程。他在多年前就懷有促進「全球傳播」學門發展的初心，希望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學術共同體之間的聯繫。1999年起，他開始集結該領域的部分知名學者，合作編寫教材*Global Communication*（Kamalipour, 2001）。然而，合作著書畢竟是一時之事，參與人群也有限，難以成為學術共同體之間長期交流的平台。於是，Kamalipour轉而發起*Global Media Journal*這一開源期刊，希望以此連結各國同道，搭建更為綿密和穩定的學術網路。該刊在全球多個區域以不同語言發行，計有美國版、阿拉伯版、加拿大版、中文版、德語版、印度版、馬拉西亞版、墨西哥版、波斯語版、俄語版、土耳其語版，以及澳洲版等諸種版本，各版本創刊宗旨一樣，只是各有自己的編委會，所刊內容並不相同。有了以上基礎，Kamalipour想更進一步，又萌生自創學會之志。

不難看出，全球傳播學會從一開始即有相當清晰的定位：植根於「全球傳播」這一傳播學的分支領域，並為其發展提供助益。全球傳播學會，實為「全球傳播」之學會（*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而非全球之「傳播學會」（*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Kamalipour 及其同事在 *Communicating through the Universe* 一書的前言曾提及全球傳播學會的一些目標，首要的兩個目標就是「滋養和提升全球傳播學之學術研究，以及促進世界上主要大學間的學術合作」（Greidina & Kamalipour, 2017, p. viii）。

那麼，這裡的「全球傳播」究竟是怎樣一種研究取徑？Kamalipour 曾向我介紹 *Global Communication* 與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的分別（黃從嚴，2019），或許有助理解，茲轉譯如下：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仍然強調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間的物理界限，而 *Global Communication* 則主張數位符碼往往可以輕鬆超越疆界，或是使其不那麼顯眼。

這反映出是建築於資訊全球化的現實經驗之上，「全球傳播」的問題乃是全球化問題的組成部分。因而，它不只關切單一民族國家的對外傳播狀況，或民族國家之間（inter-national）的交流關係，而是作為整體的「全球」（global）的傳播問題。「全球傳播」的討論，必然是將傳播放置在全球化的架構之下——「在人類歷史的這一特殊時刻，地區動亂、政治衝突和民族緊張關係威脅著的不僅是許多國家的，而且是全世界的統一」（Kamalipour, 2007 / 尹宏毅譯，2008，頁 xi）。

這樣，「全球傳播」實際上擁有「行動的」知識旨趣，知識生產是為了「導致行動和積極的變化——和平共處、相互尊重、減少衝突、增強對文化的敏感性，以及世界各民族與人民之間更好的合作」（Kamalipour, 2007 / 尹宏毅譯，2008，頁 xi）。繼承以上學術基因，學會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公正合理的全球傳播秩序，並關懷各地弱勢族群的傳播權益。從學術議題來看，重點是探討「由於全球化，人類的境況是否得到了改善？」，「受眾對於全球性問題是否了解更多了，並受到更好的教育？」，「傳媒責任心更強還是更弱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傳媒和傳播未來發展的前景如何？」（Kamalipour, 2007 / 尹宏毅譯，2008，頁 viii），等等。

上述追求，也體現在全球傳播學會年會這一學術實踐當中。不妨先來瀏覽 GCA 歷屆年會之主題。我們也附上國際傳播學會（ICA）年會，以資對照：

表一：GCA 與 ICA 年會主題

年份	ICA 年會主題	GCA 年會主題
2008	為社會影響而交流 Communicating for Social Impact	中東的全球化與媒體 Globalization and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2009	傳播中的關鍵詞 Keywords in Communication	全球村：我們已在其中？ Global Village – Are We There Yet?
2010	傳播之事 Matters of Communication	資訊時代的全球化，文化與教育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011	傳播@中心 Communication @ the Center	全球權力的轉換：對於經濟，政治，文化和媒體的影響 Global Power Shifts: Impact on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Media
2012	傳播與共同體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環境，科學新聞，媒體與政治 Environment, Science Journalism, Media, and Politics
2013	挑戰傳播研究 Challen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傳播星系：發現，邊界與機遇 The Communication Galaxy: Discoveries, Boundaries, and Opportunities
2014	傳播與美好生活 Communication and the Good Life	寰宇傳播 Communicating Through the Universe
2015	跨越生命的傳播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數位轉型：媒體管理，數位教育，媒體匯流與全球化/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Media Management, Digital Education, Media Convergence, and Globalization/ 破壁：創造新的傳播地平線 Breaking Barriers: Creating new communication horizons
2016	有力的傳播	瞭望者：媒體與社會責任

	Communicating with Power	Ombudsman - Media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7	介入：傳播研究與實踐 Interven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改變全球話語與紛爭：教育，傳播，媒體與社會責任 Changing Global Discourse and Discord: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8	眾聲 Voices	數位入界：網際傳播及超越 Digital Inbou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 Beyond/ 全球化世界中的多元主義，媒體，政治與移民 Populism, Media, Politics, and Im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2019	跨界傳播 Communication Beyond Borders	數位時代的媒體，政治，移民與教育 Media, Politics,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大略可以看出，GCA 重點關注的對象有：全球交流的破壁（**Breaking Barriers**）問題，也就是各地區之間無拘礙之溝通；不同地域間平等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機會，尤其是邊緣區域以及弱勢群體之命運；以上進程中，媒介所應擔當的角色。事實上，ICA 也關注到交流破壁、媒介與權力等議題，甚至將其納入年會主題。不同之處在於，GCA 似乎是更有意識地將這些議題放置於全球傳播的框架中觀察，且更為著重地區間權力不對等之格局。此外，ICA 似乎比較關心廣義上的傳播在當今社會的角色，進而反思傳播學門在當今之發展狀況，因此其議題設置體現學理研究的導向；而 GCA 則更專注於制度化的傳播，亦即媒體對於全球傳播之權責。但從會議主題來看，GCA 有著相對明顯的「解放的知識旨趣」以及為邊緣者培力（**Empowerment**）的企圖。

2007 年，年會於中國上海發軔。此後，周轉於世界各地。值得注意的是，半數以上的舉辦地點位於全球傳播格局當中較為邊緣的地區。下有筆者自製的簡表，載有近年全球傳播學會年會與國際傳播學會（ICA）年會的東道主：

表二：近年 ICA 與 GCA 年會舉辦地

年份	ICA	GCA
2007	美國·舊金山	中國·上海
2008	加拿大·蒙特婁	阿曼·馬斯喀特 (Muscat)
2009	美國·芝加哥	印度·邦加羅爾
2010	新加坡	波蘭·克拉科夫 (Krakow)
2011	美國·波士頓	馬來西亞·吉隆坡
2012	美國·菲尼克斯	贊比亞·卡索瑪 (Kasoma)
2013	英國·倫敦	加拿大·渥太華
2014	美國·西雅圖	俄羅斯·皮亞季戈爾斯克 (Pyatigorsk)
2015	波多黎各·聖胡安	德國·柏林/印度·邦加羅爾
2016	日本·福岡	印度·邁索爾縣 (Mysuru)
2017	美國·聖地亞哥	美國·格林斯堡
2018	捷克·布拉格	印度·齊浦爾 (Jaipur) / 西班牙·馬德里
2019	美國·華盛頓	希臘·雅典
2020	澳大利亞·黃金海岸	南非·德爾班
2021	美國·丹佛	中國·重慶

不難發現，就舉辦地點而言，全球傳播學會遠比國際傳播學會更為「全球化」。國際傳播學會年會常年安身於富庶地區之都會，而全球傳播學會年會則更親近於所謂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即「第三世界與邊緣，歐洲與北美以外的大多數（雖非全部）是低收入以及政治和文化上邊緣化之地帶」(Dados, & Connell, 2012, pp. 12-13)。筆者以為，會議選址並非無關痛癢，而是交流姿態的一種展示，同時也是向與會者提供導向。就全球傳播學會之宗旨而言，鼓勵各國學者至「全球南方」親身觀察與體驗，自然更加符應學會應有的精神氣質。

在這一節末尾，簡要談談全球傳播學會與中文學界的淵源。全球傳播學會及其年會在對岸的能見度稍高。北京清華大學研究生院（2018）將 GCA 年會列為新聞傳播學領域的 A 類國際學術會議，在 ICA、IAMCR 和 AEJMC 等會議之後。不過，這更像是一家主張，恐怕並非學界共識。從學術期刊來看，《今傳媒》曾刊載過一篇推介文章（陳輝興，2007）。

前面有提及，學會的首次年會是在中國上海舉辦。Kamalipour 曾大力發展全球傳播之學術網絡，此次會議能在中國舉辦，部分上是由於該網絡在中國的觸角發揮了作用。當時，Kamalipour 與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已是故

交，在後者的引介之下，Kamalipour 又與時任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副院長的戴元光教授結識。戴有意延請 GCA 到中國舉辦首次年會，並大力促成此事（黃從巖，2019）。這正是年會之所以誕生於上海的機緣。

該次會議規格不低，計有 13 個國家和地區的 60 多位學者參加。Douglas Kellner、Nick Couldry 和 Debra B Bergoffen 等知名國際學者位列其中，大陸傳播學界的陳衛星、戴元光、段京肅、丁伯銓、黃昇民、羅以澄、邵培仁、史安斌等人亦有發表。此外，台灣學界也有三位學者參與，分別是中正大學的羅世宏，政治大學的彭芸和中山大學的李雅靖。年會上之論文，已經結集出版（戴元光等，2010）。遺憾的是，GCA 年會移師他處之後，中國的學術期刊或一般報章上的相關討論幾乎不見。「雁過無聲」，個中緣由值得一番追索，只是本文不再詳談。

## 貳、現場

本屆年會主題為「數位時代的媒體、政治、移民與教育」(Media, Politics,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設有 9 個討論組別。依照主旨，這 9 組可以粗略分為如下三類：

一是媒體與政治。此為大端，討論範疇自國際間之政治格局（Panel1 之「國際組織與新秩序」），到媒體與國家層面之政治操作（Panel3 之「族群與國族的媒體形象」，Panel5 之「媒體與移民和難民」，Panel8 之「大選，政治與政客」），再到更微觀之層面，即媒體與身份政治（Panel4 之「媒體，女性與種族主義」，Panel6 之「記憶與運動」）；二是媒體與文化，如 Panel2 之「媒體政策與流行文化」以及 Panel7 之「跨文化遭逢」；三是媒體之社會責任與職業倫理，主要是 Panel2 聚焦的新聞專業主義的議題。具體到各個研究，彼此之界線遠非分明，在研究旨趣之上，更多的是交相呼應的「家族相似」。

整體來看，以上議題蘊含如下導向：既具全球視野，又能突出在地聲音。所謂「全球視野」，包含互為表裡的兩個層面：一方面是關於全球普遍問題以及普世價值的基本關懷。Cees Hamelink（1995）曾指出，世界傳播的組織和流程，有一權力剝奪效應（a disempowering effect）。「媒體與移民和難民」這組議題，正與之呼應。Georgia-Zozeta Miliopoulou 發現，當大量難民在 2015 年進入希臘時，英國新聞界將此事件定義為「希臘陷入國家危機」，並將其從希臘局部的問題上升為整個歐洲的問題，由此，媒體引導公眾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而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待難民危機。

「全球視野」的另一方面，是在實際的研究研究進程中，有意識地將研究對象放置於全球的脈絡中考察，因而格外注全球格局的現況與趨勢。由荷蘭學者 Cees Hamelink 所作的主旨演講〈全球傳播與全球和平：危如累卵的平衡！〉(Global Communication & Global Peace: A Shaky Balance!)，正為本次會議定下這樣的基調。此次演講是他對於「我們需要怎樣的全球傳播」這一重要問題的思考。Hamelink 認為，當前社會面臨多種「極端化區隔」

(polarized segmentation)，諸如不同性別與不同宗教信仰，乃至人與自然。這些「極端化區隔」對人類整體的存續造成挑戰，因而需要人們共同面對。然而，這種「共同」(togetherness)不能是小團體、小群體之排他性的「共同」，而是盡可能囊括全體人類之「共同」。傳播之重要性正在於此，傳播學界之使命亦在於此，即追尋以真誠(authenticity)、雙向與合作(mutuality and cooperation)、耐心(patience)和交流自由(communicative freedom)為特徵的深度對話。

普渡大學的 Lee Artz 提出一個有廣闊視野的觀察：談論「媒介帝國主義」的全球語境或許有變。在傳媒產業資本結構當中，美國不再一家獨大，甚至於國家已經不是區分傳媒資本歸屬的有效尺度。全球湧現出了大量的跨國媒體組織(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它們在資本組合和人員構成上都是跨國混合的。這些傳媒組織不再代表某一國家的利益，而是代表著跨國公司這一階層的利益。體現在下游的內容產制上：一方面，跨國媒體內容的生產者要更多地考慮在地觀眾的情感與態度；另一方面，跨國媒體的內容致力於營造全球性的消費文化。此間，既有的社會和文化規範得到鞏固——這對跨國資本主義有利。

此外，發表人也強調在地經驗，即採用「內在觀看」的理路，更加注重「邊緣地區或邊緣群體如何看」，而不只是討論「中心如何看待邊緣」。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將研究對象「他者化」的趨向。Andrea Haeuptli 和 Tahereh Ebrahimifar 分別介紹了西方部分國家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形象。特別是 Andrea Haeuptli 的研究，重點考察阿拉伯世界的小語種(英語以外的其他歐洲語言)報刊，研究它們如何看待歐洲的非英語國家。這一選題就足以提醒我們，全球傳播在以英文為中介的路徑之外，本就還有多樣的可能，所謂的「中心」之外尚有千絲萬縷的其他連結。

同樣地，Habibullah 的研究圍繞「一帶一路」的議題，在中國學界試圖打造的主流學術話語體系之外，提供一種更貼近「在地人」的視角，也就是進入沿線的穆斯林世界，探看這些區域當中的媒體如何呈現「一帶一路」。不過，Habibullah 沒有關注更為草根的底層觀點，這是他的未盡之處。

再如，Mausumi Bhattacharyya 在印度偏鄉 Birbhum 做了民族志，會上她為聽眾呈現當地女性的手機使用經驗。她關心的是手機對於當地社會生活的介入，能否為女性帶來社會和經濟上的培力(social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如同 Lee Artz 所言，全球傳媒產業的格局，正在經歷某種程度的變動，但傳播學領域(乃至全體的社會科學)權力分佈的樣態，似乎要穩固不少。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傳播學會年會激發以上「在地聲音」的努力值得重視。從年會上的討論來看，這裡的「在地聲音」，不惟體現在「東方與西方」或「南方與北方」這樣的學術的地緣政治學上，還包括了其他種種「去中心化」(諸如性別意義上的，種族意義上的，宗教意義上的，等等)的學術嘗試。

## 參、氛圍

會議的與會者，幾乎都是發表人或評論人。雖在學校圖書館這一公共區域進行，但也只接受註冊者旁聽。主辦方接收的文章數量不多，共 33 篇，亦只設置一個會場。會場規模可謂精簡。據 Kamalipour 介紹，2009 年在印度班加羅爾的那次年會，發表人數曾超過 600。之後，主辦方有意控制參與人數，他們認為小規模之年會更能實現參與者之間充分的交流，進而強化學術社群之連結。

就筆者感受到的會場氛圍而言，確如主辦方所言。學會主席 Kamalipour 親切溫和，年會行將開幕前，他站在會場門口，歡迎每位與會者入場。看到我這樣第一次參會的「新面孔」，Kamalipour 更是專門找出時間致以問候。他看了下我參會證上的姓名，即能清楚說出我來自何處，令我感到幾分訝異。他在開幕致辭中說，今年參會者中的學生較往年為多，這正是他樂於見到的事情。

大部分發表人，包括前述 Hamelink、Kamalipour、Lee Artz 等人，無論自己何時發表，都能全程參與，而不是「事了拂塵去」。講台上下，多是專注於全球傳播領域或政治經濟學之取向的同道，可以在相同層面進行高效而深入的互動。另外，參與者相對固定且人數不多，因此在有限的時間裡，彼此之間有更好的結識於討論的機緣。德國艾爾富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rfurt) 的 Kai Hafez 教授，形容這次會議是「溫暖的家庭會議」，而非各取所需的「超級市場」。GCA 沒有舉辦所謂「盛會」的執念，這使得年會反而像是短期的班級課程，學員之間能夠真誠互助、共同提高。

上述觀感，尤其體現於 Lee Artz 教授與筆者的交流之中。在我發表以後，Lee Artz 教授隨即過來與我討論，言談間有許多鼓勵。他的鼓勵並不是一些空泛的形容詞，而是誠懇地從他自己的知識圖譜出發，講明在他的理解當中，筆者的研究有何特殊意義。待到午餐時分，又找到筆者，因為他想起 Dan Schiller 有一篇文章有參考價值，想要推薦。Lee Artz 的熱忱教人感佩，他幾乎是將他人的研究當作自己的研究，格外珍視。其時我尚不知 Lee Artz 何許人也。於是，回去補做功課。這才知道，他在大眾傳媒研究領域是有相當名望的前輩，著述頗豐。《馬克思歸來》一書中即有一篇 Lee Artz 的文章 (Arzt, 2015 / 馮建三譯, 2016, 頁 754-786)，是出自馮建三教授的譯筆。這事說來，不免汗顏，倒不是因為自己「不識泰山」，而是深感所在領域的書讀得太少。

Cees Hamelink 的演講也使得「家庭會議」般的氛圍又濃厚了些。Hamelink 雖然已是年屆八十的老先生，但是富有神采與能量。他不用講台，亦不帶講稿，徑直走到聽眾之中，猶如老友來訪。於是，講者與聽者之間的距離頓然拉近。講者話端一起，則是雄辯滔滔，兼之語調深沉頓挫，聽者不由振奮。Hamelink 講到傳播與全球和平的問題，會上即有一事，使他的演說顯得尤其「應景」——年會召開之際，美國與伊朗關係正在趨向緊張。受此影響，來自伊朗的三位發表者在辦理簽證時遇上麻煩，險些無法參會。他們登台發表時，聽眾也送去更多掌聲。

## 肆、結語：至與未至

當代傳播學需要何種知識典範，從而改善人們的整體傳播乃至生活處境？在《全球化、社會發展與大眾媒體》當中，Colin Sparks 介紹了一種所謂的「參與典範」，或許是可能的出路。該典範的立基在於：「由於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社會對發展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一個具體的發展項目期待達到的目標，就應當由具體社會裡的當事人來決定，而不應當由遙不可及的所謂精英或者專家來掌控」（Sparks, 2007／劉舸、常怡譯，2009，頁 62）。在考量傳播對於將來社會的重要意義時，Cees Hamelink 的演說著重於「如何傳播」，而「參與典範」則回答「誰來傳播」的問題，兩個問題同樣重要。

秉承「參與典範」之精神，在知識生產場域，尤其是國際會議及國際期刊之類的學術交流平台上，學界本身似乎應當有些表率性的嘗試。近年來，無論台灣學界自發的「從東看、往南走」之呼籲，還是大陸學界對於「以中國為方法」理念之響應，均可以看成是實踐上述典範的某種自覺（陳儒修、楊淑閔，2010；趙月枝，2010；管中祥，2010；邱林川，2010；戴瑜慧，2010；《學術活動綜述》，2018）。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典範」的精神內核絕非是本土學術與西方學術爭短長、較高下的零和遊戲，而是建立在 Cees Hamelink 所謂的「真誠、雙向與合作、耐心和交流自由」等基礎上的「深度對話」，最終目的仍然是要共同商議和實施既包納普同關懷、又不排除在地特色的解決方案。因而，「參與典範」必然不能是「在地」的獨角戲，即令是「向東走、往南看」，也應當由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共同參與。正是這樣，我們需要關注西方學界與此相關的動向。

全球傳播學會舉辦的年會，即是西方學界積極融入「參與典範」一種嘗試。從歷屆年會的舉辦地點、參與者構成與年會議題來看，主辦方有意於通過，創造多元參與的空間。或者說，「給予不同的知識體系參與就如何建設另一個可能世界」所進行的認識論論爭的「均等機會，並使它們各自為建設一個更民主、更公正的社會以及社會和自然之間更平衡的關係作出最大化的貢獻」（趙月枝，2013）。在 GCA 的年會及相關出版物上，不惟傳播格局中邊緣區域的經驗得到展示，來自這些區域的學者也獲得更多發聲機會。值得指出的是，在全球傳播的討論框架之下，與會者從中聽到的是所有人面對的共同問題，而非某一區域的個別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考慮到全球現有的秩序與態勢，並加強全球的交流與合作。這樣，邊遠地區的經驗是以「普通問題」的框架得到理解，而非滿足西方學界一己之需的奇觀或是「他者」。

然而，就全球傳播最終的知識旨趣而言，促進全球學界的多元表達和相互理解並不足夠，更為重要的是針對構建更合理之全球傳播秩序，以及因應全球傳播中的各類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以本次年會上的論文來看，重點多是邊緣地區的經驗與弱勢族群的整體形象之呈現，卻較少從這些區域經驗中探求改善現狀的替代性方案。具體而言，個別區域是否存在與眾不同的媒介體制，其背後之歷史與社會根由何在？在媒介內容的產製上，是否曾發展出

有益公共福祉的另類舉措？對於以上提問，囿於問題意識和研究框架，年會論文中之相關回應可謂甚少。此外，在知識生產的意義上，我們也較少看到本土化的理論企圖，也就是通過行省化西方理論的方式，為傳播學提供本土見解。以上是筆者的一孔之見，但我確實期待 GCA 的平台上能夠出現更多類似討論，從而在多元參與的基礎之上催生更多成果。

## 參考書目

- 〈學術活動綜述：作為問題和方法的中國傳播研究學術懇談會〉(2018)。取自 [http://www.sohu.com/a/279205539\\_659782](http://www.sohu.com/a/279205539_659782)
- 尹宏毅譯(2008)。《全球傳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 Kamalipour, Y. R. (Ed.). [2007]. *Global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邱林川(2010)。〈南方的想像：階級、網絡與傳播〉，《中華傳播學刊》，18：51-69。
- 清華大學研究生院(2018)。《清華大學各院系(學科)重要國際學術會議目錄》。北京：清華大學研究生院。
- 陳輝興(2007)。〈全球傳播學界的前沿對話——「全球傳播與發展國際學術論壇暨全球傳播學會大會」綜述〉，《今傳媒》，12：21-22。
- 陳儒修、楊淑閔(2010)。〈從東看，往南走—2010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成果報告〉。取自科技部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18b5f948-2023-4abb-bc6b-5b79733f92f2>
- 馮建三譯(2016)。〈21世紀社會主義：打造國家，推進革命〉，莫斯科(編)，《馬克思歸來》，頁754-786。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文 Artz, L. [2015]. *Media and Pow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ocialism in Venezuela*. In Fuchs, C., & Mosco, V. [Eds.]. *Marx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pp. 490-521]. Leiden, BS: Brill.)
- 黃從嚴，個人通訊【電子郵件】，2019年9月2日。
- 管中祥(2010)。〈知識在地方〉，《中華傳播學刊》，18：89-106。
- 趙月枝(2010)。〈「向東看，往南走」：開拓後危機時代傳播研究新視野〉，《中華傳播學刊》，18：3-30。
- 劉舸、常怡如譯(2009)。《全球化、社會發展與大眾媒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 Sparks, C. [2007].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Y: Sage.)
- 戴元光等(編)(2010)。《全球傳播前沿對話——全球傳播與發展國際學術論

- 壇文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戴瑜慧（2010）。〈以基進另類媒體建立批判的世界主義〉，《中華傳播學刊》，18：71-87。
- Dados, N., & Connell, R. (2012).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11(1), 12-13.
- Greidina, N. L., & Kamalipour, Y. R., (Eds.). (2017). *Communicating through the Universe*.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UK: Scholars Publishing .
- Hamelink, C. J. (1995). *World communication. Disempowerment & self-empowerment*. London, UK: Zed Books.
- Kamalipour, Y. R. (Ed.). (1995). *The US media and the Middle East: Image and perception* (No. 46).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Kamalipour, Y. R. (Ed.). (1999). *Images of the US around the world: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Kamalipour, Y. R. (Ed.). (2001). *Glob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SUNY Press.
- Kamalipour, Y. R., & Mowlana, H. (Eds.). (1994). *Mass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The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Paradig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Congyan Huang\*

### **ABSTRACT**

In May 2019, the 15th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was held in Athens, Greec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entative reflection on the con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upplemented by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hoping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provide the readers with a general pictur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its annual confere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under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its annual conference has been working on creating a two-way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scholars to discuss about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case of de-Westernization and participatory paradigm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discussi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conference talked about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all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problems in certain regions. And the solutions of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built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global order and situation, which calls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intellectual interes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 article also recognizes that the conference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Finally, the author shows some expectation towards the future of the conference.

**Keywords:**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participatory paradigm, intellectual interest

---

\* Huang Congyan is PhD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學術研討會之必要？ 藉科學社群與社會網路分析的再理解

張時健\*

### 本文引用格式

張時健（2019）。〈學術研討會之必要？藉科學社群與社會網路分析的再理解〉。《傳播、文化與政治》，10:103-119。

---

投稿日期：2019 年 9 月 11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張時健為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系助理教授，e-mail: chang17tw@gmail.com。

## 《摘要》

為了知識的求取、應用與更新，研討會的意義何在？本文藉科學社群與社會網路分析的視角，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為案例，指認研討會體現了科學社群的結構與相應的知識系譜，而知識合法性寓居其中。社群成員遵循互動常模進行臨場對話，動態地確認一己與他人在知識系譜上的相對位置，從而可辨認知識社群的核心與邊陲構造。本文並寄希望於邊陲位置，以期推進知識典範的更新。

**關鍵詞：**知識合法性、社會網路分析、科學社群、傳播學門、學術研討會

## 壹、前言

為方便讀者的前理解，文前先交待作者（以下直稱「我」）的學思背景。在傳播領域養成的後期階段，我鑽研政治經濟學，混合早期學過的基礎金融管理知識，和中期偏愛的左翼哲學與批判理論，最終在學科版圖裡成為斜槓再斜槓的狀態。

本文旨在，將知識的斜槓狀態置於實存的學術社群中檢視其發展路徑，一方面藉以指出斜槓狀態的代價與機遇，再方面重述知識合法性植基於科學社群的常態。兩方面都本於社會網路分析的思考，也就是自社群成員的交往理解社群的核心與邊陲構造。本文以學術研討會為社群樣本，以作者從孤身的學思狀態轉至積極參與其中的親身經歷為案例，指出知識之有效不在已，在與社群成員的相互關係與互動間實現。文中提及人名地名，作為社會網路分析的過程（然而僅是粗疏地應用），體現社群的結構與在地理上的分佈。冀望藉之能與本文作者與讀者的位置，包括知識社群上的與地理空間上的，作對照式的理解。讀者對名字的熟悉與陌生，亦反應了一己與之的距離親疏近遠，同時體現了一己在科學社群結構的相對位置。然而本文尚未能提供完整的圖譜，並無法代讀者確認科學社群的結構。

以推進知識變革為目的，應用社會網路分析的視角，或對社群核心與邊陲構造相關的權力佈署與制度安排（即所謂「明星化」的現象），不能完全同意（Contandriopoulos, Duhoux, Larouche, & Perroux, 2016）。這個觀點取自 R. Burt（2004, 2007）的主張：社會網路中「結構洞」（structure hole）之所在，為創造之所在。所謂結構洞，意指在穩定社群之間的弱連帶處。反之，穩定居於社群中的核心位置，或攀附核心位置的嘗試，主要是複製本有的知識內容，鞏固既有的知識系譜，是「冗餘資訊」（redundant information）的增生。這個理解與 T. Kuhn 對科學社群與知識典範變革的探討，或有呼應（Leydesdorff, 2007）。然而相應的，行動者對既有科學社群結構的反思性理解，若導向一己的離群或割斷交往的連帶，有如作者的早期嘗試，或可能與批判的目的／初衷有違，即難以推進知識變革（Leydesdorff, 2007; Whittle & Spicer, 2008）。

## 貳、除了大拜拜以外

當我還是研究生的那些時日裡，關於學術研討會在同學間流傳著一個普遍說法：大拜拜。在台灣的語境裡它召喚的是關於慶典的記憶：拉著長輩的手在信眾間轉來轉去，滿天神佛半個不認識，穿過前殿後殿拿香跟著拜，一心期待的只是最後廟埕前有吃有玩的市集。對研討會的玩樂印象如此，與之對照的眼前現實是被書、文件和咖啡道具淹沒的研究室座位，永無止盡還不斷增生的讀本清單，一人獨行蹣跚的寫作進度，與同樣狀態的同學們相對無言。每次看到徵稿訊息時只要想到：層層疊疊、過期再過期的工作計畫還有待努力，羞澀的阮囊很難頂住長途旅行的耗費，而竟只為了三日五日與陌生同行的寒暄？加上自忖學術成就說到底緣於個人修為，最後就還是罷了。學生時期這樣對研討會的「大拜拜」偏見，大抵因為自己對知識份子孤高意象的崇拜，以及自以為閉門造車是知識份子養成的唯一途徑，所衍生的禁慾情結所致。於是在斗室裡埋首的歲月裡，滋生了矛盾的認知：思想的鍛鍊可以也必須與世俗斷開，在與所有人的交往趨近於零的狀態下，我當可以藉由飽覽群籍縱橫東西古今。典型如 J. Habermas 不就如此：作為人稱會行走的文哲百科全書，拙於口才又如何呢，還不是能贏得思想的桂冠。根據這樣的偏見，以「那不過是蒐集名片的場合」或是「攀附大師的社交活動」理解研討會，就能讓深居簡出的自己心安。

等到跌跌撞撞入行，以及陸續參加過幾次大型的研討會之後，我才知道原來研討會不是，或不只是原來以為的這麼一回事。行禮如儀的報告與討論之外，玩樂的活動是有的，確實同行們也常自嘲說不好玩就不來了，不過玩樂活動深化了與會者對主辦地的文化背景與知識社群的認識；蒐集名片是有的，確實鬧哄哄的會場中交淺不言深所以只好以名片互換讓談話草草結束，然而名片確實作為發展進一步知識交往的起點；攀附大師是有的，確實大師身邊經常簇擁著徒子徒孫與仰慕者，可是大師與開枝散葉的徒孫們形成的學術集群也具現了知識流傳與更新的過程。大拜拜的儀式是有的，確實每年會議開場的主題演講的形式堪比佈道或祈福法會，但信眾／聽眾們藉此領會了社群知識前沿的共同焦點與趨勢。

對剛入行的我而言，與這些求取新知的手段同樣重要的是，在這個大家競相發表最近研究成果的場合裡，和同行交換學術工作的心得，在互動的過程中摸索社群規範與社群結構，以社會網路的框架想像自己與他人的相對位置。也就是說，參加研討會的意義有兩個向度：一是單純探求知識本身，二是探求知識的社會基礎。

然而真的到了現場，眼界大開是很有趣但也磨人：在我閉門造車的幾年裡那個不斷增生的讀本清單所展現的知識系譜，和研討會現場知識社群構造展現的知識系譜，並不重合。在同樣主題的場次中，我以為的基礎概念與必讀經典，可以完全不被提及；相反的，同行們侃侃而談的理論，我也不見得都掌握了。或是自己私心嚮往的前輩，原來在社群中是邊緣人；而社群裡被推崇的導師（通常在籌辦研討會的學會裡位居要職）以及論資排輩的徒孫們，我竟然全不認識。同行的報告聽起來非常新鮮也很有啟發，但我常感到陌生。更慘的是，鑽研多年的研究主題，同僚們並不感興趣。這樣的落差一開始讓人感到震驚，為了調適只好以知識無分高下自我安慰，但與人們密集接觸的幾天裡話不投機，總是讓人氣餒。

弭平這個落差是重要的、必要的嗎？若置之不理，繼續我行我素，則又如何呢？

知識份子終歸是社會存有（social beings）之一，知識不可能抽離時空地發展。在困頓時，我面臨更嚴厲的質問是：不被知識社群接受的知識，仍是知識嗎？當然這個問題也可以反過來辯證地理解：被知識社群推崇的知識，就是知識嗎？對連滾帶爬入行的我，這個問題如此現實而且逼人，在講究實用的單位裡服務時更是，它會被用另一個形式提出：「你做研究幹麻？」，或「你做這個研究項目對系上的貢獻是什麼？」如果我參與的是流行的研究主題，或許能順理成章藉許多同行的大名來背書，也會有許多實務應用的路徑可依循；但說到底並不是，所以面對逼問通常只能張口結舌，或努力解釋後換得你只是自私地累積個人成就的評價，而這樣的評價是公允而且有效的。

鐵一般的現實日日迫近，然而何以我繼續在不現實的路上走？猶記在學習方法論的時候，懵懂的我讀到 T. Kuhn 的《科學革命的結構》（2012），以為知識份子的使命在推動科學變革的發生，而變革發生在常態典範的應用出

現疲態，於現象的解釋不力或測量不能之時。當心嚮往之，復又讀到 J. Habermas 與 K. Popper 就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是否合適於應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大辯論，知道原來批判的路徑意在直指典範的盲點。前後對照直叫人豁然開朗：原來批判是促成科學變革的特快車，只消戴上批判的眼鏡，翻查研究者養成的社會脈絡，堅信凡是文本（包括科學文本）都必然受意識形態指導，就可讓一切常態科學的應用研究都顯得可疑；既然可疑之處正是變革的起點，則直指研究的意識形態背景與意圖，是知識份子的重責。

把大師的心血作這種拼貼的、速食的再詮釋，一者在精神上褻瀆了原典，二者在學術實務上是自殺。在現實裡跌撞後，我經歷了存在主義式的轉向：純粹的（批判）理性不足恃，常態科學的更新，意識形態的運用、作用與反思，都活生生地在社群成員的互動中體現。單單是滿腹經綸但自外於學術社群，批判即難以著力，有如 Kuhn（2012, p. 163）的說法：

科學社群的成員將自己視為，也被同儕認為是，能自行追求共同目的的人，這個目的還包括培訓接班的梯隊。相對而言，在群體內的溝通是充份的，專業評判標準是彼此都同意的。另一方面，因為不同科學社群的關注各有不同，跨社群就專業溝通有時非常費力，通常導致誤會，或引起意外的強烈反對意見。

意思是，大部份的時候對整個學術社群而言，孤立的或外部的批判／挑戰經常是蒼白且無謂的。雖然這個現實本身就值得批判（Jameson, 1991），而我一度也偏執地信了。更本質的問題是，孤立的姿態既不能使批判者更清醒，也不會讓批判更準確有效。Habermas 主張正在應將技術理性的有效聲稱還原在研究者生活世界，或說是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之中才能再理解。既然一開始「技術的理性化（technical rationalization）無從自動發生的，即使個體掌握了必要的技術知識也不行」（Smith, 1984, p. 528），那麼對理性化的批判豈能自動有效呢？

簡言之，推進知識的變革是必要的也是崇高的，但前提是你作為知識社群的一份子才行。

## 參、知識圖譜上再定位

我輩的人行與活著之難，已經眾人皆知了。通俗理由一者是競爭者眾，二者少子化帶來高教規模的緊縮。這些外部前因由不得人，而無法學以致用之痛愈來愈切身，讓我不免自我懷疑所知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knowledge*）。為了解，而且大家都說是正辦，我把研究成果改寫成文章投稿給學術期刊。期刊的匿名評審當然是領域內的同行或資深前輩，接受刊登與否我都能拿到評論意見，順著修改就能摸索領域的樣態。

然而本來產量不豐的我幾次遇到最糟的結果：編委會斟酌了數週後不附審查意見，逕退原稿，並客氣地通知來稿不合期刊宗旨，其中包括以「傳播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此處為略稱，非刊名）這樣的泛稱為刊頭且自我標榜為跨學科園地的指標性刊物，總之讓我另投其他。然而我既然已在傳播學門內閉門拿到博士學位，再轉頭去敲其他社群的大門，為時已晚。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斜槓狀態很危險，可能瀕臨被整個傳播知識社群拒於門外的邊緣（實情是真的被推出社群之外了）。即使所謂「匯集各路學科的十字路口」是傳播學自認的傳統，編委會讓我另請高明的決定表示了傳播知識學界仍有它的核心關懷以及邊界，而我竟然不知其然，遑論其所以然。在知識的汪洋裡悠遊了幾年之後的我已經離岸太遠，茫然四顧，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這種時候再發憤努力也沒用的：一艘駛錯了方向的船，再快都不會到目的地，可預見的終局是力竭而衰。

當然我可以一試再試不同期刊，直到找到能讓我上岸的孤島，讓文章進入審查程序、修改發表而後開始耕耘。然而這個程序曠日費時，能繼續任性的時日也不多了。所以我找上了研討會，要盡快地重溫領域全貌，再定位自己，釐清目標與前行的方向。

從迷途的驚慌中冷靜下來，我開始思量自己文章中核心的概念，引述文獻的出處，歸納出領域內新進的指標研究者。和我在博士階段醉心研讀的經

典不同，這些應用經典的新進研究者或可作學習的榜樣。通過翻查這些研究者在任職機構網頁上的簡歷，我瞭解了他們近年學術活動的軌跡。拚湊之後，我的結論是「文化經濟學會」(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ACEI)辦的雙年會或可一試。同一時間，我將另篇論文投交「傳播與媒體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的年會。不意外的，我被前者接受而後者拒絕了，那是2014年年初。知道結果時五味雜陳，不過總算是個重新出發的契機。

2014年的文化經濟學會年會為期四天，於六月底在加拿大蒙特羅市的魁北克大學(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舉辦。我提報的是自己畢業論文的章節，談美國影視業的利潤率動態與前因。有幸的是，我在該文中多次引述的文獻的兩位作者 John Sedgwick 與 Michael Pokorny (Pokorny & Sedgwick, 2010)，與我同場報告，也談類似主題，然而我們結論相反：我以產業統計資料計算認為好萊塢的利潤率長期是轉壞的；而他們則藉好萊塢大片廠的財務報表指他們的業務蒸蒸日上。作為在這個領域長期耕耘且著作已豐的 Sedgwick 教授，對於我提出不同見解感到詫異，該場結束後拉著 Pokorny 找我問資料與計算方法怎麼得到。我據實答說是美國政府統計局與國稅局的產業調查報告，也說可能是文化經濟的極端不均衡分配狀況導致我們的結論有異。

我至今仍記得，在那個魁北克大學的小研討室裡，已屆中年的 J. Sedgwick 教授搓著下巴沈思的樣子，嘴裡念著沒理由電影製作業者願意在長期虧損的狀態下持續投入。而年紀更長的 M. Pokorny 可能認為這源自於我們在方法、後設視野以及研究旨趣上的落差，當下顯得不以為意。爭論的細節在此不表了，當下的我只覺得受寵若驚，一者本來沒有預期到會與前輩同場，二者沒有預期他們會對我的研究感到興趣。儘管我苦於使用陌生的語言與他們溝通，有許多複雜想法辭不達意，也要拼湊先前閱讀他們著作的印象辛苦地理解他們現場抽象的論點。但他們仍耐心的與後輩討論，讓我感到非常振奮，也很珍惜。有許多學習外，也知道自已並不孤單，特別在取得學位之後。不論對錯，這是知識的殿堂裡才有的真摯交流。

遇見領域內大師當然驚喜，其次是知道知識交流本身之可貴可求，對與會者而言當超過語言的藩籬。在出席前，我從網上得知文化經濟學學會是在上個世紀七〇年代初由美國經濟學學者發起，思及經濟學本來就作為帝國知識，而附隨的英語則成為帝國的官方語，我本以為流利地使用英語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交流門檻，有如我在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體會到的那樣。然而並不，在會場中我見到許多與會者來自非英語系的歐亞國家，大家操著南腔北調口音的英語愉快地談話，而法德義葡西俄語在會後同僚的交談中也很容易聽到。在一場談數位分享與文化多樣性的場次中，有位巴黎電信技術學院（Télécom ParisTech）的年輕博士生報告了音樂工業的發展策略，儘管她混用法語文法與腔調的英文口說不能算是標準，但藉圖文並茂的投影片，她仍沉穩有條理地介紹了她的研究成果。對現場的我們同行而言，她的報告之精彩不因不標準的英文口說而減損，在問答時間引起了熱烈討論。儘管問答最後有位來自美國的印度學者操著濃重腔調的提問，讓她難以意會而發窘，但之後我仍見到了他們坐在講堂一角懇切地談話，有如 J. Sedgwick 與我的談話那樣。從此我知道，熟練地使用英語有助溝通，但求取知識的熱情可以跨越國界、語言與種族的界線。另一方面，這也提醒了我世界之大，英語只作其一。2016 年在西班牙瓦拉多利大學（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舉辦的年會裡，西班牙文可能是講台下的主要語言，我在這年的年會見到西語世界的活力，感到有趣但非常陌生，特別是其影視業的發展不同於好萊塢中心的樣態，有自己特殊的中心與邊陲結構。我本以為好萊塢研究可作為理解國際傳播的跳板，像對拉美的理解主要通過 Oliver Boyd-Barrett（Boyd-Barrett, 2014; Boyd-Barrett & Thusu, 1992）的介紹，鑽研幾年後自覺略懂，但對照之下就知只是一隅之見。

同時，這也是文化經濟學學會有意跨出美國中心發展多樣視野，同時對經濟學的理解與應用出於文化關懷的反思，比如 2014 年的主題場次邀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美國經濟分析署以及加拿大文化部的代表同場討論文化經濟資料的搜集與應用的難題，這是前主席 D. Throsby 持續關注的問題。而與雙年會交叉隔年舉辦的區域學者工作坊，在東亞、拉美、北美與歐洲分別進行，主題刻意關注區域文化特色與發展。在 2017 年在日本

京都同志社大學舉辦的第四屆亞洲文化經濟學工作坊，時任學會主席的荷蘭學者 A. Klamer (2017) 與會與日、中、澳等地學者交流。會中討論京都與阿姆斯特丹共同面臨的觀光經濟難題令人印象深刻之外（與會學者分別參與了兩地的公共政策辯論），我也得以窺見日本文化經濟學的領域概況。除了自己的論文有幸得在東亞影視業研究活躍的河島伸子（Kawashima & Lee, 2018）指點，也結識了年輕的日本學者，知道他們長於政治經濟論述與歐美主流重視的計量程序有所不同，而且講究師徒關係的治學之道以及孜孜不倦的自律精神，很有特色。

## 肆、回轉而往復

作為經濟學的次學門，文化經濟學的社群規模不能算大，許多同行應是常年參加，在會場中經常可見那種朋友久違後見面時又親又抱的寒暄。我閉門造車的學問在 ACEI 的年會與工作坊裡找到社群歸宿，通過閱讀神遊，我與他們有一見如故之感，然而苦惱的是，我們的談話只能限於研究題材本身，在以外的學術日常或養成經驗上都難有交集。另一方面，我沒能在會場中遇到來自傳播科系的同行，總是隻身一人。儘管文化經濟學同樣關注文化多樣性與文化政策，旁及傳媒發展，與傳播研究多少重疊，我持續耕耘他日或有小成。但在會場中屢次旁觀又親又抱的同行們，我不禁自問：我在這裡的知識成果能被傳播社群接受，讓我餵養傳播科系的學生（教學），甚或以任職單位之名舉辦小型討論會，促進外地與本地知識社群的交流（服務）嗎？再進一步，通過我學習到這些知識的後進者，日後歸於何處？如是 Kuhn，或也這麼問。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我因故臨時缺席在澳洲墨爾本 RMIT 大學舉辦的 ACEI 年會，無緣在會場中見到 Terry Flew 談他對文創產業研究路徑的心得（和他同場的還有 Stuart Cunningham），而 T. Flew 是現任 ICA 主席，我後來幾次在 ICA 與 IAMCR 的年會會場見到他。或許因為 T. Flew 與 S. Cunningham 的研究涉及了文創經濟（Cunningham, Flew, & Swift, 2015），而澳洲政府大力

支持的文創產業與相應的本地知識圈涵蓋了傳媒產業研究，所以主辦的 RMIT 邀集了他們出席。

參與幾次文化經濟學學會活動的這些年，我入了行在新聞傳播學系工作，因教學需要必須經常回顧傳播領域知識的全貌，使新展開的研究方向緩步調整，面向自己所從出的領域。幾年的徘徊周折後，我回頭出席 IAMCR 與 ICA 舉辦的年度研討會報告研究成果。至目前而言，我在 IAMCR 與 ICA 能找到熟絡的朋友，但似乎在 ACEI 會上的發表才得到更多的迴響，這完全是因為我的斜槓狀態所致。但相對的，涉及知識領域核心的理論與哲學性辯論，我在前者有更多的領會，而在後者則因為所學的核心方法不同（我沒有計量經濟學的訓練）而難以真正涉入。

2017 年的 IAMCR 年會在哥倫比亞的卡塔赫那（Cartagena, Colombia）舉辦，我報告的是與系上同事合作的研究成果：藉報紙的文本分析以及閱聽人的焦點團體訪談，談香港的「港女」文化與厭女情結（mysogyny）。這篇論文的分組在「性別與傳播」（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GEN）下。性別研究並非我的本行，然而這一年來與同事在課餘共同工作的成果在會場得到意外熱烈的迴響。一方面可能是報告中的我脫口而出「我們女性」（we women...）引起的娛樂效果，再來關鍵的是和與會者共享類似的文化現象、研究取徑與主題。場次結束後一位巴西的年輕研究者興奮地與我分享了她們社會類似的現象：因厭女情結造出用來貶抑女性的新字被普遍地使用，讓我也長了新的見識。

然而我在熟練的領域報告得到 IAMCR 與 ICA 同僚的共鳴很少，前述藉不熟練的題材卻得到普遍正面評價，兩相對照讓人苦笑。2018 年我參加了捷克布拉格的 ICA 年會，在分組「全球傳播與社會變遷」（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中，藉壁報論文談近年華語影視業的區域分工。九十分鐘裡許多人經過，有兩位同行先後表示了興趣。一位是專攻政治傳播的瑞典教授，另一位是曾從事新聞工作的美國學者。他們共同關心的是中國溢出國界的政治影響力對地方傳媒生態的作用，雖不能說是無關，相談也有趣，然而畢竟未切中我的研究主旨。而當年我在傳媒產業研究關注組（Media Industry Studies Interest Group）的另場報告中，聽到同行談歐盟的跨國合製

治理架構與效果，與我的研究相近，因為太興奮在問答時間提了過份冗長的問題，然而並沒機會交換我的研究成果。儘管如此，我在她們的報告中得到有用材料，甚至會後得她們研究小組的指導教授來信賜教，我得以再發展新的研究主題，在 19 年於華盛頓特區舉辦的 ICA 年會傳媒產業研究小組報告。本來期待再遇到這些德國同行們，可惜沒有。我在 19 年的報告時間安排在上午，聽者寥寥，所幸與同場報告的發表者相談甚歡，而主持場次的 Bill Herman 教授事先悉心地閱讀了論文，在會上與會後都提供了我們許多有用評論。

我總是想，為何我報告的時候，聽眾寥寥且默默呢？在 ICA 年會上，與有些報告技巧經過機構行前特訓、水準堪比 TED 演講的同僚相比，我邊想邊講而斷斷續續的風格應作為直接的原因，又或因為我用的方法與問題意識偏離傳播學門太遠。然而個人緣由之外，我在不同場次間奔走後，大概明白了學門子社群的規模有大有小。像是近年方興未艾的傳播科技研究所屬的「傳播與科技組」(Comm & Tech Division)，場次之多而與會者之湧動，足見其在當前傳播學圈的份量。而我所從出的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相關主題拆散在前述的「傳媒產業研究」、「行動主義傳播與社會正義」、「全球傳播與社會變遷」、「傳播法律與政策」、「哲學、理論與批判」等規模有限的分組中。儘管在跑不同場次的時候可以心猿意馬，但是各組別的成員會議常在同一時段召開，只能擇一。我兩次參加的是傳媒產業研究關注組的會議。2018 年的年會時，時任組長的 Philip Napoli (2012) 風趣而有條理地介紹了小組發展近況和前景，隔年換成在澳洲任教的 Sora Park，都說本小組「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也去了澳洲的 Amanda Lotz (2017) 都在現場，與同僚互動熱絡。兩次的成員小組會議都僅十數人參加，五分鐘就讓在場所有人自我介紹完畢。

儘管如此，但總算是回到了熟悉的圈子，能遇到相近經歷的朋友，而確認、展延以及再開發朋友關係，也是同僚與會的重要目的。以 ICA 年會為例，它的議程除了每日密集的報告討論，晚間也安排正式的社交活動，包括全員出席的晚宴、各小組的聯誼會、有名大學舉辦的招待會等等。大部份的時候，好萊塢電影裡常見拙於口舌且不修邊幅的科學家形象，在這裡並不適用；相

反的，以正式服裝為準（但過於正式反而顯得你的拘謹與外行）裝扮，能夠坦率但維持有禮的進退距離的，才是理想的入場規矩。在這樣的社交場合，最能談得來的通常是同事或同學，是以隸屬的機構為根據展開的社會關係；其次是臨場結識的夥伴，是因為相近的研究主題而交往。在一日的知識分享結束後，通常這個時候的談話會避開枯燥的研究題材，也不適合長篇大論，用輕鬆的短句交換工作經驗或旅途見聞會更合適。而我用相反的方式認識到這個規則。大體而言，這些社交活動是以精進研究為旨，但當精進研究的結果被理解成更好的職業發展時，有時會被用工具理性的方式操作，而探問知識的目的會被推遲或擱置，比如以研究為名的交往是為了給位居要職者（名校教授或期刊主編）「留下好印象」，或交換如何發表更多論文的技術性心得，似乎是常見的說法。

初來乍到研討會的時候，多少會因為如何融入小圈圈而困擾，特別是在人聲鼎沸的社交場合裡形單影隻，讓人特別難受。但若意在交流知識本身，機會俯拾即是。研討會裡有許多篤實的學者，當他們談到所屬的領域知識時，便不由自主地滔滔不絕。對後輩如我而言，這是拓展既有的知識視野的良機。藉此，和 ACEI 年會裡能針對性的討論研究主題相比，我在 ICA 與 IAMCR 的年會裡一面重溫知識版圖，一面擴充知識範疇與理論的想像力。比如 J. Sinclair (2016) 在影視業的國際傳播上治學甚深，是研讀該領域的我們不會錯過的前輩學者。他晚近針對跨國廣告業的研究再下一城，敏銳地指出 Google 這類新媒體襲奪跨國廣告代理商的市場，衝擊了既有的全球傳媒生態。慚愧的是我對此並無所悉，直到 2018 年在奧瑞崗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 的一處綠地辦的 IAMCR 烤肉會上，我兩手端著盛著過滿食物的盤子魯莽地坐進一桌年長學者餘下的空位，誤打誤撞和 Sinclair 同桌。當我驚喜地脫口說出「我讀你的書長大」之類的仰慕之詞但竟不知他晚近研究，老先生不以為意，笑嘻嘻地介紹了他新近關注的主題。同桌其他人也簡單談了各自的研究，讓人如沐春風。

像這樣意外的知識交流並非與大師限定，會中四處是眼中發出熠熠火光的中生代同僚，他們對知識的渴求與願熱切分享的姿態很容易辨認。19 年的 ICA 年會期間，我與印度學者 Uttaran Dutta (2018) 同住，他在跨文化傳播

領域的耕耘已久，長於民族誌方法以及文化帝國主義框架的區域研究，對東亞政治經濟史的博學讓人印象深刻。與他的幾日談話，對我而言是補課，而補課地點在會議室、房間以及旅館大廳裡。類似的，在會中談新經濟理論的場次裡，Lilly Irani (2019) 分享了她對當代文化勞動的新理解，對於左翼的生產分析頗有啟發。會後幾個同行圍著她請教，她用鉛筆在小筆記本上細細地記下了每個人的問題，認真思索後提出了想法，以及追問新理論可能性。不論是前輩如 J. Sinclair，或者正在發光熱的 U. Dutta 與 L. Irani，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謙和、從容以及堅定的態度。更進一步，我在 2017 年的 IAMCR 年會結識了重要的研究夥伴陳方玉，幾次談話後我們得知彼此的知識領域互補，便持續共同研究工作至今。這些以純粹知識為目的的交往，不能盡數，都催促著我一再踏上前往研討會之路。

## 伍、代結論：在實體的科學社群裡

幾次參與研討會之後，我重讀 Ong (2012) 所謂口語傳播豐富的表現力被書寫思維排擠而遭到忽略的說法，不覺啞然失笑。我埋首書卷而獨沽經典的那些日子，和社群對話的意願與能力淡去直到失語，在重新回到科學社群裡才漸漸恢復。通過對話，我領會了思想的複雜多變，而經典在其中生生不息。另一方面，和許多同僚團抱固然溫暖，然而在 ACEI 與 IAMCR/ICA 之間往復，我再確認自己處於學圈邊緣的位置，但依稀可見前人足跡，自知並不孤單，也有別緻的風景可看。

這一方面本於對 Kuhn 主張知識典範紮根於科學社群的再理解，另一方面，也是藉 R. Burt (2004) 的社會網絡理論，將自己的相對孤立狀態理解為處於社群間之間的結構洞的位置。相較於內部連帶緊密、分工井然、有階有序而且重覆應用既有典範與視角的集群，我處在集群的邊緣，一方面不受分工與階序的安排，再方面通過比較不同集群典範與視角，有許多新的體會，有利非冗餘資訊 (non-redundant information) 的交換。然而如何轉譯不同社群典範的語言，以及用所屬社群慣用的溝通格式提出而被接受，並不是

容易的事。知道這不容易及其道理，是我在研討會的寶貴學習，而我想這與知識求取本身同等必要。

## 參考書目

- Boyd-Barrett, O. (2014). *Media imperialism*. London, UK: Sage.
- Boyd-Barrett, O., & Thussu, D. K. (1992). *Contra-flow in global new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news exchange mechanisms*. London, UK: J. Libbey.
- Burt, R. S. (2004).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2), 349-399.
- Burt, R. S. (2007). *Brokerage & Closur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apital*.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tandriopoulos, D., Duhoux, A., Larouche, C., & Perroux, M. (2016). The impact of a researcher's structural position on scientific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PLoS One*, 11(8), e0161281. doi:10.1371/journal.pone.0161281
- Cunningham, S., Flew, T., & Swift, A. (2015). *Media economics*.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Dutta, U. (2018). Negotiating structural absences: Voices of indigenous subalterns of eastern India.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7(1), 52-71.
- Irani, L. (2019). *Chasing innovation making entrepreneurial citizens in moder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awashima, N., & Lee, H.-K. (Eds.). (2018). *Asian cultural flows: Cultural policies,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media consumers*. Singapore: Springer.
- Klamer, A. (2017).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e value based economy*. Amsterdam, NL: Ubiquity Press.
- Kuhn, T. S. (201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4<sup>th</sup> e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ydesdorff, L. (2007).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ve codification: Social systems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uropean*

-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3), 375-388. doi:10.1177/1368431007080701
- Lotz, A. D. (2017). *Portals: A treatise on internet-distributed television*. MI: Michigan Publishing.
- Napoli, P. M. (2012). Audience 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of audienc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4(2), 79-97.
- Ong, W. J. (201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30<sup>th</sup> anniversary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Pokorny, M., & Sedgwick, J. (2010). Profitability trends in Hollywood, 1929 to 1999: Somebody must know someth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1), 56-84.
- Sinclair, J. (2016). Advertising and media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3522-3535.
- Smith, A. A. (1984). Two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 A. Cohen and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and Society*, 13(4), 513-540.
- Whittle, A., & Spicer, A. (2008). Is actor network theory critique? *Organization Studies*, 29(4), 611-629. doi:10.1177/0170840607082223

## Why conference matters? Understanding it via the concepts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hih-Chien Chang\*

### ABSTRACT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an academic conference facilitate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learning, applying and updat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via elaborating how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structure, genealogy and knowledge legitimacy grow from an academic conferenc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conceptual frame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takes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s a case for investigation. It concludes: the community members learn the interactive patterns in a conference to dialogue, confirm their relative positions in genealogy, and identify the formation of a core-peripheral structure. Also, the opportunities of paradigm shift would be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position.

**Keywords:** academic conference, communication studies, knowledge legitimac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cientific community

---

\* Chang, Shih-Chi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HK, e-mail: chang17tw@gmail.com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期  
2019 年 12 月

# 新聞（匯流）的科技觀與宗教觀： 論兩本近作，以政策作結

馮建三\*

## 本文引用格式

馮建三（2019）。〈新聞（匯流）的科技觀與宗教觀：論兩本近作，以政策作結〉，《傳播、文化與政治》，10:121-149。

---

投稿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11 月 5 日。

\* 作者馮建三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e-mail: jsfeng@nccu.edu.tw

## 《摘要》

本文評介兩本論述新聞的近作，佐以英美為主的材料，討論媒體因數位技術而匯流的脈絡下，未來的新聞「怎麼辦」的問題。林照真教授問：「我們當老師的，逃脫不了責任。但我更在意的是新聞產業，為什麼不能與時俱進……」她希望《紐約時報》、《衛報》、《BBC》與《半島電台》運用新技術的例子，能對同業有正向的啟發。何日生博士則力倡《建構式新聞》作為出路，他認為記者必須放棄「人咬狗才是新聞」的主流新聞價值觀，然後要轉而以「良善的動機...『觀察、評價、參與』社會中值得被報導、需要被溝通、期待被解決的公共議題」。林照真與何日生分別從科技與宗教角度，申論媒體匯流年代的新聞教育與實務問題，他們雖也提出政策關懷，但僅屬蜻蜓點水而未能發揮，本文因此以英美為主的報紙與廣電傳媒作為例子，扼要引伸傳播政策的意義。

**關鍵詞：**新媒體、新聞匯流、建構式新聞、傳播政策

## 壹、前言：新聞「怎麼辦」？

多種媒體形式因數位技術而匯流，致使報紙大受衝擊。在西方，英美報紙受創更為嚴重。在金融爆炸後，2008 至 2012 年間，英國報紙發行人數跌 29%，歐陸平均是 12%（Baines, 2013）；在相同期間，美國報紙的發行收入仍有微量增加（103 與 104 億美元），但廣告廠商大舉掉頭離去，從 378 億銳減至 253 億美元（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June 13）。不過，業界總體低迷是一回事，不少報紙通過裁員（包括合併<sup>1</sup>）…等節流方式，仍然有利可圖。<sup>2</sup>

紙版報刊的發行人數大幅減少，主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二十載的羅斯布里奇（Rusbridger, 2018）有切身的具體證詞。他說，在 2015 年卸任編務時，《衛報》的 18 至 24 歲的英國用戶，僅有 6% 通過紙版閱讀。但《衛報》的網路流量雖然高居英國「質報」第一名，但如同其他報紙，其線上廣告收入增加有限，因為這些廣告有很大部分，移轉到了臉書與谷歌。因此，到了 2017 年，英國的《傳媒公報》（*the Press Gazette*）推動「終止谷歌與臉書摧毀新聞專業」的跨界運動；次年春，英國文化部長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一年後已經提出「永續新聞事業」的建議方案供內閣參考。（Cairncross, 2019）

受創嚴重的美國報業公會從 2013 年起，不再提供記者人數與廣告或發行收入的統計，並在 2016 年更名為「新聞媒體聯盟」（News Media Alliance, NMA）。它在 2017 年訴請國會認定，它代表兩千家會員與谷歌及臉書協商廣告分配議題，不應受反壟斷法限制；2019 年 6 月，NMA 再提報告，指其

---

<sup>1</sup> 比如，美國第二大報團 New Media 在 2019/8/6 宣布將以 14 億美元併購最大報團 Gannett（包括英國第二大地區報團 Newsquest）。若完成，Gannett 股東將持有新集團 49.5% 股份，New Media 股東則持有 50.5%，合併後年省 2.75 至 3 億美元，新集團屆時將在美國 47 個州擁有 263 份報紙，每日發行 870 萬份，比第二大報團 McClatchy 多 700 萬份。（Tobitt, 2019; 張聲肇, 2019）

<sup>2</sup> 舉個例子，英國「每日郵報及總信託」（DMGT）集團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報紙、廣播電視及資訊相關業務，英國為主，但也跨足海外。僅看「報紙」，其 1996 年的利潤（每年 9 月底結算）是 7500 萬英鎊，佔集團所有利潤的 86%。到了 2006 年，前述兩個數字是 53% 與 1.6 億英鎊，至 2008 年，前述兩個數字是 38% 與 1.22 億英鎊，十年後的 2018 是 38.7% 與 6540 萬英鎊，報業利潤減少，但仍超過一成，並且佔集團利潤的比重，晚近十年幾乎已無變化。（DGMT 2009:22, 2016:3, 2018:3）

所屬會員在 2018 年的線上廣告收入僅 51 億美元，但單是谷歌同年的廣告收入，就有 47 億來自其會員的貢獻（News Media Alliance, 2019, June），雖然另有專業人士認為，NMA 的算法有誤（Ingram, 2019）。

相對於報紙新聞的流通管道與使用者面貌，二十年來大異其趣，電視新聞仍屬相對穩定；但美國與英國的收視行為，卻有很大的不同。美國人收看無線 ABC 與 CBS 及 NBC 晚間新聞的人數，在 2017/18 年度的平均，依序是 864、815 與 621 萬，<sup>3</sup>收看衛星 24 小時新聞頻道黃金時段的人數，Fox 新聞網是 243 萬，CNN 是 99 萬，MBC 是 180 萬（Katz, 2018, 2019）。相對於美國的分散，英國電視新聞的收視分布，相當集中。從 2010 至 2017 年，英國人電視新聞收看的時數是有減少，一年從 121 小時減少至 110 小時，但九成以上集中在無線電視，其中，BBC 的佔有率都在 75% 或更高（Ofcom, 2018, June, p.23, 27）。若以 2019 年為例，依賴無線的 BBC 作為新聞來源的比例是 69%、依賴 ITV 等另三家無線電視是 40%，從臉書與谷歌的搜索引擎分別是 35% 與 19%（其中部分轉載自 BBC, ITV 等傳統媒體）（Ofcom, 2019, July, p.19）。

在僅半數人口擁有手機、上網仍較不方便的古巴，一方面依然存在「紙張短缺困擾新聞業」（南博一，2019 年 4 月 5 日），他方面卻也同樣得面對科技的衝擊，特別是 2014 年起，開始有「星期包裹」（weekly package）以隨身盤方式傳送大量新聞及娛樂內容，至 2017 年，人口一千萬的古巴，已有五、六百萬人固定使用（Lambert, 2017, November 4）。這就是哈瓦那大學傳播學院葛塞思（Raul Garces）院長所說，科技的影響之外，古巴的新聞事業有自己的特定困難，往內，它還得在空間有限的框架之內運作，在外，另有美國超過半世紀的封鎖不見鬆弛。怎麼辦？葛塞思的「解方」有些禪意、有些存在主義：無他，就是「負起責任，每天每日有效從事，做好新聞。」（Lule, 2017, E4）

本文則取兩本論述新聞的近作，佐以英美為主的材料，在媒體技術形式匯流的脈絡下，試圖與未來的新聞「怎麼辦」這個提問對話。兩本書當中，

---

<sup>3</sup> 惟 Pew 所發佈的數字較低，僅 500 多萬，見  
<https://www.journalism.org/fact-sheet/network-news/>

一本寄望於科技，另一則源出於宗教組織而發言；兩位作者都是已有一、二十年的記者資歷後，轉任教職；文末從兩書已經出現但沒有討論的政策關懷，略再發揮。

## 貳、科技觀點

在台灣，林照真（2017）教授向外取經，希望《紐約時報》、《衛報》、《BBC》與《半島電台》運用新技術的例子，能對台灣同業有正向的啟發。同樣是資深記者轉入學院的何日生（2017）博士則以本世紀從事教學十數年的經驗，力倡「建構式新聞」作為努力的方向。

林照真問：「為什麼國內新聞產業……從來不考慮轉型與聚合……抗拒進步、抗拒轉型，讓國內的新聞跌至谷底、無法翻身」「我們當老師的，逃脫不了責任。但我更在意的，是台灣的新聞產業，為什麼不能與時俱進...我先在國內……找……看不到新思維。我必須到國外找答案...。」她在《新聞，在轉捩點上》對新媒體的置入行銷提出批判（第十二章），描述了「資料新聞學」在台灣實踐的蹣跚步履（第十三章）。除了這兩章，作者全書的重心，是在揭發及扼腕本地（台灣）的「報紙」與「電視」未能如同英美（與卡達）那般地「勇於轉型」，未能運用新傳播科技而擁抱數位聚合。（林照真，2017，頁 7, 10-11）

《新》書第十章的主軸是在說明《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等四家綜合報紙，在其研究時，還沒有「數位第一」的概念。相對於海外報紙先將好的、獨家新聞放在網路，後出紙版，在台灣，由於「老闆的政商利益決定新聞內容」，不是順應時代善用科技，因此「一直未出現這類聚合」；更糟的是，等到記者「跨媒體進行……報導」「只是加重了...工作份量……沒有提升記者……生產好新聞的機會」，結果是新聞聚合，在台灣「無助於提升新聞品質」（頁 315, 323, 328,330）。再來，第十一章紀錄與分析七個 24 小時電視新聞頻道，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經驗材料：作者發現，在 2011 年 10 與 11 月晚間六至八點，這些頻道總計播出 5097 則「三器新聞」，亦即取用「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與「街口監視器」的影音，或以其

作為消息來源。這類新聞佔全部新聞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民視稍低，不到一成五）<sup>4</sup>，它們的內容總計有將近 89%與公共性無關，致使「損害新聞專業」（頁 363, 367）。

作者的這些觀察在 2011 年完成，其後的發展顯示，本地報紙「後來居上」。比如，大約從 2013 年起，四報先後競相投入「即時新聞」的行列，但新聞業的表現，應該沒有更見高明，已有不少論文就此著墨（比如，鄭宇融，2014；王毓莉，2016；李竹君，2016；彭慧明，2016）。電視新聞頻道對「三器」的依賴，更見嚴重，因此，《看》雜誌參酌林照真的分析而作觀察與統計，發現 2016 年 10 月的兩天之中，七家新聞頻道<sup>5</sup>及四家無線台的新聞時段的「三器」新聞比例，除了公視沒有而民視的 4.65%比較低之外，其餘電視新聞比起五年前，都是更為依賴三器作為消息來源，其比例介於 36.5 與 72.6% 之間，即便將所有 11 家電視新聞一起計算，平均比例也高達 43.4%（李唐峰，2016 年 12 月 5 日）。

本地報紙先是遲疑，「好」新聞不先入網，如今習以為常，好的、壞的新聞都已「即時」上網，惟該作法顯非林照真推崇的「數位優先」；三器無罪，但在電視新聞高度競爭的台灣，誘使很多業者飲鴆止渴、無法自己。看到這些變化，應該沒有人會說，主要報紙與電視在運用更多的新技術之後，致令林照真的研究完成五、六年以來，台灣的新聞表現每況愈下。那麼，相同道理，假使再作斟酌而冷靜審視，理當知道新聞的救贖，關鍵不在科技，不是台灣傳媒是否能有「正確」的數位優先理念與作為，不在新聞傳播教育是不是迅速且有效導入技術相關的課程。

新的傳播技術有待使用，不是抗拒，但有些媒體是有條件善用科技，有些則否。有些媒體是因為商業競爭而主動或被迫向數位轉，在美國，這個情況以發行全國（乃至全球）的傳統紙媒（如《紐約時報》）為主。另有些傳媒並無或少有競爭壓力，但可能因為科技風潮成形，或科技普及造成的未經證實的吸引力或無形壓力，致使投入，美國各大城市村鎮的報紙在「一地僅

---

<sup>4</sup>七家新聞頻道是中天、東森、TVBS-N、年代、三立、非凡與民視，作者未做比例的統計，這裡是依據《新》的〈表 2〉與註 49 的補充說明計算而來。

<sup>5</sup>七家新聞頻道不含非凡，加入了「壹電視」

有一報」的壟斷格局下，大致屬於這個類型。齊湘（2018）的調查顯示，在 2015 年，以全美 51 家每日發行量超過 12 萬份的地方報紙為例，這些報紙的印刷版在本地的讀者數量，都比數位讀者多很多（28%對 10%）。這個發現適用於所有年齡階層，最年輕的 18-24 歲美國人，有 19.9% 過去 7 天讀本地報刊的紙版，但只有 7.8% 讀本地報紙的數位版。僅讀紙版的人最多（23.3%），其次是讀紙版也讀電子版（5.5%），只讀電子版是 4.5%。最後，紙版閱讀率確實下滑嚴重，從 2007 年的 42.4% 跌至 2015 年的 28.8%，但數位版讀者在 2007 年之後，幾乎沒有增加（該年是 9.8%，過了八年，也就是 2015 年，仍然僅有 10.0%）。齊湘（2018，頁 169）認為，羅森瓦（Mike Rosenwald）的結論「言簡意賅」，或許可以作為總結，顯示美國具有壟斷性質的地方報紙之數位實驗，是「得不償失」，儘管這個結論對於業者來說，已經於事無補：

各大城市報相繼沒落，數千名記者失業，數字新聞終將轉虧為盈的說法現在聽起來像是個謠言。現實是：無論是 app、網站、「垂直整合」、社交網絡、演算法、Apple 新聞、付費牆、軟付費牆、目標廣告、還是移動先行策略，都遠遠不及印刷產品在營收和閱讀率方面的表現。

然而，主流思維至今仍然是 AI、區塊鏈……等等聲浪的天下，公共政策……等其他話語難以出頭。此時，這個結論不是事後諸葛，<sup>6</sup>它是私人資本所指導的市場競爭邏輯與工具理性與行為排擠之下，仍然尚未滅絕的空谷足音。這不是反科技，而是提醒世人，雖然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但在為

---

<sup>6</sup> 出版於 2017 年 11 月的研究報告（Radcliffe & Ali, 2017）發現，美國「地方小報紙的生存能量，比都會區同業來得強大」。《經濟學人》（Economist, 2018, July 23）也報導，2004 至 2017 年底，美國報刊少了五分之一，其中有 61% 週刊及 70% 日報消失於 10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但人口少於 3 萬的村鎮，「僅有」20% 週報與 11% 日報關門。其中一個值得知道的是肯德基州的諾藍傳媒集團（Nolan Group Media），它以一萬餘人口的倫敦小鎮為核心，在鄰近地區總計發行八家報紙、每日總發行量 2.5 萬份，包括創刊最早（1899 年）的 *Berea Citizen* 有 4511 份。這個集團聘用 12 位記者與 9 位廣告人，年收入約 200 萬美元，利潤約 10%。負責人說「這個行業賺不了大錢，但地方報紙很重要，假使沒了記者，肯德基就會...腐敗。」肯德基大學的鄉村新聞中心的卡羅斯（Al Cross）也說，「單只記者在市議會開會時出現，就能讓這些會議規矩些。」

賺錢且使其歸私人支配的新科技不斷「刻意地汰舊換新」的過程，傳統媒體假使要善用新技術，必須要有特定條件的配合。善事運用科技必有相應的條件與脈絡，無法概括論定，《新聞，在轉捩點上》一書所列舉的四家海外傳媒，各有獨特的性質。<sup>7</sup>

《紐約時報》的地位來自其國籍，它是美國與全球自由派報紙的領頭羊，舉世無雙。紐時在 2003-2007 年試行付費牆，成果有限，放棄後有人 2009 年再來遊說，請渠再接再厲，恢復試驗。沒有想到，該報當時竟然表示，付費牆根本就是「瘋狂」之議，不過，再過兩年也就是 2011 年春，紐時改變心意，再次推出付費牆（馮建三，2015a，頁 112-115）。到了 2018 年 6 月底，紐時已經取得 380 萬付費訂戶（其中 290 萬戶僅訂數位版），這個發行收入佔紐時總營收的三分之二（Peiser, 2018, August 9）。《衛報》是另一個模式，它擁有相關企業與為其設置的基金，等於是眾星拱月，純為伸張衛報的新聞志業而存在（賴子歆，2015）。2003 至 2013 年，《衛報》虧損累計 2.732 億英鎊，至 2019 年才有十七年以來的第一次盈餘（80 萬英鎊），但《衛報》堅持不豎立付費牆，雖然它已經開始徵求讀者志願捐款（至 2019 年 3 月底含紙版訂戶是 65.5 萬人，捐款一次另有 30 萬人；馮建三，2015b，頁 361；Tobitt, 2019, May 1）。《衛報》的客觀條件至今足以支持其理念，承受至少十六年鉅額虧損不改初衷，世所罕見或絕無僅有；但這個全無公共政策予以支持的模式，還能賡續多長時間，以何種規模與內容屬性運作於世，仍在未定之天。

《新》書的第三與第四個案例，其本尊都是電子傳媒，也就是 BBC 與半島電視台。先不論其他條件的差異，二者相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是政治力的創設物。最少至 2027 年以前，BBC 的財政都能依靠穩定的執照費收入，這是紐時與《衛報》再怎麼努力都無法得到的權利，BBC 則從出生就已經擁

---

<sup>7</sup> 這裡並未說傳統媒體進入數位年代，或原生數位媒體一定失敗，而是表明「勇於」從事「數位第一」的傳統傳媒，其條件在台灣尚不具備。根據林翠絹（2018，頁 95）的資料，新加坡 *The Strait Times* 在 2014 年採付費牆後，至 2016 年 8 月紙版與數位訂戶接近 40 萬！若考慮新加坡人口約五百萬，這個訂戶數極高。該記錄是否穩定，何以能有該成績，值得細究，比如，是因為新加坡政府介入傳媒生態甚深，而該報是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旗下 17 家報紙最大一家的關係嗎？是有公司內部的交互促銷或補貼嗎？

有。部分原因可能是 BBC 的績效可觀，因此，英國政府在金融爆炸後所採取財政緊縮，2011 至 2015 年間，平均削減各個部會的預算達 25%，但對 BBC，「僅減」16%。即便得到這個「優待」，《經濟學人》仍為 BBC 打抱不平，對於這家基本立場是要拆分 BBC 並使其私有化的週刊，它的「仗義執言」相當罕見：「BBC……提升英國人的生活品質，提升英國的海外形象……比起政府的任何……作為，來得都大……其他國家無不羨慕。」（Economist, 2011, June 4）至於「半島電視台」，它的創設及獨特的財政起自「不民主」及「突變」。卡達國王哈馬德（Shaykh Hamad）在 1995 年發動政變取得權位，阿拉伯世界譁然。部分原因是要反制阿拉伯世界（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對政變的反彈，因此，哈馬德挹注巨資，先後在 1996 與 2006 年開辦阿拉伯語及英語電視頻道，「動員阿拉伯群眾，讓卡達政府……得以在本地區的政治協商，取得上風」（Shawn, 2012, pp. 8-11，另見林照真，2017，頁 206）。

8

紐時、《衛報》、BBC 與半島電視台都是善用新傳播技術的（傳統）媒體，惟如前所述，它們有此意識與能力，各自受惠於特定的條件。紐時背倚美國菁英媒體的優勢，又有英語助其對外擴張，遂能結合市場機制而盈利，符合

<sup>8</sup> Hamad 在 2013 年以 61 歲之齡，再創紀錄：〈卡達國王遜位 阿拉伯世界首見〉（陳世欽，2013 年 6 月 25 日）。卡達王室與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及中東多國的不睦關係持續至今，因此〈沙國、阿聯金援埃及 一擲 2400 億元〉，「對抗傾向政教合一的卡達...」（張佑生，2013 年 7 月 11 日）；埃及當局〈打擊外媒 半島記者煽動罪被捕〉（田思怡，2013 年 8 月 20 日）。2017 年，沙國等 7 國「集體與卡達斷交... 前所未見」（李京倫，2017 年 6 月 6 日），美國考量卡達戰略利益而調停（陳韋廷，2017），以及〈母國深陷斷交危機，半島電視台怎麼辦？〉（陳虹瑾，2017 年 9 月 20 日）。半島電台與美國的曖昧關係，早在 2011 年利比亞元首格達費（Muammar Gaddafi）遭推翻的過程，就曾顯現。中國大陸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殷罡認為，是半島發佈「假新聞」，指格達費派飛機轟炸行遊隊伍，才有聯合國安理會在該年 3 月 17 日通過 1973 號決議文，授權法英等國介入利比亞內戰。（陳建利，2011 年 8 月 28 日）路透社則說，美國不直接介入利比亞內戰，但卡達扮演「美國代理人」，反格達費的叛軍當時求援 20-30 億美元，卡達提供 4-5 億、是最大捐贈者，卡達並在戰事緊密時，連續數個月補給叛軍。（Zhdannikov et.al., 2011, June 9）比起 BBC 這個也有英帝國主義傳媒的表現，半島台更主戰且偏向叛軍。（Irer, 2012）2011 年 9 月擔任半島台長已有八年的漢法爾（Wadah Khanfar）突然去職，亦可顯示在反恐問題上，美國與卡達的複雜關係：〈維基解密爆與美關係密切 半島電視台台長下臺〉（國際新聞中心，2011 年 9 月 22 日）。

資本的成功標準。《衛報》不然，它不走付費牆路線，惟該報的市場策略若是翻轉，亦即若是如同紐時而取付費牆，如同若延續目前的模式是否就能長存，都難以預判。BBC 的財政得到歷史制度及其閱聽眾與公權力的支持，是其取得經濟效率及市場成功的重要因素。卡達超級富裕，加諸歷史的意外、特定政治人物的性格，以及無法複製的地緣政治因素，遂使半島電視台在無從得利，並且耗費大量資金於國際電子新聞市場 20 餘年，仍可維持運營。

對於這些海外傳媒的特殊性，林照真教授未必沒有體會。比如，從 2012 至 2014 年，她前往紐約、倫敦與多哈，合計訪談 70 位媒體人，並以第三章至第九章，約二一〇頁篇幅的七六頁左右，直接整理及引述他們的「數位第一」之部署過程及經驗。正是通過這些親訪及文獻記載，讀者於是得知，用來篩選與查證「三器」消息或畫面是否真實、是否值得報導或追蹤的人力，BBC 就有 20 人，CNN 也有 8 位（頁 286, 289）。見此，任何人都會自付，台灣傳媒的市場結構與條件，還能容許哪家傳媒擁有類似的人力部署？因此，至少在兩個段落，作者也指認了癥結，反省了台灣的主流傳媒未能善用三器、未能投入資源開發資料新聞學的原因：

「不是科技…因聚合帶來商業導向的媒體發展趨勢，才是傷害新聞品質的主要原因…如何透過法律、政策加以防範、減少惡化…才是…關鍵…」(頁 311)

「如果能有一個優質媒體成功立足於台灣市場，必然能…起帶領作用…公共電視最能扮演這樣的角色。但…公共電視經費拮据…客語、原住民等…未能…有效…聚合…反而…分散經營…無法以更大的…規模…造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頁 227)

通過以上兩句引述，我們或許可以說，即便本書起點是科技考察，但作者沒有就此結束，而是向前跨了一步。雖然，對於政治力與台灣新聞事業的改善，究竟當有、可以有哪些積極關係，作者因本書的主題所限，無法詳細

申論。但也因為已經指認問題的根源，那麼，對於美國學人的下列的樂觀推理，僅從科技論事，卻未同時論及公權力的作用，林照真可能未必能夠同意。

這裡是指，關注調查報導的史丹佛大學傳播教授漢米爾頓說，當前美國的新聞事業非常紛亂，但他認為：

這很明顯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毀滅」…電腦化的新聞事業取得進展後，就能改進調查報導的經濟前景…從供應面來說，通過更好地使用資料與程式運算，發現值得報導、責成金權負責之題材的成本可望降低，此時，媒體就比較可能投入調查。就需求面來說，相關研究可以讓調查報導更能吸引人，讓使用者更能進入狀況或更符合其個人的偏好方式，這樣一來媒體就很有可能提高機會，吸引更多讀者或觀眾，如此也就可以通過廣告或訂閱得到更多金錢收入。(Hamilton, 2016,p.287, 304) <sup>9</sup>

有了新的技術，就要用，有了飛機，萬里之行直奔雲霄，可以不再始於足下。但是，電腦、5G、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的結合使用，即便必須，也不可能是導正、無法是振興新聞事業的最重要或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果沒有其他條件的配合。

## 參、宗教觀點

對於乞靈於新傳播科技的念頭，何日生（2017，導論，頁 22-23）博士顯然是敬謝不敏。他認為，假使主流的新聞價值觀（「人咬狗才是新聞」），到了新媒體的年代，一成不變；如果媒體人編採新聞的認知（「價值中立」而不是「公正」）與心態（沒有「同理心」、「為批判而批判」，卻欠缺「我批判」，

---

<sup>9</sup> 即便如此，作者也提及傳媒「內容」的公共財與外部性特徵，但批評層次不高，主要是說政府資訊公開法不夠開放、不夠便民，複印等相關費用太高，並僅有一行提及「政府預算分配至政府資訊人員、公共媒體、資訊基礎設施，甚至補助電話線路寬頻等等，都會對於內容創造與分配，起到補助的作用。」(Hamilton, 2016, pp. 283-285)

是我想解決」作為出發點)；倘若新媒體年代的新聞產製，仍然通過利潤歸私的商業競爭而運作，同時欠缺公權力的有效規範，致使「新聞市場機制的失靈」，未獲糾正。

何日生反對人們(因受制約而)習以為常的新聞觀，他對新聞自由也不是照單全收，而是自忖、同時也邀請讀者一起「再思索」，然後，他還凸顯新聞自由的「限制」(何日生，2017，第一、二章)，並進而倡導《建構式新聞》(前引書，導論的頁 13-14，第六章的頁 105-134)。因此，乍看之下，何博士對新聞的理解框架，似乎剛好與對岸官方對「消極新聞自由」的壓制，以及中共的弘揚主旋律，強調正面報導為主的新聞理念與實作，若何符節。舉個例子，從 1980 至 1987 年間，《人民日報》的負面新聞僅佔 15.5%。這個在商業媒體中已經不高的比例，到了 2003 年跌至更低的 6.6%。這個迥異於西方商業傳媒的現象，曾經讓大陸學者疾呼「負面報導不是壞東西」(張玉洪，2010)。<sup>10</sup>在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2016 年 2 月發表輿論工作的講話後，人民網微博轉載的新聞，也在往建設性的方向移動：2016 年 1 月的正面與中性新聞比例是 35%，2017 年 5 月增加至 48% (宋子節，2018 年 1 月 24 日)。

不過，若是深入閱讀相關章節，當可發現何日生仍然是新聞自由觀的支持者，並且，他的論證其實沒有完全脫離西方論述的框架。對比之下，是台灣主要傳媒所實踐的新聞自由，流於片面，遂很可能讓人起了誤會。就此來說，何博士簡介的新聞學理、美國新聞史及判例，雖無新意，仍然是值得不斷複習的道理，作者增添的本地案例與討論則有較多機會，可以激發讀者的興趣，有助於學習效果的提升。

除了並未脫離西方的新聞主流框架，何日生對「例外新聞與社會實相」(第四章，頁 65-81，特別是頁 66-67 有關美國 1992 年洛杉磯白人警察毆打拒絕臨檢的非裔公民事件)以及對「負面新聞及其影響」(第五章，頁 105-134)

---

<sup>10</sup> 作者對負面報導的定義是：「對可能或已經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損失的自然災害，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重大違法、違規現象以及異議(不同觀點)的報導。這些報導可能引起人們對報導物件(個人、組織/機構、國家或政策等)產生負面評價。」(張玉洪，2010，頁 33)

的討論與看法，絕大多也是引述歐美的傳播效果研究之成果。<sup>11</sup>因此，作者指出，由於負面新聞未必讓人心生警惕，其大量報導也就不必然有助於改善社會，並且，實情反而「極可能…相反」。這就是說，由於負面新聞多了，很有可能會「造成……（人們的）彼此不信任」。這正如同，災難、自殺、暴力、情色等新聞看多了，就有可能導致受眾的模仿效應；至於「大量披露政治弊案」的結果，在美國就是致使「政治的信譽喪失……阻卻菁英從政……基層民眾……疏離……年年投票率降低」，「新聞幾乎全部是負面……將社會去榮譽化……是這個時代空虛和混亂的來源之一。」

這些看法是模仿說與涵化說(Shanahan & Morgan,1999)的重新陳述。《啟蒙在此見證：論理性、科學、人文精神與進步》在《建構式新聞》問世一年後出版，該書並不是傳播效果研究之作，但我們可以說，該書作者品克(Pinker, 2018)同樣提供了相當強大的論述，是從另一領域，再次闡述涵化說，呼應了前段所引述的何日生看法。

品克說了什麼？在《啟蒙》一書，他高唱樂觀者之言，雖然這個「膽識」會讓不少人「難以下嚥」。品克蒐集了許多材料，然後據以論稱。他說，幾百年來，人們的營養改善、幼童上學機會多，當前人類智商比百年前高了98%。人們對少數民族及同性戀等平等權利的信念已有增強，反映在2004年以來，在美國搜尋「帶有種族偏見的笑話」，次數減少了八分之七；同時，美國大學生的孤獨感，也在下降。<sup>12</sup>當前中東的穆斯林年輕人與1960年代西歐年輕人的自由派信念，相當接近！「世界價值」(World Values)的調查顯示，從1981至2007年，在52個國家當中，45個國家人民認為幸福感(happiness)增加。全球暖化是問題，但並非無法克服。是有核子戰爭的威

---

<sup>11</sup>在這裡及他處，作者有些引述不夠清楚。比如，頁89引用1974年的論文，但正文提及1978年的事件，這可能是筆誤？再者，原作者(Phillips,1974); Phillips & Berkowitz, 1986)確實認為傳媒的報導量獨立地「導致」了較多的自殺案件，但本書的整理與推論，似乎超越原作？又如，頁109所引的圖書，未見頁碼，致使讀者即便懷疑美國公共電視曾經有過「四年的預算兩百四十億美金」，也會很難查證(事實上，美國公視在內的公共廣播年度預算，歷來少於五億美元)，見CPB(2018, p.3)。

<sup>12</sup>但另有調查顯示，從2003至2015年，每個OECD會員國之15歲年輕人，愈來愈多是覺得在校孤獨，參見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8/08/31/loneliness-is-pervasive-and-rising-particularly-among-the-young>

脅，但已從可能爆發的頂峰降低了 85%。《經濟學人》也跟著認為，當前反移民、反英美傳統自由民主體制的川普作風與民粹主義，老是認為美好的舊時代已經飄逝，是厚古薄今的當代表現，正需要品克的著作予以糾正：一百年前誰能沒有某種宗教信仰，如今僅有 59%，理性前進中 (Economist, 2018, February 24)。反之，認為品克之見，徒然是烏托邦乃至粉飾太平的當代化身，也在所多有 (Eaton, 2018, March 1)。

品克對歷史與人類理性的研判與信心，使其有了樂觀之情。這樣的心向與欣然情緒的洋溢，普遍存在嗎？品克 (2018, February 17) 認為可能並不普遍，並且很有可能相反，表現在當前傳媒的多種新聞報導充斥著「人在福中不知福」的現象：人類的理性成就分明可喜可賀，大眾傳媒卻在唱衰世界。品克引述李塔盧 (Kalev Leetaru) 對「情緒探勘」(sentiment mining) 的運用，指出《紐約時報》從 1960 年代以來的報導就有日轉陰沈憂鬱之象，至 1980 / 1990 年代稍稍好轉，但其後一路直下至本世紀前十年 (其後，李塔盧尚未研究)，隨著時間前移，新聞持續走向負面之路。再者，李塔盧還蒐集了 130 個國家從 1979 至 2010 年間的廣播與翻譯文稿，也有類似發現。新聞因為要「新」、要「當下」，要「即時」，於是無法或不肯進入「歷史情境」與「社會脈絡」，致使很快發生的負面事情 (大樓倒塌、各種東窗事發的劣行醜聞) 能因符合新聞所需而快速曝光。反之，好的事情卻要醞釀很久 (美觀實用的建築物耗時、改進不平等的賦稅政策要長時間說服)，媒體沒有耐性，也認為閱聽眾無暇無心理解，於是無須多言。但負面新聞報得多、人們也看多了，就會造成自我實現的負面效應：人們跟著也就更顯憂慮，比如，即便有了民主選舉，並不能讓負面現象減少，這樣一來，還需要投票嗎？選舉還有什麼用的質疑也就不時浮現。記者認真從事報導，卻僅只是找出問題，引發更多人的焦慮，受益者於是很可能就是川普這類性質的從政者，品克說 (2018, February 17)：「幾十年來，新聞事業聚焦在找出問題，發掘了似乎難以療癒的百般病態，這就形同在培土，準備讓川普的種子…生根」。很明顯，品克對主流新聞價值及其表現的批評，可以為「建構式新聞」的正當與必要，添磚加瓦。

「人咬狗」的例外與負面新聞，真能、會以多大規模助長社會病態？品克認定二者相關。那麼，依照道理，他會對新聞表現，有所致語。然而，到頭來，品克僅是再三與堅持述說理性的成就，認定人類的成績可觀（特別是福利國家體制的建立）之後，別無他語。最多，品克只是勸誡撰寫文稿的人（*editorialists*）不要再用「後真實年代」這種「新的陳腔濫調」之後，品克對於「事實查核」也很肯定（Pinker, 2018, pp.375-6）。<sup>13</sup>但是，除了這兩個簡單的期許之外，他沒有其他建言；論述傳媒理當以何種方式、需要何種制度支持，才能更新其新聞與評論，不是他的重點，不在他所說的「理性」成就之列。

何日生博士則不然，《建構式新聞》的書名已是答案，全書有三分之二是「建構式新聞的運用」（頁 135-366），作者在這裡所述，應該分作兩部分。首先是他所說，記者要以「良善的動機……『觀察、評價、參與』社會中值得被報導、需要被溝通、期待被解決的公共議題，或值得…社會保護、尊重的個別權益」、「絕不嗜血炒作、製造對立、挖掘瘡疤、嘩眾取寵、批判攻訐淪為大眾娛樂」（導論，頁 13-14），報導社會文化、司法、公眾人物與一般人……的新聞。再來就是，落實建構式新聞的理念，要有特定條件的配合，作者在這裡提供了三個思考方向。

一是社會的角色。健全傳媒發展需要民間社團的參與，協助監督傳媒的表現；同時，這也需要傳媒從業人員要有「自治組織」，如美國「有很強的新聞聯盟」<sup>14</sup>讓美國的「媒體老闆不敢太肆無忌憚」，如果沒有這個集體屏障，「記者永遠只是一位弱勢員工。」（頁 161, 257）

二是公權力與新聞環境改造的關係，這個部分的討論散見於全書。比如，作者凸顯了言論自由哲學家梅克約翰（Alexander Meiklejohn）教授的提醒，因此，政府的職責不僅是不侵犯新聞自由而已，政府還得「扮演適當的角色促進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之討論。」。又如，作者也進而概括地要求，

---

<sup>13</sup>因為「後真實年代」這個新的陳腔濫調具有「腐蝕效應，若接受這個概念，就意味我們等於是要以我們自己的宣傳與謊言，回擊他者的宣傳與謊言！」（Pinker, 2018, p.375）

<sup>14</sup>作者未曾說明也沒有附錄英文，但這裡猜測新聞「聯盟」，可能是指「新聞記者工會」。

政府應該責成「佔據公共領域的廣電媒體履行公共利益…平衡個人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擬定…傳播政策」。何日生博士也指控商業競爭致使記者疲於奔命而無法「深層理解…思考」，接著，他也多次肯定具體的公共服務傳媒如 BBC 與 NHK 等機構，它們需要由政治力介入才能創造，「制度上應該擴大公共化…由政府撥給預算，由非政府且非營利的組織來經營電視」。<sup>15</sup>

三則涉及台灣可能比較特殊的表現，亦即宗教團體扮演了特定的角色。這裡是指任職於慈濟基金會的何博士認為，該會下屬的「大愛電視」，比較能夠或者已經「『體現「建構式新聞」的理想』，並且，相比於依靠廣告或政府撥款的傳媒，「…大愛靠捐助…有更大的空間行使…理想。」（頁 242-3, 337-366）

作者的這些看法，是否出於作者內化了自己身處的工作組織之價值與文化，不得而知，但會有疑義。一是，假使放大檢視宗教社團與傳媒（電視）的關係，則海外若干研究的成果，值得人們警惕。一是美國及亞洲的若干宗教社團，在運用傳媒的過程，其實已經有了相當濃厚的商業化表現（Moore, 1994; Kitiarsa ed., 2008; Economist, 2015, April 11）。大愛或台灣的其他宗教傳媒，是不是也有這類現象？似乎應該釐清，但何博士本書之外，研究大愛電視的期刊論文至 2018 年似乎僅有七篇<sup>16</sup>，學位論文三篇，<sup>17</sup>並未涉

---

<sup>15</sup> 以上引述依序見諸導論頁 8, 14；正文頁 256-7, 128, 232（何日生說，BBC 因經費仍須政府受政府節制而難免內容走向受影響，但「反映社會議題與公共利益的能力」仍比商業傳媒「更為充份」）；頁 259（「無線電視公共化…值得考慮…電視…商業廣告…收視率的機制支配下…公共化…面對艱困的挑戰。」）；頁 293（「市場機制…符合閱聽者的成見…不是去挑戰它」）；頁 307-8（「新聞自由…變成保障財團的新聞自由，財團的新聞自由則保障了政黨的宣傳自由…任何想要靠「…市場機制」取得言論多元與平衡的想法…都…是烏托邦。」）。

<sup>16</sup> 本文未參考該七篇，不列入參考文獻，僅存目：Shih, D. Y., & Tsai, Y. M. (2018). A spiritual/secular partnership approach to vegetarian fasting program: Buddhist sutra adaptation on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慈濟科技大學學報》6: 53-81。何日生（2010）。〈建構式新聞與大愛電視的傳播理念〉，《弘誓雙月刊》，106:53-57。周典芳、白蕙禎（2010）。〈慈濟大愛劇場製作原則之探究〉，《慈濟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10:181-202。林子晴（2010）。〈當代台灣佛教文化中慈濟音樂的展演分析〉，《慈濟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10:111-150。范相惠、王宣蘋（2007）。〈非營利廣電媒體之節目規劃研究：以「大愛」及「好消息」為例〉，《傳播與管理研究》6(2):3-33。郭冠廷（2018）。〈佛教的利他精神與社會企業實踐〉，《慈發展與前瞻學報》，22:75-88。陳昭儀（2004）。〈靜思語教學之探討與實踐通識課

及這個主題，難以論定。二則大愛近年曾因壓制員工組織工會而「遭罰 3 萬」（〈打壓員工籌組工會 慈濟證嚴法師遭罰 3 萬〉，2016 年 6 月 1 日），剛好背離了何博士前引三個建言所重視的價值。大愛也有可能未即時與對岸政府或網民善事溝通，致使〈中國認為情節涉美化日軍…大愛新戲 2 集下架〉（蕭方綺、曾韋禎，2018 年 5 月 15 日）的新聞在台喧騰了一段時間，大愛其後才表示了歉意（劉力仁，2018 年 5 月 30 日）。

雖有這些不確定之事，但最重要的是，何博士在導出大愛更有空間落實建構式新聞學之前，已經同時意識到了「在高度競爭、利潤微薄的環境下，建構式新聞很難…財政資源會決定新聞的內涵…必須在國家層次上思考…媒體體制…的財政資源。」（頁 365）既然要在國家層次思考，就不可能停留在大愛電視台這個層次。

建構式新聞的倡導，起自丹麥等（北）歐國家的新聞人或學者推動，並非偶然，<sup>18</sup>正是因為這些地方擁有強大的公共服務傳媒制度，因此有識之士就有比較妥適的基礎，消極以言，是高懸「建構新聞」的理念，防止商業競爭對其空間的侵蝕，積極以言，則有通過「建構新聞」作為「思想武器」，敦促社會與政府共進，打造並擴充「建構新聞」所需仰仗的制度。有趣的是，半世紀以前，界定「新聞原則」的蓋爾通（Johan Galtung）也是北歐（挪威）人，他在近日受訪時表示，「當年是藉該篇論文，警示世人，若新聞再以這種敵對方式呈現世界，勢將導致極端的負面效應。」（Haagerup, 2019, January 18）

---

程之實施與省思》，《慈通識教育季刊》，11(3):39-70。

<sup>17</sup> 本文未參考該三篇，不列入參考文獻，僅存目：王曉翔（2016）。《大愛電視閱聽人收視研究：以馬來西亞華裔為例》。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周玲秀（2014）。《宗教電視台之災難新聞呈現—以大愛新聞為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葛傳富（2006）。《台灣電視新聞產製數位化的研究—以民視、年代、大愛電視台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碩士論文。

<sup>18</sup> 根據建構新聞學組織的網站，其七位理事有五位是丹麥新聞人或學人，一位在瑞士從事公共服務廣電事務，第七位來自美國，參見 <https://constructiveinstitute.org/Who-We-Are/The-Organisation>（上網日期：2019 年 7 月 11 日）。台灣辦理華文永續新聞獎時，也是由丹麥新聞人發文祝賀（章凱閔，2017 年 9 月 18 日）。

## 肆、結語：從政策開始

作為新聞重要載體的報紙，發行人及廣告量十數年來在若干國家持續下滑，致使報社收入減少，對新聞編採的人力投資也相隨萎縮，新聞的表現難以服膺民主要求的狀態，相當嚴峻。何以如此？網路與新媒體造成。有無解方？要找出新媒體的經營模式。這是將科技當作是造成困境的原因，也訴求科技作為困境的出路，近世以來，此乃相當常見的反應。

然而，本文起始即曾徵引，指出寬頻與手機等科技產品已經高普及，經濟條件接近且同屬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在相同期間，報紙受負面衝擊的幅度，明顯有別。若以 2008 至 2012 年為例，英美報業的發行人或廣告量，下跌幅度約 30%，不但遠高於歐陸（約 13%）且其後繼續滑落的速度仍是英美遠大於歐陸。這裡，若是將歐美對比日本，差異更大，東瀛綜合性質的報紙從 2000 年每日大約 4700 萬份的發行人，減至 2018 年的 3682 萬，19 年間發行人「僅」減少 21.7%（Nippon.com, 2019, August 6）。日本、英美與歐陸十數年來的新聞紙銷售量的減少程度，差異很大。

何以會有這個差異？原因多端，但若僅稱這是網路與新媒體所造成，並不充分。既然這些高所得國家的科技發達及其使用水平，不相上下，則其報業受創的不同，就得在科技之外，另覓原因。概括言之，箇中涉及兩大類型的因素。一方是各國的不同歷史與文化進程，他方是各國傳播政策的有無及其強弱，兩類因素相互滲透與作用，也就展現為彼此各異其趣的傳媒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及表現。總體而言，美國的歷史情境與條件制約了其政治力與知識力，使其對於傳播政策的用心，遠弱於擁有大規模公共媒體的日本或歐洲。

早在網路商業化十年之時，美國學人（Meyer, 2006）已經疾呼《報紙消失中：拯救資訊年代的新聞事業》，但沒有得到任何迴響。該書出版兩年之後，轟然巨響的金融核爆罕見促使聯邦交易委員會主辦研討會、評估有司是否要有對策（羅世宏、胡元輝，2010，頁 118-176；馮建三，2010，頁 164-167；McChesney & Pickard, 2011）。但曾經主張政府必須以公共政策導引網路自由的學者，彼時卻說，對於報業「危機」，政府應該先袖手旁觀，先等個五至

十年，若沒有起色再議，因為「我特別擔心…進步的…建言…到頭來卻會幫助了現有廠商…強化且複製了二十世紀的產業模式…。」(Benkler 2011, p.226, 237) 果然，美國政府對於不應介入的建言「從善如流」，至今確實也完全沒有任何「拯救」報業的行動。對於報業財政的變化及其對民主意涵的負面影響，美國公權力不聞不問的不動如山，相當驚人：美國報業公會（2016年更名為「新聞媒體聯盟」）向聯邦政府請願，僅只是提出要求，希望它可以代表其兩千餘家報社，聯合與社交媒體平台（也就是臉書與谷歌等）協商廣告收入的分配，不受反托刺斯法的約束。這個要求並不激烈，是因應市場有競爭關係的權力不平衡（擁有壟斷力量的平台業者，以及成百上千的報社）而提出，但這樣的訴求還得在眾議院等候兩年，才開始進入聽證程序。（Associated Press, 2019, June 11）

反觀日本，其政府早在 1955 年就以報紙是「特殊商品」為由，禁止報社對讀者提供金錢或物品誘惑、禁止贈報或樣品，也禁止依照地區或讀者類別而為差別定價，其後再有《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1962）與新法禁止報社登門推銷（1976）（龍一春，2006，頁 15）。這些早期政策在多大範圍形成日本報業的獨特性，包括本世紀以來發行量跌幅遠低於西方，固然還得釐清，惟其公權力對於報業的市場行為必有影響，當無爭議。

加拿大與歐陸而特別是北歐及法國的報業措施或政策，也與美國很不相同。加國 2019 年起連續 5 年，投入約 6 億加幣協助地方報業；<sup>19</sup>北歐與法國更是早從 1960 年代起，就有報業補助並已延伸至網路年代的網路報紙（Murschetz et al., 2013; Sundet et al., 2019）。

---

<sup>19</sup>在業界遊說下，加國政府的 2018 年預算宣布以 5 千萬加幣支持「地方新聞業」，至 11 月並再表明，2019 年元旦開始執行，至 2025 年將引入三種新稅賦措施，估計以五年為期，另以折合 5.95 億加幣的稅賦減免，協助報業。一是非營利新聞組織可註冊為准慈善機構，除不必支付所得稅，這類機構還可接受捐款。二是新聞記者的薪資可以作為公司扣抵稅賦之用，雇主聘用編採人員的薪資可以扣抵 25%，薪資上限是 5.5 萬加幣，意即一位員工最多可以讓資方減免 1.375 萬加幣稅金。三是訂閱「加拿大數位新聞」的個人支出最多可有 500 加幣可以免稅，額度是 15%，亦即個人減稅上限是 75 加幣。廣電業者及已經得到「加拿大期刊基金」補助的業者則不能申請這類稅賦減免（Smith, 2019）。

英國也跟美國有別，即便《比較媒介體制》(Halin & Mancini, 2004 / 展江、陳娟譯，2012) 將英美傳媒同樣歸為「自由主義模式」。該看法引來批評 (Curran, 2011)，原因不單是如前文所說，兩國廣電模式南轅北轍，因為兩國政府的報業行動，其實也有分野。美國聯邦政府至今沒有對報紙在內的傳媒結構問題，有任何積極導引的政策，英國則官方有多如過江之鯽的報業市場調查與建議案，1980 年代以前，更有三次皇家委員會層級的報告，<sup>20</sup>近年則有 2012 年以 540 萬英鎊完成的列文森探索<sup>21</sup>。再者，英國政府責成 BBC 在 2017 年 7 月啟動「BBC 地方新聞伙伴計畫」，將執行至 2026 年。據此計畫，BBC 每年提撥 800 萬英鎊培訓 150 位地方民主記者 (local democracy reporter, LDR)，至 2019 年初，已經陸續有 144 人結訓並開始工作 (BBC, 2017; Tobitt, 2019, February 19)。此外，英國政府在 2018 年春成立由女爵士凱恩克勞斯 (Dame Frances Cairncross) 主持的十一人委員會，並已在 2019 年初提出「永續新聞事業」的分析給英國內閣，九項具體建議<sup>22</sup>已經有兩項在同一年就得到正面回應，包括 BBC 執行長<sup>23</sup>宣布將擴大支持 LDR，以及政府提撥經費成立「未來新聞基金」。<sup>24</sup>

---

<sup>20</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Commission\\_on\\_the\\_Press](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Commission_on_the_Press)

<sup>21</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veson\\_Inqui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veson_Inquiry)

<sup>22</sup> 該報告分析後，明確指出，不是所有受到新媒體（網路等）衝擊的行業或所有新聞都值得支持，政策所需支持的新聞類型，是「新聞調查與民主報導」，它們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它又表明，有人指 BBC 太受歡迎，致使私人新聞機構的生存空間遭受侵蝕，是以政府必須節制 BBC 的說法，並無道理，更重要的是，BBC 提供的新聞質量，符合該報告書認定的公益要求。

<sup>23</sup> BBC 執行長霍爾 (Hall, 2019, November 4) 說，LDR 已經編採十萬則以上報導，平均一週 3500 則平面、線上與廣電文稿，所有參與該項目的地方傳媒都能使用。這些報導頗見監督功能，如醫院設備不安全、地方政府支付育嬰人員及護士薪資不足，耗資 2400 萬英鎊的健康中心從未使用，但一年選用健保經費 2 百萬英鎊...等等。BBC 資編記者與地方記者協作，改善地方新聞的品質。霍爾說 BBC 願意擴充對 LDR 的支持，並會繼續強化對非裔、亞裔與少數民族社群 (BAME) 的服務；他同時呼籲私人捐贈 LDR 方案。英國地方報紙多由三家報團持有 (Newsquest, 以及可能合併的 Reach 與 JPI Media) (Mayhew, 2019a, November 4; Waterson, 2019, November 4)。

<sup>24</sup> 額度是 200 萬英鎊，委由英國政府於 1998 年成立的「科學、技術與藝文全國基金」(Nesta) 管理，該基金取自彩券盈餘的 2.5 億英鎊。Nesta 已經在 2019 年底完成招標，每案 10 萬英鎊，目標有二，一是找尋新方法以維持公益新聞，二是協助新創組織使用科技以支持公益新聞的「生態系統」。各案將執行至 2020 年。(Mayhew,

未來是現在的延伸，但歷史不會一成不變。英國工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就 BBC 與社交媒體如臉書等，已經提出具體傳播綱領（Watson, 2018a, 2018b）。美國民主黨由誰與共和黨川普（Donald Trump）角逐 2020 年的大位，尚待揭曉，但在「風起雲湧的 2003 年」，「自由傳媒學社」（Free Press）都以社會力訴求國會，成功翻轉聯邦傳播委員會的不當政策（McChesney, 2004／羅世宏等譯，2005，頁 269-321），那麼，在十多年後，主流傳媒如《紐約時報》已經以將近四千字長文，肯定並報導了美國年輕世代之〈千禧年社會主義者向前進〉（Goldberg 2018, July 1），則有朝一日，美國若有政治參選人提出耳目一新的傳播政策，也許並非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譚。<sup>25</sup>這個信念正是在資本競爭與主宰之下，《互聯網不是解方：論互聯網已是經濟、政治與文化災難—及其轉變之道》這本書所要傳達（Keen, 2015: 213-216; 219-220）：

若說僅有一個解方…那就是更多的記憶，人而不是電腦的記憶。答案在歷史…困難在於網路世代的許多人的唯一時間感，就僅在眼下的當前…立即、當下、此刻與我之外，再無他人他物他事…反叛這樣的世界，就得…通過十九與二十世紀歷史，我們才最能領略互聯網在二十一世紀的衝擊之意義…若說百年前有個…黃金年代，那也是通過具有進步色彩的政府…才能達成，因此，「既有網路的大失敗，最重要的回應方式，就是在我們的認可下，由歐洲議會或美國國會這類政治機關才能完成。」

## 參考書目

- 王毓莉（2016）〈臺灣四大報即時新聞發展對於新聞專業影響之研究〉，《國際新聞界》，12:76-94。
- 田思怡（2013 年 8 月 20 日）。〈打擊外媒 半島記者煽動罪被捕〉，《聯合報》。A14。

---

2019b, November 4)

<sup>25</sup> 2016 年參選美國總統時，排名民主黨第二，至 2019 年已將公立大學學費用由政府支付及擴大全民健保等主張，從邊緣推至民主黨主流議題的參議員桑德斯（Economist, 2019, July 20），也已經就傳播議題提出政策方向（Sanders, 2019）。

- 〈打壓員工籌組工會 慈濟證嚴法師遭罰3萬〉(2016年6月1日)。《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715879>
- 何日生(2017)。《建構式新聞》。台北：五南。
- 宋子節(2018年1月24日)。〈媒體融合時代，主流媒體如何建設性報導負面新聞—以人民網新浪微博為例〉。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124/c416772-29784627.html>
- 李竹君(2016)。《再思考新聞價值—以蘋果日報與中時集團的即時新聞為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京倫(2017年6月6日)〈1天7國集體與卡達斷交……前所未見！〉，《聯合報》。A1。
- 李唐峰(2016年12月5日)。〈電視新聞 數字解密〉，《看雜誌》，174。取自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6/22579?page=show>
- 林照真(2017)。《新聞，在轉捩點上：數位時代的新聞轉型與聚合》。台北：聯經。
- 林翠絹(2018)。〈數位優先新聞室：《海峽時報》網絡新聞匯流與轉型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43: 73-102。
- 章凱閔(2017年9月18日)。〈重建信任感 建設性新聞 讓媒體更有意義〉，《聯合報》。A7版。
- 南博一(2019年4月5日)。〈縮減版面、減少發行量 進口紙張短缺困擾古巴新聞業〉，《澎湃》。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6350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63502)
- 展江、陳娟譯(2012)。《比較媒介體制：媒介與政治的三種模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Halin, D & Mancini, P.[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國際新聞中心(2011年9月22日)。〈維基解密爆與美關係密切 半島電視台台長下臺〉，《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525931>
- 張玉洪(2010)。《負面報導不是壞東西：中國新聞實踐中的真命題》。台北：秀威。
- 陳建利(2011年8月28日)。〈利比亞的戰後重建困難要遠超伊拉克〉，《南方都市報》。AA25。
- 陳虹瑾(2017年9月20日)。〈母國深陷斷交危機，半島電視台怎麼辦？〉，《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920-international-QatarAlJazeera>
- 陳世欽(2013年6月25日)。〈卡達國王遜位 阿拉伯世界首見〉，《聯合報》。A14。

- 陳韋廷（2017年6月7日）〈卡達戰略位置太重要美悄悄調停〉，《聯合報》。A3。
- 張佑生（2013年7月11日）〈沙國、阿聯金援埃及 一擲2400億元〉，《聯合報》，A14。
- 彭慧明（2016）。《速度對新聞專業的衝擊：即時新聞現象的討論》。世新大學傳播所博士論文。
- 馮建三（2010）。〈開創報業與傳媒趨勢 端正政治認知是第一步〉，《2010年出版年鑑》，頁155-167。
- 馮建三（2015a）。〈公共政策與（新）媒介財政〉，《傳播、文化與政治》，1: 101-141。
- 馮建三（2015b）。〈附錄 台灣、南韓、日本、英國、德國與美國報業資料彙編 15 表格〉，馮建三（譯），《誤解網際網路》，頁355-365。台北：巨流。
- 齊湘（2018）。〈美國報業數字化：現實與幻影〉，《傳播與社會學刊》，43：155-174。
- 劉力仁（2018年5月30日）〈停播智子之心 大愛坦承重大疏失〉，《自由時報》。A4。
- 鄭宇融（2014）〈即時新聞與媒體勞動——以《蘋果日報》為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方綺、曾韋禎（2018年5月15日）〈中國認為情節涉美化日軍... 大愛新戲2集下架〉，《自由時報》。A1。
- 賴子欽（2015）。〈簡析《衛報》信託所有權之治理模式〉，《傳播、文化與政治》，1: 143-166。
- 龍一春（2006）。《日本媒介體制創新》。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羅世宏、胡元輝（主編）（2010）。《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全球經驗與台灣省思》。台北：先驅媒體。
- 羅世宏、魏玟、馮建三、唐士哲、王菲菲、林麗雲、王賀白合譯（2005）。《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國傳播政治》。台北：巨流。（原書 McChesney, R. W.[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 Associated Press(2019, June 11).*U.S. Congress to probe big tech monopolies, consider help for news industry*.  
From<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big-tech-washington-1.5170446>
- Baines, D. (2013). *United Kingdom: Subsidies and democratic deficits in local news*, pp.337-355 in Murschetz (2013, ed.).
- BBC (2017, July 12).*BBC announces media organisations which will employ Local Democracy Reporters as latest step in the Local News Partnerships*,

- BBC. From  
<https://www.bbc.co.uk/mediacentre/latestnews/2017/local-democracy-reporters>
- Benkler, Y.(2011). Giving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time to develop', pp.225-237 in McChesney and Pickard (2011,eds.).
- Cairncross, F. et.al. (2019, February 12). *The Cairncross review: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journalism*. From .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78021/021119\\_THE\\_CAIRNCROSS\\_REVIEW\\_A\\_sustainable\\_future\\_for\\_journalism.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78021/021119_THE_CAIRNCROSS_REVIEW_A_sustainable_future_for_journalism.pdf)
-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2018)*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Appropriation Request and Justification: FY 2019 and FY 2021* . From  
<https://www.cpb.org/files/appropriation/justification-FY19-and-FY21.pdf>
- Curran, J.(2011).Questioning a new orthodoxy. In *Media and Democracy* (pp.28-46).Routledge.
- DMGT ( Daily Mail & General Trust ) 2009, 2016 與 2018 的年度報告，取自  
<https://www.dmgt.com/investors>
- Eaton, G. (2018, March 1).Is the world really better than ever? Steven Pinker on the case for optimism. *New Statesman*. From  
<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observations/2018/03/world-really-better-ever-steven-pinker-case-optimism>
- Economist (2011, June4). And now for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 Cuts at the BBC, pp.68-69.
- Economist (2015, April11). Retail religion: Robert Schuller, an entrepreneur of televangelism and megachurches, died on April 2<sup>nd</sup> 1926-2015',p.63.
- Economist (2018,February24).A future perfect: Steven Pinker's case for optimism, pp.71-72.
- Economist (2018,June23). Small-town newspapers: still kicking, p.39.
- Economist (2019,July20) .Terminal degrees: the meaning of a debate about the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 p.60.
- Goldberg, M. (2018, July 1) *The Millennial Socialists Are Coming*. , *New York Times*. Section SR, Page 1.
- Hall, T. (2019, November 4).Non-profit local news body could bring about 'sea change' in public interest journalism.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new-non-profit-body-could-bring-about-sea-change-in-local-public-interest-journalism-local-democracy-reporters-news-partnershi>

- Hamilton, J. T. (2016) *Democracy's detectives: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agerup, U. (2019, January 18). Academic who defined news principles says journalists are too negative..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an/18/johan-galtung-news-principles-journalists-too-negative>
- Ingram, M. (2019, June 10). NYT promotes questionable study on Google and the media. From [https://www.cjr.org/the\\_new\\_gatekeepers/nyt-google-media.php](https://www.cjr.org/the_new_gatekeepers/nyt-google-media.php)
- Irer, K. (2012). *News from Tripoli, Benghazi, Brega and Misrata: How Al-Jazeera and BBC online news fram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2 AEJMC Conference, Chicago, Illinois. From <http://erepo.usiu.ac.ke/handle/11732/1388>.
- Katz , A.J.(2018, September 25). *Here Are the Evening News Ratings for 2017-2018 Season...*. From <https://www.adweek.com/tvnewser/evening-news-ratings-2017-2018-season-q3-2018-week-of-sept-17-2018/377690/>
- Katz , A.J. (2019, January 2) .*2018 Ratings: Fox News is the most-watched network on cable*. From <https://www.adweek.com/tvnewser/2018-ratings-fox-news-is-the-most-watched-network-on-cable-for-the-third-straight-year/387943/>
- Keen, A. (2015).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 Why the Internet has been a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saster - and how it can be transformed*. Atlantic Books.
- Kitiarsa, P. (Ed.).(2008) .*Religious commodifications in Asia: Marketing gods*. Routledge.
- Lambert, R.(2017, November 4). *Cubans' viewing of choice, ,* <https://mondediplo.com/2017/11/04elpaquete>
- Lule, J.(2017). Journalism in a small place: making Caribbean news relevan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end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4), E4-E6.
- Mayhew, F. (2019a, November 4 ). BBC plans expansion of local democracy reporting service. .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bbc-plans-expansion-of-local-democracy-reporting-service-dependent-on-new-external-funding-sources>
- Mayhew, F.(2019b, November 4). Government-backed £2m innovation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news opens to bidders. *Press gazette*.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government-innovation-fund-public-interest-news-future-news-fund-open-bids>

- McChesney, R., & Pickard, V.(Eds.), (2011). *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the collapse of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 Meyer, P.(2006).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ouri.
- Moore, R. L. (1994). *Selling god: 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culture*, Oxford UP.
- Murschetz, P. (Ed.).(2013) *State aid for newspapers: Theories, cases, ac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 News Media Alliance (2019, June). *Google benefit from news content: Economic study*. From <http://www.newsmedia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Google-Benefit-from-News-Content.pdf>
- Nippon.com (2019, August 6) Japanese newspaper circulation drops by 10 million since 2000, <https://www.nippon.com/en/japan-data/h00507/japanese-newspaper-circulation-drops-by-10-million-since-2000.html>
- Ofcom (2018, June). *News consumption in the UK: 2018*. From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4/116529/news-consumption-2018.pdf](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4/116529/news-consumption-2018.pdf)
- Ofcom (2019, July). *News Consumption in the UK: 2019*. From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7/157914/uk-news-consumption-2019-report.pdf](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27/157914/uk-news-consumption-2019-report.pdf)
- Peiser, J. (2018, August 9). Digital Subscribers Propel Times to \$24 Million Profit. *New York Times*, B2.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June 13) *Estimated advertising and circulation revenue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1956-2018)*. From <https://www.journalism.org/chart/sotnm-newspapers-newspaper-industry-estimated-advertising-and-circulation-revenue/>
- Phillips, D. (1974). The influence of suggestion on suicide: Substantiv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werther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3), 340-354.
- Phillips, D. (1980). Airplane accidents, murder, and the mass media: Towards a theory of imitation and suggestion. *Social Forces*, 58(4), 1001-1024.
- Phillips, D. P., & Berkowitz, L.(1986). Natural experiments on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violence on fatal aggressio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 new approach.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 207-250.

- Pinker, S. (2018).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Allen Lane.
- Pinker, S. (2018, February 17) *Opinion the media exaggerates negative news. This distortion has consequences.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feb/17/steven-pinker-media-negative-news>
- Powers, S. (2012). The origins of Al Jazeera English. In P. Seib(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pp.5-28).Palgrave Macmillan.
- Radcliffe, D., & Christopher A. (2017). *Local news in a digital world: small-market newspapers in the digital Age*. [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wnload/fedora\\_content/download/ac:v41ns1rnbw/content/LocalJournalismSurvey\\_Fall17.pdf](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wnload/fedora_content/download/ac:v41ns1rnbw/content/LocalJournalismSurvey_Fall17.pdf)
- Rusbridger, A. (2018). *Breaking news: The remaking of journalism and why it matters n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anders, B. (2019, August 26). Op-Ed: Bernie Sanders on his plan for journalism. From <https://www.cjr.org/opinion/bernie-sanders-media-silicon-valley.php>
- Shanahan, J.,& Morgan, M.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ultiv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M-D. (2019, March 19). Liberals unveil tax breaks for media companies — and subscribers. *Financial Post* <https://business.financialpost.com/news/economy/liberals-unveil-tax-breaks-for-media-companies-and-subscribers>
- Sundet, V. S., Ihlebæk, K.A., & Steen-Johnsen, K. (2019). Policy windows and converging fram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gitalization and media policy chan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From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9867287>
- Tobitt, C. (2019, February 19). 'We're making a difference': BBC-funded local democracy reporters speak candidly about first year of scheme to fill news gaps.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were-making-a-difference-bbc-funded-local-democracy-reporters-speak-candidly-about-first-year-of-scheme-to-fill-news-gaps/>
- Tobitt, C. (2019, May 1). Guardian group meets target to break even at end of three-year financial turnaround plan. *Press gazette*. From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guardian-group-meets-target-to-break-even-at-end-of-three-year-financial-turnaround-plan>
- Tobitt, C. (2019c, August 6). *Newsquest US parent company Gannett bought out by rival media group. Press gazette*. From

- <https://www.pressgazette.co.uk/newsquest-us-parent-company-gannett-bought-out-by-rival-media-group/>
- Waterson, J. (2018a, August 22 ). *Jeremy Corbyn: I'll tax tech firms to subsidise the BBC licence fee*.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aug/22/jeremy-corbyn-labour-leader-tax-tech-giants-subsidise-bbc-licence-fee>
- Waterson, J. (2018b, August 23). *Corbyn proposes 'public Facebook' as part of media overhaul*.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aug/23/corbyn-proposes-public-facebook-as-part-of-media-overhaul>
- Waterson, J. (2019, November 4) 'BBC asks private sector to subsidise local reporters scheme'. *The Guardian*.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9/nov/04/bbc-asks-private-sector-to-subsidise-local-reporters-scheme>
- Zhdannikov, D., Doherty, R.E., & Abbas, M. (2011, June 9). Special report: Qatar's big Libya adventure. *Reuters*.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7/us-libya-qatar/special-report-qatars-big-libya-adventure-idUSTRE75826M20110609>

**Technolog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News  
(Convergence):  
A Policy Commentary**

Chiensan Feng\*

**ABSTRACT**

This essay starts with reviewing two books on journalism published recently. Two authors are veteran journalists before embarking upon their careers in the academy. They share a same concern but approach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rofessor Lin's *Journalism at its turning point—news transform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digital age* conduct case studies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the BBC* and *the Al Jazeera*, with a view that they may provide lessons for other media to emulate. It is contended that, as a teacher, she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ut right journalism that seems to run astray. Dr. Ho's argues that abnormal value like 'man bites dog' should not be allowed a place in guiding news coverage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stead, good intentions coupled with participatory reporting should be encouraged as they enhance possibilities that public issues be addressed more accurately and solutions better assessed accordingly. Ho believes the Buddhist and non-commercial DaAi TV is a case in point that demonstrates what and how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looks like.

Though it's not their main concern, Lin and Ho do mention public service media as a potential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hat can elevate journalism and make good uses of convergent techniques. This paper therefore comments upon and extends this casual notice by reminding that, neither technology nor religion is an answer, indeed it's only a policy-oriented endeavor that can provid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digital an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Keywords** :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policy, new media, news

---

\* Chiensan Fe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jsfeng@nccu.edu.tw

convergence

##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 Editorial Committee

### Editor-in-Chief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ihyu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ublisher

###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 Subscription

###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 傳播文化與政治

no. 10/December 2019

## **Research Articles**

- *Is Aesthetic Humanism as Democracy and Criticism Possible:  
Edward Said' s Humanism as an Example*
- *“Complete Party Newspaper”:  
a Discourse Event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 **Research Notes**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U copyright reform for digital single market*

## **Past and Present**

- *The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Paradig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 *Why conference matters?  
Understanding it via the concepts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Book Review**

- *Technolog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News (Convergence):  
A Policy Commentary*